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37期

【思想文化】

- 1 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五）/王若水

【百年国史】

- 16 你未必知道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条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3）/刘翠香
- 21 绘本特殊年代——漫笔文革岁月（1966--1976）（八）/墨娃

【评论】

- 29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77）
——2021，1949/李南央（美）

【书讯】

- 34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教育叙事：1949--1966》在美国华忆出版
- 37 毛崇杰著长篇纪实小说
《两京记》（上卷）在美国华忆出版

【述往】

- 40 我在内蒙兵团的经历（五）/张保和（美）
- 55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十）/杜钧福

【文选】

- 67 “豫东事件”探秘 / 李素立

【资料】

- 85 关于革命领导干部吕应中同志材料汇编
清华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正确对待干部》战斗组（1967.11）

【补白】

- 20 House 玩梗与文革归来/顾绛
- 33 体验生活与调查研究/田三分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辩证法和毛泽东的“斗争哲学”（五）

王若水

十二、两段式还是三段式？

现在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观点和黑格尔的作一个比较。

毛泽东的观点是：对立双方斗争着，待到“一个消灭一个”后，矛盾就解决了。“否定”的一方战胜了“肯定”的一方。这个“否定”又遇到一个对方，双方展开新的斗争，最后这个“否定”又被对方所否定，这就是“再肯定”。“再肯定”之后又是“再否定”……。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称为“肯定”，也可以称为“否定”。因此，三段式是没有必要的，肯定与否定的两段式就够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同他的“两分法”是联系着的。

那么黑格尔为什么要用三段式呢？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甲被乙否定，乙被丙否定，丙又被丁否定……这样否定来否定去，可以无穷无尽。黑格尔称这是“坏的无限性”。用中国古话来说是“往而不复”；如果“复”的话也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两个否定等于一个肯定）。这只能表明“变化”或“循环”，并不能说明“发展”。要有发展，就要真正解决矛盾，而矛盾并不能依靠“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消灭一方”的方式得到真正的解决。如果乙方要绝对地排斥甲方，抛弃甲方，那么甲方也会对乙方采取同样的方式。但甲方之所以出现，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的根据或理由；它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它的真理性是片面的。而乙方对它采取简单排斥和抛弃的态度，就说明自己也有片面性。要真正解决矛盾，就要给矛盾双方以适当的地位，承认双方各有道理，同时克服双方的片面性。这就产生新的第三方，即丙。如果甲是“肯定”，乙是“否定”，丙就是“否定之否定”。如果“正题”是甲，“反题”是乙，那么“合题”就是非甲非乙，亦甲亦乙的“丙”。这就是“辩证的综合”。从“正”到“反”再到“合”，这是走了一个圆圈，但并没有简单回到出发点，而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确切地说，是一个螺旋形的梯子。当然，这个丙又会产生新

的矛盾，开始新一轮三段式发展。这样，在事物或范畴前进的过程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被抛弃，而是被带进了新的阶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在黑格尔的三段式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肯定”与“否定”双方的名称是可以互换的：把“肯定”叫作“否定”，“否定”叫作“肯定”，均无不可。之所以可以这样互换名称，因为双方都是对自己简单肯定，对对方简单否定。但是第三段的“否定之否定”超越了这种僵固的二元对立，它是辩证的否定，是包含了肯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黑格尔用的 *aufheben* 这个德文词，它有三义：举起；取消；保留。中文译为“扬弃”：又“扬”又“弃”，也就是又否定又保留，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的保留。因此，把这种“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同简单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混淆起来，都是不可以的。这就是黑格尔为什么不用两段式而用三段式的理由。

毛泽东虽然也想说明“综合”，可是他的“综合”并不是黑格尔的“合题”。他说，任何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这意思就是，矛盾双方的斗争，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被吃掉你，没有第三种可能。这和他早年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综合”其实就是简单的“否定”。毛泽东用战争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是很恰当的：对待矛盾的对方就像对待敌人一样，“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毛泽东语）。

“一个吃掉一个”的现象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辩证的否定。恩格斯对这种情况作了很好的解释。在《反杜林论》中，他在用大麦和昆虫的生长例子来说明“否定之否定”之后，设定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如果我把昆虫一脚踩死，这不也是否定吗？恩格斯回答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马恩选集》3卷，484页）上面这种否定是外在的否定，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发展过程的中断。麦粒和昆虫只能被否定一次，不可能再有否定之否定了，因为已经消灭了。辩证的否定则是内在的否定，在“否定”之后还有“否定之否定”，而前者为后者准备了条件。

简单的否定并不是完全要不得。如果有人说“地球是扁的”，或者预言2000年是世界末日，对这种说法，只能简单地否定。但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是对不应该简单否定的东西予以简单的否定。

毛泽东犯的正是这种错误。他不但对对方总是绝对否定，也总是对自己绝对

肯定。他靠绝对否定对方来绝对肯定自己，也靠绝对肯定自己来绝对否定对方。这样，他就总是要强调“你死我活”的斗争。彻底的辩证法不同，它采取了一种谦逊而又勇敢的态度：在否定对方的同时也能够看到对方的正确东西和长处，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也敢于批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如果要从人类的活动中找出一件事来代表辩证法的精神，那么与其说是“斗争”，不如说是“对话”。辩证法（dialectic）一词就它的希腊语源说，本来就是和对话、辩论相关的，它是一种探求真理的方法。这和那种“我就是真理”的态度不同。我对自己意见的肯定和对对方意见的否定，都只是在讨论开始时采取的一种暂时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否正确，还要通过互相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来考验。我随时准备听取对方的批评意见而进行修正，或者把对方的观点吸收到自己的观点中，或者对自己的观点提出补充的论证。这样，在对话结束时，双方的观点就会比开始时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或者变得一致。只要对话双方的目的都是寻求真理，那么谁胜谁负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了——真理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再来考查一下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的矛盾如何推动事物发展和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它和毛泽东在六十年代讲的有一些不同。

《矛盾论》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旦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矛盾的两个方面（新与旧，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第一种含义。斗争的结果，矛盾双方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这里说的转化，是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的转化，如“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而成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经过这种转化，统一体的性质就改变了。但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对立双方仍然存在，继续着斗争，直到旧的方面归于消灭。当然，这时又会有新的矛盾产生。

毛泽东的这种解释，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不过是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现象

扩大为宇宙的普遍规律，然后又用这种普遍规律来说明阶级斗争。他在这里说的“统一体”，并不是合题。它并不能解决双方的对立，只是给它们之间的斗争提供了一个地盘。胜利的一方并没有从对方吸收任何东西，它的变化只是由小变大，由非主要方面变为主要方面。

但是，如果坚持认为矛盾的一方对另一方是简单否定的关系，那么，即使指出对立面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的，这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仍是不够的；他称这个是“消极理性”的观点。之所以是“理性”，因为它已经不同于知性而有了辩证法，它承认事物的矛盾；之所以是“消极”，因为在这里对立双方只是单纯否定对方，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

黑格尔认为，最高级也最困难的思维方式是“积极理性”，或“思辨理性”。它和“消极理性”不同：它所主张的否定，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把对立面排除在自身之外，而是把对立面加以改造，吸收到自身之内；同时，为了吸收对方，自身也作了改造，双方融合为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双方的差别和对立并没有消失，但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互相排斥，而是和谐的、互补的关系；用中国古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相反相成”。这就是黑格尔说的“具体的同一性”。黑格尔说“对立的统一”就是指这种具体的同一。只有这样理解黑格尔说的“对立的统一”，才算是理解了辩证法的精髓。

这样看来，否定三段式，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把黑格尔理解的“对立的统一”也否定了。

十三、从“两条战线的斗争”到只反右不反“左”

根据上面的叙述来判断，需要对毛泽东的辩证法造诣重新评估。毛泽东在前期的有些著作中，确实对辩证法的运用达到了很高很熟练的水平，令人赞叹；但是，他的辩证法从总体上说仍是处于“消极理性”的层次。难怪毛泽东的辩证法最好地表现在他的军事著作中。也难怪毛泽东会把辩证法归结为“斗争哲学”。

1942年，毛在延安的一次整风报告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的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

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毛选》3卷，815-816页）

这就难怪毛会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451页）“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毛选》5卷，344页）

这样，人类的全部生活就是斗争，人类的全部知识就是关于斗争的知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诚然重视阶级斗争，但马克思从未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斗争哲学。列宁倒是用过“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不过他的意思是说唯物主义是有党性的，是要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并不是指这种哲学的内容。用“斗争哲学”来称呼毛泽东自己的哲学（不是他的全部哲学）倒是合适的，因他从哲学的高度把斗争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主张一切都离不开斗争，斗争决定一切。

在少数的场合，毛泽东也曾表现出“辩证的综合”的观点。

毛泽东在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在谈到向外国借鉴的问题时，主张“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的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他指出：鲁迅的小说，就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这个“不中不西”，我们可以理解为“中”与“西”的融合。毛泽东用骡子来做比喻，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像的。不会完全不变。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在医学方面，毛泽东还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以上引文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745-753页）在另外的地方，毛泽东在说到中医和西医的前途时，说到将来可能产生一种统一的医学，既不是单纯的中医也不是单纯的西医。

这种观点，和上面所说的“一个吃掉一个”显然不同，倒是可以说是“辩证的综合”是符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

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条战线的斗争”的说法，说的是党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条战线是反右，一条战线是反“左”。如果说右是肯定，“左”就是否定（反过来说“左”是肯定，右是否定也可以）。这两种倾向是截然相反的，互相排斥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说到1927年的陈独秀的路线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右（陈独秀是否如此，这里暂不论）。王明批判了陈独秀的路线，但他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方法，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是“左”。那么什么是正确的路线呢？毛泽东认为应当是“又统一又斗争”：既应当建立统一战线，又要对统一战线内部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这是一种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政策。（参看《毛选》中的1940年的《论政策》和1941年的《村调查·跋》）实际上，这就是对王明路线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对王明路线和它的对立面陈独秀路线双方的合理因素都加以吸收，同时批评双方的片面性。可惜的是，毛泽东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才表现出这种“辩证的综合”的思想。

“左”和右的争论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说过，“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毛选》5卷，310页）他还批评过党内的“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同上152页）。虽然如此，他自己也认为“左”比右好一些，说“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同上424页）1957年，在批评陈其通等人对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左”的错误态度时，他没有忘记肯定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可是在批评钟惦斐的所谓“右”的错误时，却没有这样说。难道钟惦斐就不要革命，就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吗？

此后毛泽东越来越陷入“左”的片面性，变得越来越只反右不反“左”了。

毛泽东曾提出这样一个处理党内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¹（《毛选》5卷，369页）这最后达到的团结，似乎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程序达到的，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恢复了团结。但是，仔细了解一下就会看出，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只是用党中央的思想（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去克服

¹ 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这个公式是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延安时期的文献材料有这样的表述。当时毛泽东只是提出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

不同的意见，统一全党的思想，丝毫没有从不同的意见的争论中得出正确的思想的意思。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得到广泛赞扬的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

在中国哲学史上，历来就有两种对待不同学派的传统，一种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一种以庄子《天下篇》和《汉书艺文志》为代表。孟子以替天传道者自居，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词”。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虽然承认这些派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认为它们全是“欺惑愚众”，大骂了一通。总之，除了舜、禹、仲尼、子弓，其他都是一无足取。这种观点导致后来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庄子在《天下篇》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肯定各家“皆有所明”，“皆有所长”，问题只是“不能相通”，不识大体。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里列举了诸子十家，一一加以评论，说“可观者九家而已”。对这九家他都肯定了其所长，也指出了其流弊，包括儒家在内。他认为各家是相反相成，殊途同归，最好是对它们“舍短取长”。这种态度，就是五四时期蔡元培办北大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方针，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的“百家争鸣”方针绝不是自由主义的，而只不过是一种消灭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思想的手段而已。它和公开的思想专制只有方法的不同：一是不采用行政的手段去禁止，而是允许发表，发表出来再加以鉴别；二是对“毒草”不是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来消灭，而要采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来消灭。即使这样，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认真地遵守过。毛泽东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选》5卷，390页）毛泽东根本不承认，一种比较正确的思想也需要从反对意见中受到启发，使自己更加完善。毛泽东说百家争鸣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锻炼，也说过毒草锄掉以后可以肥田。他本来可以从毒草肥田这个比喻中得出结论，说毒草中也可能有合理的有用的东西；但是，他从没有明确这样说过。他从不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对立的学说中吸取正确的有用的东西，弥补自己不足或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他像斯大林一样，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永远正确的，违反这一条的修正主义是绝对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不断地驳倒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观点，而绝不是要肯定和吸收其中的任何东西。更糟糕的是，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权威，而他既然掌握了最高权力，就垄断了话语权；谁是马克思主义，谁不是马克思主

义，是由他说了算的。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在同党内外的正确思想（被称为“毒草”“右倾观点”“修正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957年，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敌我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毛选》第5卷，497页）“绝对地互相排斥”，这个说法显然是从列宁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命题来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只有一重性”。这个观点既违反辩证法原理，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五十年代，毛泽东发动了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当时党中央发出通知，要大家普遍学会分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从那以后，“唯心主义”成了错误的代名词。批评什么人的观点，只要扣上一顶“唯心论”的帽子，对方就紧张起来了。

那么唯心论有什么特点？毛泽东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毛选》5卷，159页）。

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是同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一致的。列宁对这个问题观点要多一些辩证法。他在《哲学笔记》中把那种认为“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的观点斥之为“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说：人的认识是沿着近似螺旋形的曲线进行的；这条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都可能被片面地加以夸大，变成一条直线，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参看《哲学笔记》，403-404页）。这是对的。例如，人的认识是从感觉到思想；如果截取感觉这一个片段，使之变成一条直线，就成为（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如果截取抽象思想这个片段，使之绝对化，就变成（唯心主义）的唯理论。

列宁认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同上，306页）他又说：唯心主义“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同上，404页）这就是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生长在人类认识之树之上的花朵（这就是两者的同一性），不过前者是不结实的，后者是结实的。这个比喻很好。不过我认为，

唯心主义也是结实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马克思主义²。

毛泽东还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看作是绝对的对立，像他理解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的关系一样。这又是和斯大林一致的。影响所及，在我们国家，“形而上学”已经变成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的代名词。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其实，无论黑格尔或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这样认为的。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和思维方法列入知性的范畴，它属于思维的初级阶段。他指出，“对于这种认识方式，只要其目的可以说是仅仅在于求日常浅近的知识，当然无可非议”（《小逻辑》第121节附释）知性的功能是将整体事物分解为各种成分和因素来加以分析。这是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应该承认它的权利和优点。没有知性就没有思维的确定性。只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里，而应该把这些被知性分解的成分或因素综合起来，还原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思辨哲学或积极理性的工作。前面说过，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三个部分，相当于认识的三个阶段：有论（感性）；本质论（知性）；概念论（理性）。这是一个三段式，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前两个阶段的统一。理性超越了知性的局限性，但是它必须善于吸收和利用知性的劳动成果。黑格尔用下面的话来表述理性和知性的关系：“理性没有知性就不成其为理性，而知性正是没有理性才是知性”。所以，理性是“扬弃”了知性而不是“抛弃”了知性。把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绝对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违反辩证法的。

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他论证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时说：古希服的世界观“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和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种方法的成果，说“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绝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查”（以上引文见《马恩选集》3卷，359-360页）。这种思维方法又从自然科学

²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就是想说明这个问题的。书名中的“终结”在德文原文中是 *Ausgang*，有“出路”“结果”“结为”之意。恩格斯的原意是要说明，德国古典哲学不是简单地消灭了，而是被“扬弃”了：“扬”其辩证法而“弃”其唯心主义，其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 *Vernunft ist Nichts ; der Verstand doch Etwas ohne Vernunft* 。直译为：理性没有知性就是无，而知性只是没有理性的某种东西。

移植到哲学中，成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马思选集》4卷，318-319页）但是它迟早会遇到一个界限，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的了。

关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关系，或理性和知性的关系，最好的例证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同牛顿力学之间的关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超越了而不是抛弃了牛顿力学，它指出了后者的局限性。牛顿力学可以看作是相对论的特殊情况。在宏观和低速的范围内，牛顿力学仍是有效的。牛顿力学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方法是辩证的。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也是有同一性的，不然，怎样从哲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原理？怎样说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从当前的现实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每一方都从对方学习和吸收了许多东西，怎么能说是绝对地相互排斥呢？《矛盾论》曾经讲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有同一性的，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同一性的。现在毛把自己否定了。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绝对肯定，对资产阶级绝对否定。他把“资产阶级”作为一切邪恶的代表，“无产阶级”作为一切美德的化身。于是，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对道德上的缺点或思想上的错误，总要归咎于受资产阶级的腐蚀或影响。毛还提出“兴无灭资”这种“左”的口号。

如果无产阶级是完美无缺的，那么无产阶级还要不要消灭自己呢？如果无产阶级思想总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它岂不是变成了绝对真理吗？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完全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毛在1940年时还只是把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用“帝国主义反动文化”一词来加以抹杀，至于西方古代和启蒙时代的文化还是要批判地吸收的（《毛选》2卷，706-707页），现在却连这也不提了。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曾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对于复杂事物，不顾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毛选》3卷，939页）他还评论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使用的方法是形式主义的方法，说：“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

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同上 831 页）后来就走到反面，产生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不是这样，姑且不论；可是毛泽东自己也走上了这条路。毛泽东主义成了五四以来危害最大的新八股、新教条。教条主义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迷信。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扯皮的主义”。这个话表明，毛泽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消极理性”来理解的。辩证法当然可以说包括了“扯皮”，但不能停留在这里。不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理，谁也不让谁，这样吵架下去，争斗下去，永远没个完。甚至同一个人，今天可以抓住这一方面来反对另一方面，明天又可以抓住另一方面来反对这一方面；每次这样做都可以讲出一番道理，因为事物总是包含着相反方面的。知性容易产生教条主义；消极理性的好处是对这种知性的教条提出挑战，指出它必然陷入矛盾。但消极理性也会产生怀疑主义；或者变成诡辩。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毛泽东如何把辩证法变成了诡辩。一次是在 1958 年 11 月 23 日武昌会议上，在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虽然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虚报成绩，但又说：“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哪有真的？”（《学习资料》1949-1967，212 页）这几句话，冲淡了作假的严重性，似乎作假是自然的、不可免的事；似乎虚报成绩的现象存在，适当以证明生产有伟大成绩是真的了（当然，这实际上不是真的）。诚然，真是与假比较而存在的，但人人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难道如果现实中不存在虚报成绩的现象，人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了吗？

另一个例子是 1966 年 7 月 8 日“文革”初期，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上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用这个话来为“文革”辩护，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等于说，一个人想要身体健康，就必须大病一场。诚然，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但大乱之后也许是中治，也许是小治；为什么一定是大治呢？如果天下大乱一定能达到天下大治，那么就不怕天下大治又会达到天下大乱吗？这完全是玩弄概念，不是具体分析。“文革”后期，天下已经乱了多年了，毛还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而不说“八亿人口，不和行吗？”

十四、毛泽东为什么需要“斗争哲学”

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牺牲了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反对过“只要斗争不要团结”的错误，现在，他自己也走了这条路了。从此，毛泽东就沿着这条路滑下去，一直滑到“文革”时期大行其道的“斗争哲学”。“团结—斗争—团结”，变成“斗、斗、斗”了。这不是说毛泽东后来绝口不提团结，在政治的意义上他有时还讲团结，但是，再也没有提到哲学的高度了。

在1974年初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和谢静宜一唱一和地叫嚣：“斗则进，不斗则退！”“不阿则修！”“不斗则垮！”把矛头对准周恩来。这虽然不是毛泽东的话，却是符合他的“斗争哲学”的。并不是一切斗争都是推动事物进步的；像“文革”这样的斗争只是给我国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大倒退。

批判“斗争哲学”，绝不是说要从此抛弃一切斗争。我们提倡保护环境，但同时也不能放弃自然斗争，例如对付洪水和疾病。我们需要社会安定和人民团结，但也不能取消社会斗争，例如反对专制和腐败。在有的时候，这种斗争可以尖锐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并不是一切斗争都是如此。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方式是要看具体条件而定的。无节制的斗争和无原则的和平都是我们所不取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并非由于他在哲学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他行动上的错误，相反，他的哲学观点的改变是为他的错误行动做辩护。我们不要误以为，毛泽东是因为接受了“斗争哲学”，然后才变得很“左”，很好斗：不是的，毛泽东这种在哲学上的倒退，是他在政治上搞极左路线的反映，是适应他发动的“反修斗争”和“文革”的政治需要的产物。

毛泽东在1964年的哲学讲话中说过：“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从这一点出发，才有马列主义，才找到了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从认识的顺序说，哲学当然不是最先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无疑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有深刻的影响。然而哲学又应该批判地考察实际的东西，包括阶级

斗争。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把这些运动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其实不过是用“阶级斗争”这个口号使他进行的政治迫害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而已。哲学应当关心政治，但哲学不能把统治者的意志和政策当作先验的前提来接受，哪怕它打着“人民”的旗帜。那种要哲学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观点，取消了哲学对政治和阶级斗争进行独立审查的作用。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曾沦为神学的奴婢；现在毛也要哲学成为党的奴婢，这被他说成是“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为英雄和领袖的。一旦没有敌人，没有斗争的对象，革命领袖的光辉就有变暗淡的危险。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本来应该进行和平建设。新时期需要的是另一种类型的领袖人物。然而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是不在行的；搞政治斗争，特别是玩弄权术却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于是，国家就不得安宁了。

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的小说《耶稣基督眼里的福音书》里，叙述魔鬼曾想改邪归正，向上帝忏悔。但上帝拒绝了，而上帝拒绝的理由是惊世骇俗的：“因为我不能没有你所代表的邪恶而存在。如果魔鬼不是魔鬼，上帝就不成其为上帝。”

上帝的敌人是魔鬼，可是上帝又不能没有魔鬼。魔鬼与上帝同在，绝对的恶与绝对善共存，这就是神圣的辩证法。上帝无所不能，只是不能消被魔鬼。魔鬼是上帝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有魔鬼的诱惑和对魔鬼的恐惧，人们才感到需要上帝；否则，上帝也就可有可无了。

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既要消被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泽东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不过毛泽东搜寻的“敌人”不再是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他认为试图或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外或多或少有一些独立思想的分子，这些人被毛泽东说成是“反党”“反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和镇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种恐怖感，加上系统的、强化的政治思想灌输，人们变得盲目地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尽管这样，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知道哪一天会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这种政治迫害到“文革”发展到顶峰。为了搜寻和肃清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大大小小的“赫鲁晓

夫式人物”，毛在人民群众中制造一种虚假的危机感，似乎资本主义复辟的大祸临头，修正主义篡党的危险迫在眉睫，只有拜倒在毛泽东的脚下，一切听从他的指挥，斗争斗争再斗争，国家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下级和上司斗，群众和领导斗，同事和同事斗，学生和校长老师斗，“红五类”和“黑五类”斗，子女和父母斗，朋友和朋友斗，“造反派”和“保皇派”斗，“造反派”的这一派和那一派斗……直斗得中华大地昏天黑地，日月无光，直斗得八亿人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所有这些都声称他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谁敢动毛主席一根毫毛，我们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这种斗争的狂热中，任何被怀疑对毛泽东不忠的人就面临灭顶之灾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实际意义。■

【百年国史】

你未必知道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条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3）

刘翠香

1842年8月，英军直逼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屈服，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 2011官版《中国共产党历史 I》P4

晚清中国在人文和科技两个方面与世界工商文明大势渐行渐远，却因纺织品、瓷器和茶叶的垄断性优势，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19世纪初，中国已囤积白银6万吨，占全球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却几无国际流通，大量藏匿于官宦和民间地下。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1510年凌迟伏诛的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千年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刘瑾被抄家时仅从地下搜出的白银即2.6亿两，近乎1万吨，是当然的世界首富。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占全部向中国出售商品鳌头（63%）的英国，历年收入总额也仅为白银120万两。西方经济

学家曾嘲讽“西方从地下挖出白银就是为了再埋入东方的地下”³。

通滞是市场经济大忌，贸易逆差更是资本主义死敌，自它诞生那天起为逆差打贸易战就是常态，至今不过武器由炮舰、兵马变成货币、关税而已。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1792年英国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开放口岸、自由通商的要求，被拒。1816年再次提出，再次被拒。自此以东印度公司为主体，英国开始向中国以走私形式输入鸦片，时间长达20余年，直至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

人类种植罂粟已有6千多年历史，隋唐时方才传入中国，仅供观赏和治病。宋元有了栽培记载，明始有制作和吸食记载。清嘉庆始规模种植，仅仅20年至道光已滥觞，种植由非法向事实合法化迅进，吸食人口陡增。中国自制鸦片的成本与品质都远逊于英属殖民地如印度、孟加拉国、土耳其等，正因贸易逆差恼怒不已的英国佬看到了巨大的商机。英国本土并不禁止罂粟种植，这种植物美艳异常，极具观赏价值，至今遍布英伦三岛，国民却从无制作和吸食的习惯与传统。如果不是它那名叫“鸦片”的提取物体小量轻、本低利大、运输简易而中国需求量极高，英人绝无必要和可能为它开战。最重要的是鸦片在除中国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一种药材，贩卖鸦片并不犯法。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18日发布文告，责令外国鸦片贩子3日内必须呈缴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若有再贩，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由于各国鸦片贩子都不配合，21日林则徐派兵封锁商馆，断绝饮食供应，迫其就范。到25日，大部分烟贩屈服，只有英国人坚持。在最后通牒后下，28日他们终于屈服，同意交出鸦片，却拒签保证书。

英国政府强烈抗议。他们的逻辑是一个人犯了法必须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审判，根据其行为触犯法律的程度给予恰当的处罚，只有这样才是正义的。而“人即正法”绝非程序正义，他们不可能按此要求签署保证书。于是林则徐围困商馆、断绝饮食，直接威胁英国商人的生命安全。英驻华商务总督查义律以政府名义担保让英商交出鸦片，却又涉及在华英国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左右为难，为日后的开战埋下祸根。

义律实际上是一位反鸦片者。他向朝廷派出的禁烟钦差大人林则徐声明“贩卖鸦片的英商可严厉处置，但其他正常商贸活动不能累及”，同时强调“按照《万

³ 永谊《白银秘史：东西方货币战争史》

国公法》，即使对鸦片商也不能动用中国的野蛮刑罚，砍头凌迟都不行”。可是“公法”在清吏眼中不啻废纸，“万国”如何管得“中国”？它只能更加激怒皇上和大人。林则徐旋即下令遣散所有洋行人员，陆地一经发现洋人和与洋人接触者一律处死，海上则将义律率众逃生的兵舰团团围住，断水断粮。几天后粮尽水竭的英人不得已放下小船派使谈判（也是送达最后通牒），岂料中国水师看不懂船上白旗的意思，迎头就打（之前中国水师挂着红旗绕英舰兜圈子，也被英军误以为是来挑衅的，见面就轰）。文化的差异、文明的冲突，终至动武。

1840年4月，英国下院议会高票通过了向远征军拨款17.3万英镑的议案。是年底，英国以在华外交人员生命受到威胁和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由，由印度政府代英国向中国宣战，远征舰队由首相直接下令起航向中国驶去，远征获主流民众狂热支持，很遗憾其中也有中共祖师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见第1个故事）。仅4千余兵力的英军远征军凭借船坚炮利轻易攻占了舟山定海，封锁住长江出海口，一路北上，威胁京都，迫使清廷和谈。和谈不成，翌年战事再起，英远征军并印度、克什米尔士兵增至2万，占领宁波，再沿杭州湾进犯上海，直逼南京，以压倒强势签下包括“五口通商”“战争赔偿”“割让香港”、“自由贸易”“内河进出”“租赁居住区（租界）”“最惠国待遇”“鸦片贸易合法化”等内容中英《南京条约》。在完全不了解国际法则的情况下，清政府又主动要求与战胜国签下真正不平等的包括“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的《虎门条约》。美、法、日则紧随其后，依仗各自军事和经济实力，强求清政府的准入与开放承诺。美国更在1844年霸凌式签下《望厦条约》，该条约与《南京条约》一起，为日后的“修约”埋下伏笔。

话说当日，1842年8月29日，在泊于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上中英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史称《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条约一共13条，如你自小就被教科书告知这是一个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和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见证，那你就根本不可能不知其第一条，开明宗义竟这样表述——

“There shall henceforward be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

who shall enjoy 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 within the Dominions of the other.（从此以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与中国皇帝陛下臣民之间将实现和平与友谊，在对方统治范围内，其人身和财产要享有完全的安全和保护）

这是一条当时和如今都被故意或无意严重忽视、却是最重要的条款，除去其合理、平等性，更早在开战前就已确定。是年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给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义律训令的第3号附件——《对华条约草案》就这样表述“自今以往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与中国皇帝陛下两方臣民之间和平敦睦，各在对方疆土之内得享人身、财产之完全的保障与维护”，与《南京条约》第一款如出一辙。

可惜中方完全不能领会这条首款，更不能懂得那几个看似简单的英文单词“persons（人身）”“property（财产）”“full security and protection（完全的安全和保护）”在英国人眼里是什么分量。直到近2百年后的今天大多数国人还是不能理解，这一条正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根基所在，是远在“坚船利炮”“丛林法则”之上的英国立国之本和两次开战所秉持的法理。英国人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写入《南京条约》第一条，典型地反映了他们思维方式。1215年6月15日，一群英格兰贵族在泰晤士河边一块草地上迫使国王约翰在一份包含63个条款的文件上盖上王玺，这就是现代文明史上里程碑式文献、英国宪政乃至世界各现代国家宪政的母体——《自由大宪章》。现在东方式独裁专制迎面撞上西方式自由宪政，小小罨粟轰然激起剧烈的东西方碰撞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次鸦片之战后，中国罨粟种植已经事实上合法化。清政府在默许鸦片走私的同时甚至鼓励烟农种植罨粟，希望能以自产取代进口，虽仍未能改变国产货成本高、品质低的状况，但鸦片种植面积大大超过战前却是不争事实。

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诸国理由是大清国“背约”——背了《南京条约》。细读此条约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除了“割让香港”“巨款赔偿”“五口通商”这些因写进教科书而尽人皆知的内容外，保障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关税透明不得敲诈勒索、官方往来按照国际礼仪、废三跪九叩、保证外国人在居留地的安全等条款，都未执行。

大尺度背约，加上地方官吏怂恿“爱国人士”对洋行高频率骚扰，尤其新任

广东巡抚叶名琛摆枪摆炮要和英国人干上一场的表演，实际上他也真就是表演而已，可惜叶巡抚“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典型中国戏码洋人看不懂，招得他们名正言顺又打了一仗——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也又一次饮鸩止渴，签下更加不堪的四份《天津条约》（分别与英、美、法、俄），份份有咸丰的亲笔签名。

签名却不等于承诺，还是老一套——“权宜”。文臣桂良上奏“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武将僧格林沁更是将巴夏里为首的英使团39人掠为人质，大刑伺候，连“两国交战不杀使者”的古训都置于脑后，犯下大忌，世界为之震惊。英法联军火速进军北京抢救人质，但21人已被酷刑虐杀、分尸，包括7名泰晤士报记者，其余18人也只剩下半条性命。狂怒的联军为了报复，抢劫和焚毁了京西的所有皇家园林——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清漪园、圆明园、长春园、静明园、静宜园五园，远不止人们被告知的“火烧圆明园”那么小范围。

大史家蒋廷黻有一句总结鸦片战争实质的话，如今已成为经典：“战争之前我们不给他们平等，战争之后他们不给我们平等”。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之挨打，“坚船利炮”与“人权财权”孰重孰轻，“落后”与“背约”的原因孰大孰小，孰重孰轻，都能在这句话里探寻根源。📖

【补白】

House 玩梗与文革归来

顾 绛

脱口秀演员 House 把两个流浪狗说成是“作风优良”“特能战斗”，北京警方对其立案调查。笑果文化受到行政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无限期暂停涉事公司在京、沪等地所有演出活动。

人们惊呼，文革卷土重来。“重来之说”可以警世，可以醒民，但不能触及事物的实质。“重来”只是表面，只是感觉。历史不能复制，不能“重演”。环境变了，人心变了，执政方式变了，想“重来”谈何容易！📖

【百年国史】

绘本特殊年代（八）

——漫笔文革岁月（1966--1976）

墨娃

特殊年代

墨娃
绘本

下册



·117·

文革的风暴瞬间吹进了中央广播事业局，重灾区就是中央广播文艺工团，大多数的艺术家难逃一劫。有一天，我在文艺工团的演播室外面玩。听见里面口号如雷，我跑进去一看，舞台上站满了著名演员，如侯宝林、刘宝瑞、白凤鸣、马增芳、马增慧、郭全宝、陈戈，尤其是马增芳的高帽子特显眼，是垃圾桶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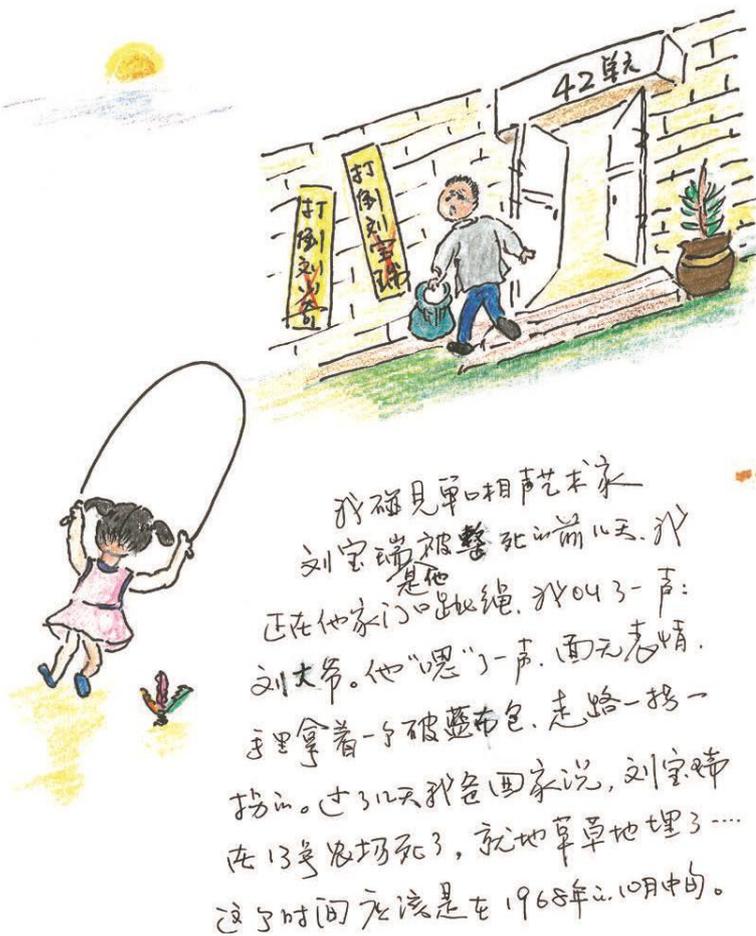


文革的烈火越烧越猛，机关宿舍大院每天都有批斗会，中央广播事业局书记丁莱夫、局长梅毅天天被揪斗。有一回晚饭我去食堂吃饭，在门口碰见发小陈小丽、彭红，她们俩哭哭啼啼往家走。我一问，原来小丽的爸爸陈戈、彭红的爸爸彭修文两位艺术家正在里面被造反派揪斗，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有人正在打陈戈……

文革烈火越烧越猛，机关宿舍大院每天都有批斗会，中央广播事业局书记丁莱夫、局长梅毅天天被揪斗。有一回晚饭，我去机关食堂吃饭，在门口碰见发小陈小丽、彭红，她们俩哭哭啼啼往家走。我一问，原来小丽的爸爸陈戈、彭红的爸爸彭修文两位艺术家正在里面被造反派揪斗，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有人正在打陈戈。



中央广播事业局在文革中揪斗整人也是花样翻新，罚跪、踢阴阳头、皮鞋踢、扇耳光、抄家、关黑屋、强光照。有一回路上碰见小工哥，他手里拿着弹弓，愤怒地说，他爸在中央台的批斗会上，被逼站在摞着两个桌子上交代问题，还被剃了阴阳头抄家，他想用弹弓子崩这帮孙子。



单口儿相声艺术家刘宝瑞先生被整死的前几天，我正在院子里跳绳儿，看见他出门儿，我叫了一声儿刘大爷，他“嗯”了一声儿，面无表情。手里拿着一个破帆布包儿，走路一拐一拐的，过了几天，我爸回家说，刘宝瑞在13号农场死了，就地草草埋了。这个时间应该是在1968年10月中旬。



公主维事

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的夫人是溥仪的叔伯
 妹妹金蕊婵，也是我们宿舍居委会主任。文革“破四旧”，让金主任
 心有余悸，曾销毁家中的细软真费了一番功夫。有一天她把家中一条
 赤金龙扔在马桶里冲，结果把单元的下水道全堵了……

·125·

中央广播说唱团团长白凤鸣的夫人是溥仪的叔伯妹妹金蕊婵，她也是我们宿舍居委会主任。文革“破四旧”让金主任心有余悸，销毁家里的金银细软真费了一番功夫。有一天，她把家里的一条赤金龙扔在马桶里冲，结果把全单元的下水道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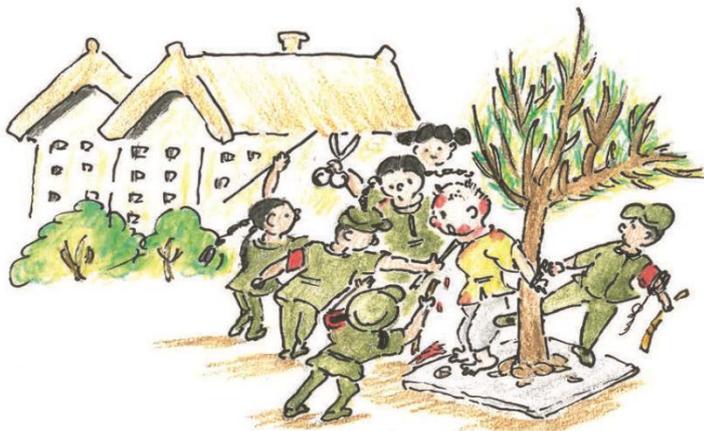


批斗公主

金主任家的下水道被堵这事，给她招来了更大的麻烦，先是抄家、挨打、批斗，后来就打扫宿舍大院。有一回批斗金主任，有人还给她嘴里、鼻子里、耳朵眼里都塞满了烟卷儿，只见她满头大汗。那时候，这个大格格才50多岁。我赶紧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妈，我妈半天说了一句：邪恶！！



金主任家的下水道被堵，给她招来了更大的麻烦，先是抄家、挨打、批斗，后来就打扫宿舍大院。有一回批斗金主任，有人给她嘴里、鼻子里、耳朵眼里都塞满了烟卷儿，说是让她抽个够，只见她满头大汗，喘不上气，那时候儿这个大格格才50多岁，我赶紧跑回家告诉我妈。她停了半天，说：邪恶！！



大院里的红卫兵

有一天,39单元的发小儿刘旭的妈妈,对38单元某女红卫兵每天疯疯癫癫,十分不满,说了几句批评的话。哪知女红卫兵仗着根红苗正招来院里一大群红卫兵,把刘旭的妈妈从家里抓走,捆在一棵小树上剪成秃子,用皮带狠狠暴打一顿,真是皮开肉绽,浑身是血。这一家人从此沉默寡言,七十年代,他们一家迁去良乡的13号工地作和生区。

这件事,打人者悄悄记在心里,至今他们没有一了出来道歉,尤其是李副局长儿子李狗顺儿……

·129·

有一天,39单元的发小儿刘旭的妈妈对38单元某女红卫兵每天疯疯癫癫的十分不满,隔窗说了几句批评的话。哪知女红卫兵仗着根红苗正招来院里一大群红卫兵,把刘旭妈妈从家里抓走,捆在一棵小树上剃成秃子,用皮带狠狠暴打一顿,直打到皮开肉绽,浑身是血才放回家。从此这一家人沉默寡言,70年代搬去良乡13号儿工地,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儿,我把打人者悄悄记在心里,可直到今天,施暴的红卫兵没有一个站出来道歉,尤其是李局长家的儿子李狗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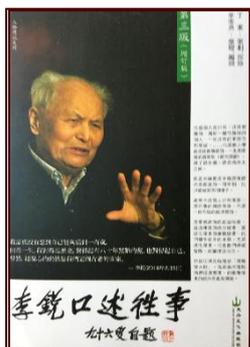


我同班的发小赵小青的姥姥是东北满族人，1947年东北搞土改，姥姥被划成地主，家里的财产被瓜分的一干二净。只好投靠在北京国际电台工作的女儿，从不抛头露面，躲过了数次政治运动，但是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小青姥姥就被揪了出来，三天两头儿被宿舍居委会拉上台批斗。更悲剧的是，还要每天早晨五点起来扫院子，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都不能差勤。那时女娃娃已是七旬的老人了……

·131·

我同班发小赵小青的姥姥是东北满洲人，1947年东北搞土改，姥姥被划成地主，家里的财产被瓜分的一干二净。只好投靠在北京国际电台工作的女儿，姥姥从不抛头露面，躲过了数次政治运动，但是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小青姥姥就被揪了出来，三天两头儿被宿舍居委会拉上台批斗。更可悲的是，还要每天早晨五点起来扫院子，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都不许缺勤。那时候姥姥已经是七旬之人了。☐

【评论】



共产党则逐步蜕变成一个控制全体人民思想的党，一个绝对不允许任何不同声音存在的党，一个彻底地反对人性、反对自由的党。

大学应当形成一种自由讨论问题，多元、科学研究评价历史的学术环境。还像过去一样的党化教育，能够教育出具有现代化的德行和学术水准的学生吗？这种状况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摘自“整风和抢救运动”《李锐口述往事》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77）

——2021，1949

李南央（美）

曾经获得普利策奖，在中国整整生活了20年的张彦先生(Ian Johnson)，在今天的三月被逐出中国，他认为那是川普错误的对华政策的结果。离开中国时他撰文说：

……这些驱逐是美国政策的直接结果。今年3月，特朗普政府实际上驱逐了大约60名中国记者，并声称此举是对外国记者在中国受到恶意对待的报复——我认为这不是真实想法。

……

然而，其主要目标与对抗中国无关；这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工具，帮助特朗普总统在秋天再次当选。如果他的强硬言论伤害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那就更好了。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是骗过美国选民，让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对新冠病毒负责，进而对疫情造成的经济萧条负责。

所以被逐出中国才让我如此痛苦。如果中国真的是1930年代的德国，而世界正走向必要的决战时刻，我可以接受离开。但中国不是纳粹德国，尽管有些人声称如此。

11月5日晚上10点，张彦从新加坡打来电话，他正在写一篇中国的很多精英为什么会支持川普的文章。尽管他似乎对川普不抱好感，感动于他愿意倾听我的看法，跟他聊了整整38分钟。末了我说：感谢你让美国人了解我们这些支持

川普的中国人的想法。他告诉我，文章大约需一周左右完成。11月10日，他在电邮中向我确认了文中引用我的谈话内容：

Li Nanyang, a writer and daughter of a senior Communist Party politician, Li Rui, has argued that western policy toward China before Trump was based on several mistaken assumptions.

One is that economic engagement is a win-win situation, with Chinese gaining jobs and prosperity, while Americans get cheaper products. Although she said that many Chinese have become more prosperous, the big winner was the Communist Party, which could shore up support at home and build a vast surveillance and military apparatus, while millions of American blue-collar workers lost their jobs.

“It’s on the backs of Chinese workers and has polluted China's environment, not to mention that the cheaper products often equals poor quality.” she told me. “This is a moral question that people in the West ignored for years.”

（李南央，一位作家，共产党老一代政治家李锐的女儿，她认为在川普之前，西方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一些错误假设之上的。其中之一就是以为经济交流是双赢局面：中国人获得工作和繁荣，而美国人获得较便宜的产品。但是她以为，尽管这让许多中国人变得富裕起来，但最大的赢家是共产党，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得它在国内得以继续维持统治，并建立起庞大的监视和军事机构，而在美国那边，造成了数百万蓝领工人的失业。

“而这些转移到中国由中国工人进行的生产，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更不要说，低价常常与低质量相伴。”她对我说，“这是西方人多年来一直忽略的道德问题。”

张彦没有引用我对他谈到的，我以为是最重要的观点：我反对拜登当选，是因为在我眼中，民主党的大佬们越来越像共产党的领导人。我举了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怒斥 CNN 主持人 Wolf 的话：“I feed them, I feed them (the people) .” 张彦当时笑了，说佩罗西是被 Wolf 质问她为何阻挠众议院通过第二个疫情救助法案气疯了。我说：“你看，你也这么说。引用这段视频的福克斯节目主持人跟你说的一样。你们都没有看到这句话本质性的错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是民选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把自己当成了老百姓的父母官、大救星。这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思维。”

等到11月25日，张彦没有发来他文章的链接。我去电邮询问，他回复说：

Unfortunately they cut it massively and everything from you was cut out! It is rather embarrassing; I do apologize. (很不幸，文章被他们大量删节，你的话被悉数砍掉！这令人尴尬，我深表抱歉。)

2015年4月，张彦曾经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有关我诉北京机场海关案的文章，Lawsuit over Banned Memoir Asks China to Explain Censorship; 2019年2月15日（美西时间）父亲李锐去世的当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悼文Li Rui, a Mao Confidant Who Turned Party Critic, Dies at 101。

2018年5月23日，30日，6月4日和11日《纽约时报》中文网曾经分四次连载过我跟鲍彤先生的对话“鲍彤再看六四”；2019年2月27日和28日《纽约时报》中文网连载我的“李锐绝唱”。

这次我本希望张彦的文章能向《纽约时报》的读者们转达李锐的后人为什么会支持川普的缘由，结果当然让我失望。张彦致歉再三，我回复他：I don't think it's your fault. I sincerely hope that your article can be issu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more completely in the future (这不是你的错。衷心希望你的文章将来能在《纽约时报》上完整地发表)。他回答了我四个字：Don't count on it! (别指望它)。

很巧，在张彦告知我的话被《纽约时报》删除的同一天，收到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的电邮。因为她是专门研究俄国和中国问题的，我曾经坦率地告诉她我反对民主党支持的“黑命贵”的政治主张，因为那跟中国共产党以阶级划分人群别无二致。我支持川普连任。她在电邮中说：

I'm sorry the election did not turn out as you had hoped. I know that must have been a terrible blow. But don't worry, America is strong and Biden is a steady, no-nonsense guy, so I have faith that we will be fine. (抱歉，选举没有如你所愿，这对你肯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请放心，美国是强大的，拜登是一个平稳而不可说废话的人，所以我坚信美国不会有事儿。)

我回复她说：

Not yet. I don't believe that the justices of American supreme court will allow Biden to be elected by what he claimed: "we've put together I think the most extensive

and inclusive voter fraud organization in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s".

I have experienced Bush, Clinton, Bush and Obama eras since I moved to the US. I have been witnessing this country sliding to the socialist system gradually until president Trump stopped it. If Biden and Democrat Party steal the 2020 election,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have less and less freedom, and the liberty will be taken away under the ruling of the Democrat Party. The Democrat Party has been very much like the CCP and will become the CCP sooner or later. The great America - the lighthouse of the world will be gone out, there is no way to lit it on again in 100 years.

American elites like you are very much like my parents' generation, they supported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system ate them first; and the 2021 of America will be 1949 of China.

I sincerely wish you are right and I'm wrong.

事儿还没有定论呢。我不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会允许拜登按照他所说的方式被选为总统：“我们已经建构了一个迄今为止，美国政治史上规模最大、包容性最强的选举欺诈组织”。*1

自从移居美国以来，我经历了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时代，目睹了这个国家怎样一步步滑向社会主义制度，直到川普总统制止住它。如果拜登和民主党成功窃取2020年大选，属于美国人民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少，人民的自主权在民主党的统治下总有一天会不复存在。民主党现在与中国共产党非常相像，它变成中共是迟早的事儿。伟大的美国——世界的灯塔将熄灭，百年内不可能被再次点亮。

你这样的美国精英阶层非常像我父母那一代人，他们支持社会主义制度，而那个制度首先吞噬的就是他们。美国的2021将是中国的1949。

我衷心希望你是对的，我是错的。

也许，只有在2021年美国成为1949年的中国，西方的精英们才能在现实中读懂社会主义；也许，《李锐口述往事》应该被翻译成英文，或可帮助这些精英不必付出亲历的代价而“读懂”。

我依然寄希望于投出合法选票的美国选民的坚韧，不屈不挠，善良和智慧，*2 寄希望于美国开国之父设立的第三权——司法独立于党派之外。2021年谁就任总统并不重要，关键是那个总统必须由具有合法资格的选民一票票选出，而不是被那个“迄今为止，美国政治史上规模最大、包容性最强的选举欺诈组织”整弄出来。大规模舞弊一旦成功，势必成为常态，共和党想在四年后翻盘绝无可能，民主党一党专政将成定局。

天佑美国！🇺🇸

2020年11月30日

注：

1. 拜登此话的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RnhBmHYN0>

2. 宾州议会听证会上一位共和党监票员的作证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embed/pEZyr3RzfyM>

一位民主党监票员的作证视频链接

<https://politicallysocial.com/dem-ballot-inspector-says-she-was-threatened-with-violence-for-speaking-up-about-suspicious-activity/>

【补白】

体验生活与调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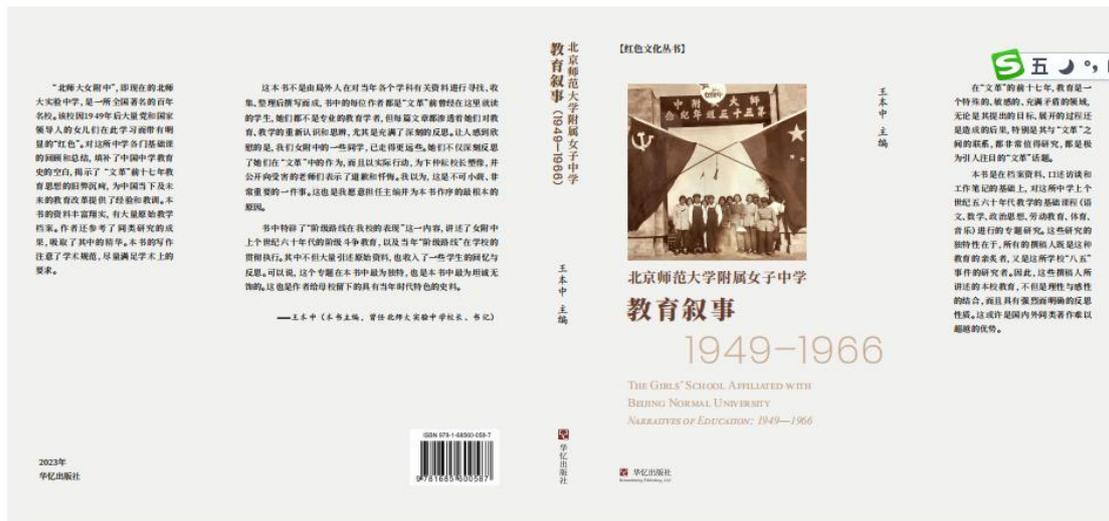
田三分

毛时代一直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下去体验生活，作家如柳青扎根农村几十年，可他写的小说，仍然与生活离得老远。演员们下乡下厂是家常便饭，可他们演出来的人物仍旧公式化概念化。反观欧美澳的文艺工作者，没人号召他们体验生活，人家却照样现实主义。你看看获得奥斯卡奖的那些演员们，演什么像什么，出神入化。他们心里根本没有“体验生活”的概念。

毛时代特别注意调查研究，可仍旧发生了大饥荒和十年浩劫这样的旷世灾难。反观欧美等国，没有一个把调查研究当成什么传家宝、基本功，可人家却不曾发生过大面积的脱离实际，违反常识的事情。这说明什么？🇺🇸

【书讯】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教育叙事：1949--1966》在美国华忆出版



主编：王本中

执笔：冯敬兰、朱晓茵、罗治、李红云、吴德菜 刘进

字数：33 万字

一点说明

北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百年名校，是北京乃至全国的重点中学。又因1949年后大量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女儿们在此学习而带有明显的“红色”。

在“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的、充满矛盾的领域，无论是其提出的目标、展开的过程还是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其与“文革”之间的联系，都非常值得研究。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文革”话题。

本书以档案资料、口述访谈和工作笔记为基础，对这所中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教学的基础课程（语文、数学、政治思想、劳动教育、体育、音乐）进行的专题研究。书中特辟了“阶级路线在我校的表现”这一内容，讲述了女附中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教育，以及当年“阶级路线”在学校的贯彻执行。其中不但大量引述原始资料，也收入了一些学生的回忆与反思。可以说，这个专题在本书中最为独特，也是本书中最为坦诚无饰的。这也是作者给母校留下的具有当

年时代特色的史料。

这些研究填补了中国中学教育史的空白，揭示了当下中学教育思想的旧弊沉痾，为中国的将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本书的资料丰富翔实，有大量原始教学档案。作者还参考了同类研究的成果，吸取了其中的精华。本书的写作注意了学术规范，尽量满足学术上的要求。

此书的独特性在于，所有的撰稿人既是这种教育的亲炙者，又是这所学校“八五”事件的研究者。因此，这些撰稿人所讲述的本校教育，不但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而且具有强烈而明确的反思性质。这是国内外同类著作难以超越的优势。

此书的主编，曾任这所中学的校长、书记的王本中先生指出：“这本书不是由局外人在对当年各个学科有关资料进行寻找、收集、整理后撰写而成，书中的每位作者都是“文革”前曾经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她们都不是专业的教育学者，但每篇文章都渗透着她们对教育、教学的重新认识和思辨，尤其是充满了深刻的反思。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女附中的一些同学，已走得更远些。她们不仅深刻反思了她们在“文革”中的作为，而且以实际行动，为卞仲耘校长塑像，并公开向受害的老师们表示了道歉和忏悔。我以为，这是不可小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我愿意担任主编并为本书作序的最根本的原因。”

全书目录：

无序之序/王本中

作者自序

第一章 1949—1966 师大女附中十七年语文教育的变迁 / 冯敬兰

前 言

第一节 辞旧迎新——建国初期的语文教育

第二节 “红领巾教学法”催生了现代语文教育的模式

第三节 “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一场重大的语文改革

第四节 语文教学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中寻找方向

第五节 突破性的语文教学改革——“周学敏教学法”

第六节 贯彻“五十条”，语文教学回归本位

结 语

第二章 数学教育

——坚守师大女附中（实验中学）优质教育的前沿 / 朱晓茵

前 言

第一节 数学教育：教育的重要基础

第二节 “老带新”光荣传统，保证了强大师资队伍绵延不断

第三节 重视教学与课改实验：不愧“实验”称号

第四节 良好的师生关系：促使学生成才的必要条件

结 语

附一：1968年前数学组教师名单

附二：本文所引师大女附中教学档案目录

第三章 浅谈师大女附中六十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阶级斗争教育”成为主旋律 / 罗 治

前 言

第一节 学校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二节 女附中学生革命热情高

第三节 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节 学校认定的“学生资产阶级思想的由来”

第五节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

第六节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路线的活动

结 语

第四章 师大女附中的体育教育/ 李红云

前 言

第一节 1949年前女附中的体育教育

第二节 建国初期女附中的体育教育（1949—1952）

第二节（应为第三节）1953—1956年女附中的体育教育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女附中的体育教育（1957—1966）

第五节 女附中的体育运动成绩

结 语

第五章 音乐课的集体记忆（1949—1966） / 吴德棻 等

前 言

第一节 音乐课教学总结

第二节 吴德棻老师谈教学

第三节 同学们谈音乐课

结 语

第六章 师大女附中劳动教育一瞥 / 刘 进

前 言

第一节 民国时期女附中劳动教育点滴

第二节 学校计划（1951—1965）中关于劳动教育的内容

第三节 劳动教育 17 例

结 语

附：“文革”中插队人数统计及通信地址（1973）

第七章 新旧巨变时期（1949—1950 学年）的女附中教学概况 / 刘 进

前 言

第一节 1949 年前后的北平和女附中

第二节 1949—1950 学年的教学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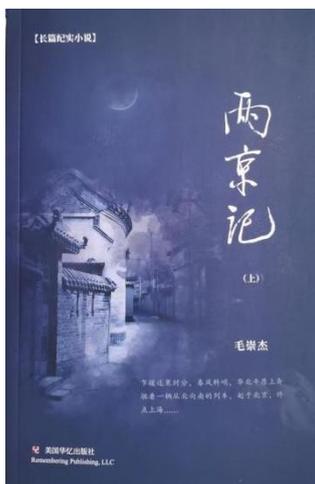
第三节 1949—1950 学年的教学总结

结 语

后 记

【书讯】

毛崇杰著长篇纪实小说 《两京记》（上卷）在美国华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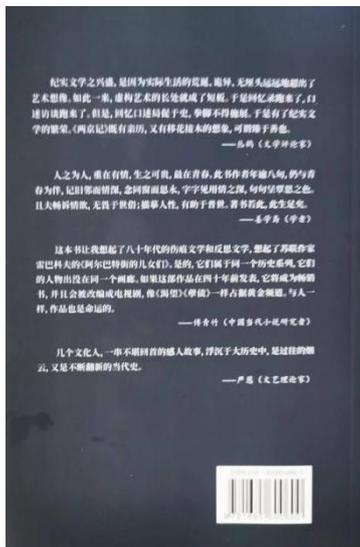
内容简介：本书以史实与文学结合的方式，讲述了20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早期的社会变迁，描写了北京、南京两地四位主角与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们颠簸坎坷的命运。经历了三年饥荒、“文革”和改革开放，他们从青少年跨入中年，以各自充满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的人生，见证了这片多难土地上20年间不寻常的历史。

作者以伍小磊与李蕾大学时代的恋爱到毕业后成婚的故事开局，交叉叙述了主人公与童年时代的邻居兰莺超越“青梅竹马”的情谊。后者在农村插队中遭遇不幸并与方乃青发生感情纠葛与婚姻风波。在曲折的个人命运与宏大的历史变故之交织中，作者对一系列政治风波、社会事件、人间百态及两性之间婚、爱与欲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哲理深度的思考与批判。



作者简介：毛崇杰（1939—），生于上海，祖籍湖北钟祥。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就职于科学出版社任编辑。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仪研读文艺学、美学专业，1982年获文艺学硕士学位，就职于文学研究所理论室任研究员，2012年退休。从事美学、文艺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主要著作：《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与现代派艺术》《20世纪西方美学主流》（合著）《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3）《颠覆与重建——后批评的价值体系》《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实用主义的三副面孔——杜威、罗蒂、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文化视域中的美学与文艺学》《启蒙 美学 文化——论集》等。

《两京记》推荐语：



纪实文学之兴盛，是因为实际生活的荒诞、诡异、无厘头远远地超出了艺术想象。如此一来，虚构艺术的长处就成了短板。于是回忆录跑来了，口述访谈跑来了。但是，回忆口述局促于史，拳脚不得施展。于是有了纪实文学的繁荣。《两京记》既有亲历，又有移花接木的想象，可谓臻于善也。

——丛鹤（文学评论家）

人之为人，重在有情，生之可贵，最在青春。此书作者年逾八旬，仍与青春为伴，记旧邻而情深，念同窗而思永，字字见用情之深，句句呈覃思之色。且夫畅诉情欲，无畏于世俗；描摹人性，有助于普世。著书若此，此生足矣。

——姜学斋（学者）

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想起了苏联作家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是的，它们属于同一个历史系列，它们的人物出没在同一个画廊。如果这部作品在四十年前发表，它将成为畅销书，并且会被改编成电视剧，像《渴望》《孽债》一样占据黄金频道。与人一样，作品也自有其命运。

——傅青竹（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者）

几个文化人，一串不堪回首的感人故事，浮沉于大历史中，是过往的烟云，又是不断翻新的当代史。

——严慈（文艺理论家）

【述往】

我在内蒙兵团的经历（五）

张保和（美）

第一次探亲

到内蒙后，当局一直不准我们回城探亲。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我们那时想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不准探亲显然是那时一个统一的国家政策。到现在，我还不懂其动机。这是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做的一系列不人道，不近常理的事情之一。让孩子们探探亲，对这个政府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反之，对那么多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对这个政府又有什么好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想各种办法回家探亲。从1971年开始，有些人的家里就给连队发来家长病危的电报。刚开始，连里还信以为真，允许一些人回城探亲。后来，知青家长的病危电报多如牛毛。各种理由五花八门。除假病危外，听说有人的亲人像祖父，祖母等早已过世多年，家里还打电报来报殇，希望以此探亲。我家里也打来过母亲病危的电报。据说父母之间为此还有过一番讨论。我父亲比较迷信，不愿被说成病危，就只好由我母亲承担这一假病危的责任。但因此类电报太多，连里也根本没有理会。

在1972年春节的前夕，连里忽然批准几乎所有的知青回城探亲。从1969年八月到那时，已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对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这两年半的时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终于，朝思暮想的这一天来到了。

首先我们从营地要走十几里去一个叫西沙梁的较大的村落坐公车到乌拉特前旗。然后再从前旗乘火车回京。在前旗火车站，遇到我的表姐，孙明琪，我大舅的女儿，当时在新安镇属于兵团二师十二团。她那天正好在前旗看病，在街上碰到我，看到我穿着又脏又破的绿棉大衣，皮帽子，像“衣衫褴褛的散兵游勇”，吓了一跳。后她送我去上火车。因为火车太挤，车厢门都没有开，我是从一个窗户爬进去的，然后由姐姐将行李递给我。

为了控制人员流动，那时买火车票都要证明。所以如果没有连里批准，连逃跑也很难。以下就是我的一张用于1974年夏回京的探亲证明。



火车上很挤，都是回家探亲的知青。幸好，上车不久，我就找到了座位。因为太饿了，我在火车上吃了两份盒饭，觉得太好吃了。路过卓资山时，又买了两只当地出名的熏鸡，路上吃了一只，带回家一只。除了吃饭外，男女知青都挤在一起，昏昏沉沉地睡觉。经过两年半的艰辛，终于要回家了，大家一下子都放松了下来，好像要把那多年的辛劳都补回来似的。

大约在第二天晚上八九点多，我在北京西站下车，回到了阔别两年半的北京。北京西站在长安街的南面，在王府井南口以东大约一站路。下车后，需要穿过长安街到马路北边去乘开往西郊阜成门外我家的公共汽车。那时北京路灯很少，汽车也很少，即使在长安街上，也是黑洞洞的。我记得和1969年我离开北京时相比，街上多了一些作为出租车的丰田车。相比北京的老汽车，这些车的尾灯很大，在晚上刹车时，在当时北京黑暗的道路上，红色的刹车灯非常耀眼。

因在内蒙很少见到汽车，使我失去过马路的能力。尽管长安街上车辆稀少，我久久不敢过马路。要看到远处有车过来，我就犹豫不决，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犹豫了几分钟后，终于鼓足勇气过了长安街，搭公共汽车回了在阜成门外的家。

那次的经历使我意识到，要安全地过马路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需要一些判断能力。首先是判断马路上车辆的距离和速度，然后以此计算车辆行驶到自己过马路那一点所需的时间。如果马路上有多辆车辆的话，还要估算多辆车辆的行驶时间。另外还要估算自己过马路所需的时间。如果马路上最近的车辆开过来的时间能很充足的超过自己过马路的时间，这个马路才可以安全穿过。城里的人一

天到晚都在过马路，以上的一切每天实践多次，可以下意识的很快完成。但对我这个在两年半时间里没有过过马路的人来说，就需要重新学习了。

在我去内蒙之前，我家一直住在东城王府井附近的一条叫迺兹府的小街上。在我走后，我家搬到了阜成门外的我父亲单位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宿舍。阜外的宿舍是几栋一五十年代盖的四层楼房。我们家住在其中一栋的四楼。我家住的那个单元有四间房。我家占两小间，设计院的工人田师傅一家占较大的两房间。敲开家门后，家里的阿姨徐阿凤开了门。刚开始，因为我的变化太大，她没有认出我，但认出后，马上把我抱住了。这时，父母和弟弟永和也从房间里出来了。经两年半后，一家人终于团聚，大家都高兴极了。家里的电灯、暖气、家具、电视、地板等等使我感到又回到了文明世界，像到了天堂。

我马上把我在路上买的卓资山熏鸡给了阿姨，但她尝了尝后，说太难吃了，就给扔了。

第二天，父亲带我去附近的澡堂子洗了个澡。马上把所有的衣服都换下来，阿姨马上发现衣服里的虱子。在澡堂子里，父亲还找人给我搓了背。好好洗过澡后，换上了新的衣服，帽子，我真有脱胎换骨的感觉。一下子，我起码在外表上和生活上，完成了从一个最底层的内蒙劳工到京城少爷的转变，但要适应北京的较文明生活，还需做很多调整。

以下是那次探亲和父母，弟弟永和在北京展览馆前照的一张相片，刚刚回家没几天。可以看出我的棉衣，帽子都是新的，但还穿着从内蒙带回来的打补丁的裤子。因为是在1972年春节期间，地上还有雪。



在内蒙，吃饭从没有桌子，都是蹲在地上吃。嘴里有什么要吐的东西，就吐到地上。刚回了家，我也习惯性如法炮制，在吃饭时，将嘴里的东西吐到家里的地板地上，这可把我母亲和阿姨吓坏了。他们教我将骨头吐到饭桌上。可刚学会了将骨头吐到饭桌上，又出了洋相。有一次，我们一家到我家的好友张天民大夫家吃饭。将骨头吐到桌上。但张大夫提醒我要将骨头吐在一个专门为此而设的小碟子里。

后来到了美国，习惯又要改变。西方的习惯是原则上只要是吃到嘴里的东西，就不能吐出来。如果必须要吐的话，要用餐巾将嘴捂住，将嘴里的东西吐到餐巾里。因为如此，美国人很少吃有骨头，有刺，或有子的东西。我曾看到美国人吃有子西瓜，非常痛苦，因为他们要用刀叉将西瓜子一个一个挑出来。但等西瓜子都挑出来后，西瓜也已经被挑烂了。我吃饭时吐东西经历了吐到地上，桌上，盘子里，和不能吐出来的一个过程，也是一次有意思的文化经历。

我在内蒙多年，从没抽烟。可能因为如此，我也从来没有吐痰的习惯。但大多知青都学会了抽烟。一抽烟就会有痰，于是就要吐痰。我在内蒙的朋友到我家来做客时，一边抽烟，一边往地板上吐痰，害得我阿姨和母亲在他走后，将地板洗了半天。在这里我没有怪罪他们的意思，只是想指出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我记得，回家的第三天，我父母就带着我和永和去故宫玩。父亲喜欢照相，照了许多相。在京时，很多上山下乡的同学，朋友也在家探亲。我们一起游颐和园、北海等公园，非常开心。以下是一张那次探亲和好友赵伦，刘光耀，李建生在颐和园石舫照的相片。



前面已经提到，我在北京探亲期间开始和胡叔叔学拉手风琴，使我在手风琴，在音乐上受到了一些较正规的训练，打下一定的音乐基础。

在京时，我家的老朋友刘大中，经常到我家聊天。刘大中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孙子，我父亲和他无话不说，两人对当时文革的各种倒行逆施痛心疾首，深恶痛绝。我因在内蒙没有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加之受到很多洗脑宣传，刚开始对他们所说的还不能理解。我父亲为此，专门跟我进行了一次深夜谈话，对我后来的思想认知有很大影响。我在本书一篇纪念我父亲的篇章里曾提到过这件事。另外在本书中一篇名为“刘大中”的章节里也讲了刘大中的故事。

在京探亲时，我有时会在夜里小便时晕倒，头撞到厕所的墙上，把头多处摔破。当时也没有太多注意。但后来被查出是一种病，导致了我病退回京。

在阜外大街上，有一次碰到原来九连的林燕南，那时他和他的弟弟林燕北已经参军了。他们的父亲好像是北京商业学院的书记，家里也住在阜外大街上的一幢楼里，后来我还去过一次。他们兄弟俩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可以说一种只有他们俩才听得懂的话。在别人面前，如果不想让人听懂，他们就用这种话交流，非常有意思。到现在我也不清楚那是一种方言或他们自己发明的话。另外，林燕南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即使在张老飞圪旦这种不毛之地，不管在什么时候，都穿着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那次我们聊了好久。但听说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的弟弟林燕北还在。

那次探亲还碰到一件只有在文革这种年代才能发生的怪事，我在内蒙期间左上边的一个盘牙坏了，在北京时去在八面槽上的锡拉胡同里的北京口腔医院拔掉并镶个假牙。我们母亲的牙一直不好，经常到北京口腔医院看牙，是那里的老病人。文革前，我妈都是找一个黄大夫看。那个黄大夫是台湾人，医术很好。不幸的是，黄大夫在文革初期就因受到残酷迫害而自杀身亡了。这次我要看牙，我母亲就带着我去找也相识的口腔医院院长，柳步清大夫。柳大夫在文革初期也被打倒，但到了1972年已经恢复了一定的职权，成了口腔医院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我母亲说明来意后，柳大夫就将我带给了一个刚刚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的年轻男性医生。我本来对医生的水平也不敏感，也没在意。可是后来，那男医生在给我装假牙遇到困难时，开始磨我的好牙齿，真的是“削足适履”，把我弄毛了。我就去找柳大夫，跟他说明了情况，提出是不是能给我换一位经验多一点的医生。柳大夫听了我的话，站起来，默默地说，跟我走吧。于是他又把我带回了那个男医生，让我哭笑不得。现在想起来，柳大夫根本不敢得罪那个工农兵医生，最后

只好把我，或更具体地讲，我的牙齿给牺牲了。那男医生做的假牙根本不能用，很快就给扔了。好在在内蒙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牙齿的用处很有限。不过后来自己当了赤脚医生，可能在别人眼里也有过“庸医乱下虎狼药”的时候，对那工农兵男牙医也有了较多的谅解。希望他的医术后来能够随着时间及经验的积累有所进步。

记得在京时，我们一些内蒙的朋友还到周建临家里去玩过一次。在他家里，我们一帮内蒙回来的野小子难免吵吵嚷嚷，但他的父亲周汝昌则完全不受影响，一直伏在桌上做学问，连头都没抬过一下。试想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普遍受到迫害，有几个人还有心思做学问。而这位周汝昌先生还能如此专注，令人叹为观止。后来我曾读到一篇周汝昌写的文章，讲述他的治学经历。其中他谦逊地说，他的才华不如他的老师胡适，都是靠勤奋和多年知识的积累，才有了后来的成就。而我们在周建临家里所目睹的就是他多年知识积累的一个瞬间。看来任何人的成功都绝不是偶然的。

这次探亲，应该是两个星期，但我在家里住了三个月。三年里回一次家，大家都要住一阵子才回去。很多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人在第一次探亲后，像前面提到的周建临，朱元星等，就待在北京不回去了。但是我的父母到了三个月时，就催我回内蒙了。如果当时我父母留我的话，我可能也就不回去了。回内蒙的时候，从北京带了很多东西，新衣服、新被褥，吃的东西等等，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我带回的新棉衣里面有一层人造纤维的衬里，有些发亮。人造纤维在当时还不太普遍。回到连队后，王世祥指导员看到我的棉衣，就很严肃对我说，你穿的衣服是缎子做的呀，一下子给我扣了一个穿着绫罗绸缎的帽子，让我又尴尬，又紧张。不过，比起当时发的质量极差的军服，我从北京带回来的衣服确实好多了。在请大家吃从北京带回的食物时也闹出些笑话来。当我把从北京带回来的巧克力分给大家吃时，我们排长老黄牛吃了后马上吐了出来，质问我给你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怎么是苦的。

在内蒙，大家都没有手表。到田里做工时，都是看太阳的位置决定什么时候下工。那次回内蒙，我父亲给了我一块手表，是一块他从前带的老劳力士手表。那时候，人们对劳力士这块牌子也不了解，在大家的眼里，那就是一块老破表，远不及当时的国产表时髦。因为年代太久，表盘已经黄了，也不准了，一天要差

两，三分钟。但夜光表盘在夜里还很亮，在内蒙因没有电所导致的漫漫长夜中，还是非常有用。从内蒙回来后，那块表又给了我弟弟用。但有一次他出差，在澡堂子洗澡时，那块表被偷了，非常可惜。现在想起来很讽刺的是，当年在内蒙做苦工，饿的皮包骨头，手上居然还带着劳力士手表。那块劳力士手表如保存到现在的，应该算是古董，很有价值了。

谈起探亲带东西，我还从北京带回内蒙一辆自行车。在1974年夏探亲前，我当时所在的水利队指导员老李托我给他买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是最紧俏的产品，需要票证，而自行车票非常难找。所以我也不敢答应他，只是说试试吧。我回到北京时，家里的一个朋友曹宝珍阿姨正好有一个车票，就给了我。按李指导员的选择，我给他从北京买了一辆飞鸽牌加重车，当时最好的农村用车。李指导员当然非常高兴，这也让我在十九团里出了名。大家都觉得我太有办法了，其实只是个巧合。

通过探亲，我们这些知青将一些北京特权生活方式带回了内蒙。就像我将内蒙的习惯带回北京一样，也引起一些不适和误解。从这意义上讲，我们这些知青多少也起到了一些文化交流的作用。

九连解散

前面曾提到，九连一共有三百多人，其中大约是男女各一半。但男生，女生相互极少往来。在一般情况下，男女生基本没有直接接触。真可谓男女授受不亲。我记得当时男生住在营区东边的几栋房子，而女生住在营区西边的几栋房子，中间则是连部的房子。这男女生宿舍之间短短十几米的距离好像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将男女生在生活，工作上完全分开。即使在连部前开会时，女生坐在西边，男生在东边，从不越界。现在想起来，这应该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

当时还有一个男女生不易认识的原因可能是那时大家穿的都是统一发的绿军装，不仔细看，很难分辨是谁是谁。尤其在冬天，大家都是棉衣棉裤皮帽子，甚至大衣裹身，连男女都分不太出来。也由于当时衣着习惯，恐怕大家对身材这两个字都没有什么概念，倒是省去了现在人们由于身材引起的很多烦恼。

在我的印象里，女生总是以一个静静的人群，不是坐着开会，就是在走路，或干活。可能女生对男生的印象也是如此。后来在九连的博客网站上看到女生喜笑颜开的相片，我竟然有一种陌生感——原来她们也会笑。

一帮年轻人来到地广人稀的大草原一起生活，一半人和另一半人还不往来，实在是不可思议，违反人性，违反常理，是个悲剧。不过可能正因为这种现象是如此违反常理，起码在九连，到后来就被打破了。打破的起因是一个非常无关的事件——缺煤。

说起煤来，大家都应该知道内蒙煤炭资源丰富，后来很多内蒙的地区因煤致富，像鄂尔多斯、乌海等地。我们连队以北的乌拉特中旗附近也有很多小煤矿，而且煤的质量也非常好。我记得曾在1974年去过一个小煤矿拉煤，还下到矿井里探险一番，对那种用人力采煤再用人力将煤推出矿井的原始方式颇有感触。可是那时守着那么多，那么近，那么好的煤炭资源，还经常没有煤烧。这也是当时计划经济，文革动乱期间的众多怪事之一。

1973年一月底打芦苇回来后，连队就没有煤烧了，连队食堂只好关门。但这几百号人不能不吃饭，于是就把粮食分到班里，由各班自己找柴火，自己做饭。男生做饭本来不在行，这时女生就自然而然来帮忙。好像刚开始时，是一个班的女生帮助一个班的男生。一旦大家有了直接的接触，几乎一瞬间里，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界限就给打破了。

和中国北方大多数农村一样，内蒙冬天没有什么农活，从打芦苇后到四月份的大约两个多月里，基本没有什么农事，主要就是政治学习，可松可紧。较充裕的时间也给男女生交往提供了机会。因为我当时是卫生员，和连干部一起吃饭，还是食堂给做，所以对这段男女合吃没有亲身经历。但后来听说，在男女合吃后，男女生之间的友谊发展迅速。在某些情况下，同吃延伸成了同住，原来不可逾越的男女分开的思想鸿沟被逾越，据说有的男女分住的宿舍成了混合宿舍，大家过起家家来了。后来据说有很多人因为那一段的经历，成了男女朋友，甚至夫妻。这实在是人之常情。起码在九连，在这件事上，人性，或更具体地说，人的求偶欲望，战胜了扭曲人性的封建传统的束缚。

但好景不长。在1973年春，十九团领导决定解散九连，其所属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团里的其他连队。九连被解散的原因众说纷纭，没有确切答案，但很有可

能和九连男女关系的解放有关。但团里的领导确实也有他们的苦衷。到了1974年，知青们已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了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到了求偶的年龄。但一旦这种风气在团里传开，就会给管理，居住，和生活都带来一系列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尽快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为妙。

我所在的二排被分到在霸头的副业连。在九连的原址，张老飞圪旦，成立了水利队，而我和连部队一些人员就被留在了水利队。因为如此，我在内蒙的近六年时间都是在张老飞圪旦这个地方度过的。

当时水利队的队长是孙？田，指导员是李果。两人都是原来农场的干部。这样，水利队就没有现役军人了。留在水利队的知青也没几个，就是文书，保管员，会计，卫生员等。

病退

诚实讲，每个知识青年在下乡后的第一天，就想要回家了。之后只要在农村一天，就在想办法回家。所以每个人在农村的经历，也是怎样想办法回家的经历。到后来，大多数知青都回到了城市，但回家的方法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回家的故事。以下就是我的故事。

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延续至今的户口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们不能自由迁移，而只能居住在自己的户口所在地。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户口从刚开始时，就从我们所在的城市迁到了农村。要想回城，就必须把我们的户口从农村迁回城市，但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记得当时有北京，上海的户口是金不换的说法。

当时那些干部子弟，特别是部队子弟，大多都当兵了。因为只有当兵不需户口，可以一走了之，不需在户口所在地办任何手续。其实对大多数当兵的人来讲，到了部队后，条件虽然比农村强，但也不是长久之地，也还要再想办法挪腾。

从1970年到1977年里，中国的大学按政治条件招生，被称之为工农兵大学，而那一个时期的大学生被称之为工农兵学员。对当时下乡的知青来说，上工农兵大学也是一个出路，就是太难。我们每年每个连队只有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要在三百多人中靠政治态度脱颖而出，那是百分之零点三的概率，机会实在是太小了。当然，如果是有过硬的后门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77年后工农兵大

学被废除，举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五，是历年中国高考录取率之最，但相比之下，还是比上工农兵大学的概率高很多。我在五连的一个朋友单伟建就是通过上工农兵大学离开内蒙的。他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对他怎样被选中的经历有非常详细，生动的描述，非常曲折，紧张，让人望而生畏。

前面提到有些人回家探亲后就不回内蒙了。但因中国的户口制度，这些人终究要回到农村办户口。后来，随着政策的改变，政府允许知青因病从农村返回城市，称之为病退。我就是通过病退在1975年春回京的，可能是最早病退的一批。

最早知道有病退这档子事，是通过水利队的文书，李宗范。在1974年四月，或五月，他就以病退为由回京了。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病退这回事，他的病退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在李宗范走后的不久的一个晚上，水利队的孙队长到我所在的医务室来，叫我随着马车到前旗去卖菜，做收发员。我本来不想去，因为坐马车时间太长，要走两天，还要在车马店过夜。为此还和孙队长吵了一架。后来指导员老李劝我，说可以坐公共汽车去，我就同意了。

在那次去前旗的公车上还遇到一件发生在另一个乘客身上的惨事。因为当时是春天，在河套地区，是引黄河水灌溉的季节。其实那时地里还没有农作物，灌溉是为了前面提到的“压碱”的目的。为了灌溉，人们将公路挖开，让水通过。这样一来，公路上出现了一条条的沟，而汽车就要越沟而过。如果汽车减速不够，就会造成汽车极度颠簸，尤其是汽车的尾部。我当时坐在汽车的中部，一个下放大学生模样的人坐在最后一排。当过一条为灌溉而挖到沟时，汽车减速不够，引起车尾极度弹起，那人从座位上被弹起，头顶先撞到了车顶，将车顶撞了一个洞，后再被反弹回来，前额撞到他座前的金属挡杆上，在头顶和前额上撞出了两个大口子，一时血流如注，场面非常恐怖。事发后，司机只好带着一车人，先将那人送往附近医院抢救。到了医院将那人留下后，汽车继续赶路。那人应该没有生命危险。那时也没有追究责任和赔偿一说，只好自认倒霉。坐一次公共汽车招来如此横祸，实在令人唏嘘。

到了前旗，因载菜的马车要到第二天才到，我就先住到了兵团二师招待所。很巧，原来九连的赵玉明那天也住在那里。赵玉明也是我的北京中学同学，喜欢泡病号。他从前经常找我开假条，和我很熟。到了晚上吃过饭后，他拉我到一位

他所认识的二师医院的王医生家里去串门。我反正也没事，就跟他去了。当时，兵团医院的医生都是现役军人，包括王医生。王医生很和善，也好客。我们在他家，就天南海北的聊天。后来王医生就聊到了前旗买菜难的事。我马上想到我就是来卖菜的，就和王医生说，我就是来卖菜的，明天就可以给他带些菜来。第二天，因为我是管收钱的，就往钱袋里放了一些钱，装了一袋蔬菜给王医生带去了。

王医生见菜大喜，一定要给我看病。我实在没有什么病，只想起一件事，即我在晚上起来小便时，有时会晕倒。在72年春节回京探亲时，曾经在厕所摔倒，将头都摔破了。以至于在夜里起来小便时，必须扶着墙以防摔倒。我将这个症状告诉王医生后，他也想不出是什么病。不过他说，我明天去给你查一查，你明晚再来。

在第二天晚上我又去时，一进门，王医生就兴冲冲地告诉我，我的病他找到了。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医书，翻到其中一页，说，你看，你的病叫作排尿性晕厥。但那本书里只是简要地描述了这种病的症状，对其病因及治疗方法都没有提及。不过，在王医生的帮助下，总算知道了一个病名。王医生又嘱咐我去看他的门诊，他会给我开了一张排尿性晕厥症的诊断书，这样，经过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开始了我的病退历程。

对于当时病退的条件好像也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主要应是长期疾病。我当时就是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从内蒙和北京两地的医院积累几个诊断书。我记得王医生给我开了大约三张诊断书。1974年夏，回北京，我的手风琴老师胡伟力的一个学生的父亲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医生。胡叔叔托他给我开了一张诊断书。我记得我和永和童年的挚友刘正的母亲，张理达，当时是东四隆福医院的医生，她也给我开过一张。到那时，我觉得只要再有一张内蒙医生的证明就可以开始办病退了。于是从北京回到内蒙后，我又去前旗找王医生。敲门后，王医生军装也没穿，灰溜溜的给我开了门。他告诉我说，他现在不看病了，但介绍我去找二师医院的另外一个罗医生。我后来一打听，原来王医生犯了作风错误，和二师医院的一个女知青发生了性关系，被停职反省了。

在当时的兵团里，现役军人和女知青发生关系的事件屡见不鲜。我们兵团二师孟姓师长涉及强奸，诱奸几十名女知青，连前来探亲的家长都不放过。事发后，孟姓师长被撤职，我们学生都非常愤怒，觉得他一定会被法办。后来回到北京，

发现孟某就住在北京白锥子海军医院附近的一幢居民楼里，颐养天年，和我们的一个亲戚是邻居。除撤职外，他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所以王医生也没涉及强奸，恐怕更不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了。

后来我就去找王医生所介绍的罗医生开证明。说明来意后，罗医生马上断然拒绝，把我从他的办公室轰了出来。我当时想绝不能功亏一篑，就急中生智，马上从前旗跑到坝头团部，通过好友刘光耀的帮助，买了二十斤乌梁素海产的黄河大鲤鱼，再回前旗去找罗医生。罗医生看到我马上说，你怎么又来了，不是告诉你不行吗？我说我是给你送鱼来了。在那时，物资极度匮乏，二十斤黄河大鲤鱼可不是小事。罗医生看到鱼后，就马上改口说那好吧，咱们去开诊断书吧。

在现在看来，这是赤裸裸的贿赂。不过现在中国的贿赂之风绝对比那时有增无减，这二十斤鲤鱼根本算不了什么了。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个相对清廉的社会生活多年后，对这些行为也有些反思。为了生存，大家都在做这种事情，不知不觉，就将整个的生存环境给破坏了。

在大约1974年八月或九月里，我把一切病退的文件准备齐全，在连里批准后，送团里去批。当时在团部管病退事宜的干部正是我的老排长蔡正福。在前面我曾提到我在蔡排长手下时，表现并不太好，主要是组织纪律性不够强。为了弥补和蔡排长的关系，我的挚友钱群特意带我到蔡排长家里喝了一次酒。好像酒水我从北京带回来的汾酒或五粮液。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每人起码喝了半斤白酒。不知和那次喝酒有没有关系，我的病退申请在团里顺利通过，很快被发往北京市劳动局做最后审批。

在北京，我们家托了和劳动局相熟的叶叔叔和邓妈妈，病退办得还是很顺利，但也还是要等几个月的时间。

在1975年三月，我的病退的文件终于下来了，我终于在同月又回到了北京。当时高兴的心情不言而喻。何锦弟记得回京后，我请了一帮在京的内蒙同学到北京新侨西餐厅吃了一顿，以示庆祝。四十年后的现在，我有时还会做在内蒙不能回家的噩梦，可见印象之深。

在我用这个神秘的排尿性晕厥办成病退后，听说九连有多人也用这个病办成了病退。这个病很不好查，除夜里排尿时晕厥外，没有其他症状。除病人口述外，无从查起。所以是办病退的理想病症。在回北京后很久后，我和在先前提到姨夫

叶笃庄谈及此事。叶姨夫有过十几年的牢狱之灾，说他也曾得过这种病。不但他自己有，当年他所在监狱里的犯人也都有这种病，就是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他还说当年犯人小便时，都用头顶着墙，以防摔倒。至此，这个神秘的病症总算是真相大白。

不过这样一个普遍，简单的病，居然在医书里没有提及病因，令人生疑。是不是又因为面子，而又成心掩盖呢？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这个病的神秘面纱对我病退来说还是很有帮助。如果大家都知道就是由营养不良引起的话，用这个病来做病退恐怕要难得多。

当初那几千万被上山下乡的青年为了回家，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利用精神病为由成功从山西插队病退。但要装精神病也不容易。除了要有不正常行为之外，还须吃治病的药，对身体非常有害。但那人后来去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在一大投资银行工作至今。看来，精神病治疗对她的影响还不太大。后来我分配工作到了这家银行，通过那里的工作，我得知让知情病退回城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的一项惠民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让知青回家，病退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而我正好赶上了一个开头。记得街道分配办公室的负责人是老卢，个子高大但有些跛。为了执行让知青回家的政策，他派我去三里河很多知青的家里调查情况。三里河附近有很多国家机关，像四部一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财政部，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所以我去调查的大多是干部家庭。大家看我来了，都把我当成大救星，向我诉苦，殊不知我也是刚刚脱离苦海的知青，实在是爱莫能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公安部的处长，被文革弄得妻离子散，向我哭诉他的冤情，让人动容。

在前面讨论过的知青回城的几种途径中，病退是最普遍的一种，大多数知青利用这个方法回了家。我觉得到后来，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什么病，不管真假，让大家都回来了。这也是一种较人道的态度。这也是邓小平文革被打倒复出后的德政之一。

回北京后，因为有卫生员的经历，我曾被分配到医院工作，但我没去。这是因为一是我对行医不是很感兴趣，另外也觉得行医责任重大，像我这样较散漫的人，可能不适合。通过关系，我在等了一年多后，于1976年冬天去了在海淀五道口的北京手表二厂工作。到此为止，我的所谓的知青生活算是正式结束。

后记

我于1969年8月去内蒙，1975年3月病退回京，从十六岁到近二十二岁，在内蒙生活了五年零七个月。对一般人来说，这段时间正是上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在这段时间里在内蒙大草原上摸爬滚打，在接近人类原始生活的状态下生活。整个经历无疑对我后来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

对我来说，在内蒙的最大收获恐怕就是友谊。在内蒙的交的朋友绝对是患难之交，像何锦弟、钱群、刘文森、胡宾、王铁岭等等。在大草原上，大家朝夕相处，互相帮助，互相依靠，互相娱乐，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在那里，我们真是一无所有，相互的友谊是我们唯一的财富。在现在的社会里，人与人这样长时期紧密相处的机会就少多了，恐怕也很少有机会形成这样的友谊了。

以下的相片里有（从左往右）何锦弟、国绍斌、胡斌、韩同礼、王军文、马伯阳、刘玉良、孙茂亭、秦江红。他们也都是我在北京中学的同学。



因为家庭条件富裕，孩子又少，我和弟弟在家里可以说是娇生惯养，养尊处优。一直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长可能会使我缺乏进取，冒险的精神。而在内蒙，艰苦的生活和生存需要逼着我去冒险，去争取。这在以后的生活里，尤其是到美国闯荡，都应有一定益处。

在生活习惯上，内蒙的经历对我影响也非常大。一个最重要的习惯就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吃、穿、住、行、卫生等等都要求不高，能凑合。但一凑合，就经常要影响到生活质量，像卫生习惯等。另外，内蒙的经历也使我喜欢自然，喜欢野外生活，对大草原很有感情，对环境保护很在意。

通过工作和爱好，上山下乡也锻炼了我在各方面的一些能力。通过当赤脚医生，开始训练了我分析的能力。拉手风琴发展了我的音乐能力，也帮助了我的记忆，后来在工作，学习中，这些能力都很有帮助。

内蒙的经历对我最大的负面影响是没有受到应有的中学的教育。后来，通过家庭的帮助，个人努力，也靠运气，不但上了大学，又有机会留学。起码从教育上来讲，和其他几千万上山下乡的青年相比，我的运气恐怕是凤毛麟角。从个人的角度讲，上学也并不一定是每个人的最佳选择，但从整体上讲，由于没有好好受教育，那几千万人的生活，事业都受到非常负面的影响。这不仅是这些人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因为缺乏教育也限制了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

对于自己文化教育上的短板，在很多方面，通过后来的学习，有所弥补，如外文、数学、科技等等。在有些方面则还是空白，像国学、化学等。但让我觉得终生遗憾的是在国学教育的缺欠。因为没有国学知识包括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我们这代人里恐怕很少有人能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

自从我离开后不到两年，兵团就被解散了，张老飞圪旦的营地被遗弃。很快，大自然就展示了它的力量，将那些土坯房吞噬，融化在自然之中，不留任何痕迹。同样被吞噬的还有曾在那里工作，居住过的三百多人包括现役军人、老兵、农场职工和知识青年的青春年华。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这些人的青春年华留下一些记忆，一些历史的痕迹，尽管可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痕迹。

在文革的各种倒行逆施中，上山下乡恐怕是最不得人心的政策之一。但这么大的一个人为灾难，竟然到现在对其也没有什么反思，甚至中国政府还在暗暗的肯定这个灾难。这种态度和对整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一致的：即恐怕否定上山下乡即否定文革，而否定文革就会威胁到这个强大而又极端脆弱的政权。

尽管是这样，还是让我们希望像上山下乡这种惨剧今后不在中国或世界任何地方重演。■

（全文完）

2020年10月20日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述往】

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十）

杜钧福

三十八

1976年另一件重要事件就是唐山地震。

文革以来，人们对地震并不陌生。可以说，文革与地震相始终。1966年邢台地震，在北京有强烈震感。我们当时还在农村四清。1967年海城地震，我们正在所里五楼会议室开会，感觉到地震就赶紧下来了。往后几年，这一带无强震发生。但1975年初，我到天津探亲时，那里正传达要预防地震，还是我写信要求延长探亲假的理由之一。但这一年未发生地震。到了1976年，人们对地震思想准备并不足。

当时，我刚出差回来。我是7月初就离京去合肥开会的，在那儿听到了朱德元帅去世的消息。开完会，有不知道谁组织去肥东县一个农村参观一项活动。当地正在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无非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类。我们只见一些人顺次登上台子作自我检讨，好象演戏一样。

从合肥到镇江，又到上海，都是为了器材。上海很不容易去，不管是出差还是看病，都要省级的介绍信。我是从院里开的介绍信。在上海站下了车，拿这封信到一个窗口办住宿。他给介绍到江西中路招待所，就是原来的青年宫。在上海待了几天，办事兼游览。也没什么可逛的，物资同样匮乏。商店前有大字告示，说妇女的裙子要在膝下一寸。

我7月25日回到天津，27日回到北京。我妻子丁馥定于29日到京出差。我没等她一块走，为的是先回来做些准备。

28日凌晨5点多钟，我在睡梦中感觉晃动，醒来后马上意识到发生地震，先是钻到床下，等震动停止后就穿衣出去。外边已聚集了不少人议论纷纷。看没什么事，又回去睡了会儿。7点多钟，我先到实验室看了看，把气瓶固定好。这天谁也不敢在房间里呆，怕有余震，都在宿舍前议论。这时，传来消息，说是在东边唐山一带。这时候我才着了急。我想，往天津的长途电话肯定不通。我就到海淀邮局去想打电报。那里人很多，但邮局规定，在电报中不许涉及地震事。我

只好打了一个问情况如何速告的电报，就回来了。这个电报到8月份才收到。

从邮局回来，我又去火车站，想去天津。我买了一张票，但没有车。很多人挤在广场上等。谁也不敢进候车室。等了一个多钟头，不像有车的样子，我又回来了。

这时，已经知道震中在唐山，天津也波及。我们几个家在唐山和天津的人都十分焦急。有人建议所里派车去天津。在没指示的情况下，所里自然不能派车。

晚饭以后，忽然得到消息：将有车去天津。我赶紧找医务室郭大夫一起去。她娘家在天津。我们到了北京站，已有人进站，是从旁边的门进去的。因为没有点，我们唯恐车开了，十分匆忙。好容易上了车，时间正好。上车不久，大约7点左右开了车。车上基本满座，但没人站。每个人都心情沉重，没人说话。有人传说，和平路一带都平了。

火车走走停停，到天津大约凌晨1点。一到站，就有人招呼赶快下车出站。整个天津站黑乎乎的，连月光也没有。我们摸黑走出站，当然也没人检票。到了车站广场，发现地上全是躺着睡觉的人。我从人之间探索着走了出去，在海河边上和郭大夫分了手。

这时，我看到，整个天津市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在星光闪烁中摸索过了解放桥，然后一直往南沿解放路下去。在解放路上，我看到旁边黑黝黝的大楼依稀还在，路面上也没有感觉到砖头瓦砾，就放了几分心。在天津市图书馆那里拐了弯。这里有一个鲁迅塑像作为标志，好找。我没到哈尔滨道的我家，而直接到较近的营口道我岳父家。到了他家门口，我依稀看到马路上也有人躺着，就问有没有49号的人。正好我的内弟听到。他看是我，就赶紧说我大姐在这儿。我才看到我妻子带着孩子，还有他们一家，都躺在铺在马路上的席子上，这才最后放了心。

我妻子看见我就掉了泪，向我讲了事情经过。我们住的院子分前后院。前院只有四间房。我家住靠里一间，紧挨着里院的二层楼。对面是厕所。斜对面是一个工人马师傅一家。隔壁是一位独身老工人，马师傅的舅舅。这天夜里，我妻子先听什么东西落在我家房顶上。她先以为是下冰雹，其实是旁边二楼上的砖震落下来。然后就感觉晃动，知道是地震了。她赶紧把儿子塞进大衣柜。过了几分钟，才感觉停止震动了。又过了一会，听里院有人出来了，在说话。她也想出去，但开不开门，因为被掉下来的砖头堵住了。后来她的同事来了，才把她解救出来。

等天稍亮一看，外院四间房，靠外的两间全倒了，主要是被二楼的砖头砸掉了顶。里面的人全被埋住。等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马师傅的两个儿子已停止了呼吸。他们比我儿子大，但也没上学。马师傅夫妇和已上学的女儿没事。舅爷在医院住了些日子也好了。小孩死亡原因是窒息。全院总死亡数为7人。我家房子由于离楼近，甩出的砖头动量小，反而安全，算是捡来的命。我四岁的儿子吓得发抖。

我们住的附近以及和平路滨江道一带还好，总体外观没什么大的变化。小白楼一带由于房子不好，位于旧河道上，损失严重。我去看了，一片瓦砾。天津总共死了两万人。大多数是挖一个大坑埋了。我岳父说他们：“未进红炉，先入黄土”，遂了土葬的愿。但非常奇怪，我到天津后从未听到哭声，甚至看不到悲戚的脸色，看到的只是麻木。好像在这样的灾祸面前，个人的不幸算不了什么似的，特别是在一系列的连年天灾人祸之后。

我到哈尔滨道我家去看，由于余震，房顶已露了天，房里积了雨水。街道上组织得很好，闲人不能进，丢不了东西。

用不着政府通知，人们都在街上搭起了抗震棚。几根木杆，蒙上塑料，里面支上床。好在天气炎热，这样就可以凑合了。除去做饭以外，白天黑夜都在抗震棚里待着，当然，也不上班。

交通邮电断绝。我在北京发的电报直到8月几号才到。我到天津以后，火车可能就停了。

我困在天津大约一个星期。8月几号，我妻子的单位用车把我们送到北京，因为他们还要完成向日本出口水果的任务。在返京路上，地震遗迹到处可见，车开得很小心。我看到公路上左右两大块水泥板之间上下可相差10厘米。

回到所里，北京也在搭抗震棚。每家发几根竹竿，在所里搭。我因来家属，也搭了一个。我妻子经常去机场办事，就由我带孩子。

这些日子传达了一个华国锋讲话。听他的意思，是针对四人帮的。这使我们都惊讶。

在抗震棚里住了大约两个星期，就搬了回去。我妻子完成任务后回天津。我家的房不能住了，她就住她娘家。儿子留在北京，后来进了我所的托儿所。

为什么住抗震棚呢？怕的是余震。余震的消息不断传来。有的是正式传达，

如预报11月15日有余震，结果没有。有的是小道消息。据分析，这些小道消息来源于内部传达，本不愿叫老百姓知道，怕乱。有一回，传这种小道消息的几个人被领导叫去训了一顿，说这是传播谣言。我们对此都很气愤，因为当时确实有这种内部传达，目的是叫领导干部躲出去。而且我们知道我院的柳忠扬就躲在我们旁边的游泳池里（冬天没水）。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游泳池外边揭露此事。当时已十月初，四人帮刚倒台，柳忠扬也快完蛋了。

11月15日预报有地震。当时地震棚已拆。有也不能住，因为太冷。我们当天住在我们新盖的实验楼里，睡在放电容器的架子下。电容器还没放上去，架子很结实，我们认为是安全的。

三十九

这年9月9日，我送我妻子到火车站的返回路上听到毛泽东主席去世的广播。对此，人们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他已很长时间没在报上露面了。然而人们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开会讨论此事。粟达人就开追悼会提醒人们回忆鲁迅先生关于谒中山陵的诗《南京民谣》：

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这诗很快被事实验证。

我想，毛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的去世也许是件好事，会有利于社会进步。

四人帮很快也垮了台。大家都很高兴，上街游行，放鞭炮。我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只有明末魏忠贤垮台时的情形可以相比。可是，魏忠贤垮台并未挽救明朝，因为很多社会问题没解决。

四人帮垮台后，占据我院领导岗位的一帮人，就是原来“造反团”的几个人，柳忠扬、王锡鹏等也垮了台。其中一位还在大会上被当场逮捕。王锡鹏被撤职的理由是他和陈伯达有关系。我所钻到柳忠扬左右的两个人，四人帮垮台后还替柳起草检查，也下来了。

院里也有少数群众组织代表，找不到任何毛病，依然在位，但位置较低，副局长之类。后来渐渐也没有了。

所里几个头头和政工组几个人也垮了台。他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特别

活跃。革委会的王佐卿被隔离审查。他原是我们红联的温和派，在“反击”时也很红。四人帮被揪出后，他私下跟一个人说，他怀疑是政变。这话被揭发出来，就被审查。

所里召开批判大会。我也发了言。我说的是在刚开过不久的院政治工作会议上，我们104组受到指责，说是不突出政治。理由是一次院里开批判大会，给了我组票而没去人。这些事当然是何木芝汇报上去的。会后她埋怨说我要把她打成反革命。

常龙存下台后，后来要出国，都受到阻挠，当然后来还是出了。此后，室一级的领导还有前造反派，但不可担任所领导。所有造反派就这样退出领导岗位。

室里也开了批判会，批判一个人的错误言论。我也发了言，批评他至今还说柳忠扬好。事后我很后悔，觉得特没意思，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完全容许个人保留诸如此类的观点，因为说柳忠扬好并不犯法。这种批判跟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又有什么不同呢？王佐卿被隔离也是一样。我们所有什么权力限制一个公民的自由呢？这难道不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批判文化大革命吗？

所里我认为比较好的领导干部郭佩珊虽没受到冲击，也靠边站了。1975年胡耀邦李昌来院整顿。李昌负责我所，来过几次，对很多极左的东西进行批判，也捎带了郭佩珊，或者说把郭放在对立面。郭当然不服，就渐渐和那些真正极左的人走在一起。我想他的晚年很忧郁。这也是一个悲剧。

所以这种事情是很复杂的，任何简单的结论都是片面的。像周荣鑫是李昌他们来院前调教育部的，在调整热潮中在教育部顶四人帮很坚定，后来予以很高评价。但他在我院时表现不出这一点。在1974或1975年初，江青曾指示，要批判孔老二在我院的徒子徒孙，就是他传达的。江青这一指示是对我院感光所一些人的一封信的批示。这信好像埋怨我院对感光所不支持，而打算成立什么脱离实际的细胞研究所。感光所研究感光胶片，直接为样板戏服务，江青自然支持。但孔老二在我院的徒子徒孙到底是谁，谁也不甚了然。似乎没揪出什么人来。这可能是周荣鑫的功劳。

四人帮垮台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超过了我的预想。我的预想是否定四人帮，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必然的结果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去，毛泽东思想依然光照千秋万代。然而渐渐看到，文革前的东西也逐渐被否定，从而走上改革开放的

道路，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实质是阶级斗争理论被否定。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统治阶级不再需要这个阶级斗争理论。不但不需要，而且他们看到，这个理论本来就是一面双刃剑，对他们来说是越来越危险。当然也可以说是统治阶级越来越开明的结果。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不能否认的，问题是如何对待。

四十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人们有的下海，有的出国，有的专心搞业务。对文化大革命，人们不太提及，而且有些避讳。

1988年，我所60周年庆祝。作为迎接所庆的一部分内容，我所一位干部李俊杰写了一部称为《物理研究所简史》的小册子，初稿放在所图书馆征求意见，打算以所的名义发表。我仔细地阅读了这部作品，特别是其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我认为其中一些记载不符事实，观点也不合党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例如他以工宣队进驻为界把清队分为两段，前段很坏后段很好。这样就把后段的清队和批清全肯定了。其实我所工宣队进驻后搞得很凶，自杀了几个人。党中央的意见，也从未肯定文革的某一段。

既然是征求意见，有意见就应该提。我写了一个意见书，但深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就去找所党委书记。我呈上意见书，说该稿有些内容不符事实，不同观点当然应予保留，但作为所里的文件应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果所里要按原样出版这一小册子，那么我要求把我的意见书印同样份数。据我所知，我是全所唯一正式提出不同意见的，虽然我和极少数人商量过此事。

党委书记收下了我的意见书，并批准复印一份，别的话没说。然而，他把这意见转达给李俊杰，李找我在所办公室谈了一次。因为他当时负责所办。谈的时候，所办的一名工作人员王成功也表示对这个稿子的不满。他说，当时我们都被打成反革命了。

李俊杰广东人，原为冯白驹将军部下，作风端正，是我尊敬的一位干部。我把我的意见悉数向他谈了。事后，他把稿子改了，以他自己名义印出了。这当然也是所领导的意见。

我的意见书内容大致如下：

对于《物理研究所简史初稿》的意见：《物理研究所简史初稿》（以下简称“初稿”）中的大部分内容，无论在取材、史实、观点方面，都很正确。但也有少部分内容，似存在可商榷之处，主要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现提出以下意见，仅供参考。

1. “初稿”认为，在运动初期，“出现了‘打倒党内当权派’和‘改组党委’的口号”。

此处只谈“打倒党内当权派”的口号。众所周知，这个口号是工厂工人孔祥宗在68集会上喊的。除此以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无这样的口号出现。孔祥宗由于喊了这样的口号，在一个很短时期内被打为“反革命”。但在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后很长的时期内，直到现在，物理所绝大多数人对于孔祥宗的行为的性质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即，他是喊错了口号，把“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几个字漏掉了，属于口误。我们现在编写历史，当然应该站在目前认识的立场上，而不应该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认识立场上，不应把孔祥宗由于口误而喊错的一句话作为政治口号来对待，从而把二十多年前的一桩冤案又重新加以肯定。

相反，孔祥宗仅仅因为喊错一句口号，就被打成“反革命”，以及物理所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其他类似事件，正表现了“文化大革命”对普通群众进行迫害的封建专制性。如果把这样的事例从这一认识角度编进历史倒是很能给人以启发的。

2. “初稿”对于物理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情况的描写与事实之间有差距。运动初期，确实出现了给所党委以及党委书记张成美贴的大字报。但给一般干部、知识分子、工人贴的大字报也不少。不能认为“逐渐把火力集中到党委书记张成美的身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6月24日以后，“火力”就一下子“集中”到一批给所党委、所领导贴大字报的人，以及在6月20日前后活跃的人身上。不仅贴大字报，而且开会批判。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不论持什么观点，都不应加以否认。

3. “初稿”中说，“‘造反派’为了彻底搞垮所党委，把运动初期党委拟的政治排队名单诬蔑为黑名单抓住不放……”。这里叙述的事实并不确切。运动初期党委所拟的并不仅是一个政治排队名单，而是一个“反党分子”名单。其中包

括“一类反党分子”“二类反党分子”“三类反党分子”各若干，共93人。而且拟定了处理办法：一些人提前退休，一些人送往外地，其中17级以上的送往某地，17级以下的送往某地，等等。

4. 关于是否“黑名单”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名单是应被否定的。首先，它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次，这一名单中的人并不是什么反党分子，而是普通干部、群众。只不过因为他们或者讲错了话，或者写错了字，或者由于什么“历史问题”，或者由于给所领导贴了大字报，或者由于在620集合上讲了话。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一来的对待。当然，其中那些给所领导贴大字报的人可能受到了当时中央文件中“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提法的影响。但是，那些给陆学善、刘益焕、陈春先、刘彭业、侯万兴等人贴大字报的人，不也可能是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法的影响吗？为什么没有受到追究、批判呢？所以，这一“反党分子”名单及其处理办法是错误的。如果真按这一处理办法执行，其后果也不会比以后已发生的事好多少。

5. 关于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初稿”中的叙述大致是客观的，但应做一些补充和修正。例如抓“漏网右派”问题。此外，在自杀的8人中，至少有3人是在工宣队进驻后自杀的（待核实）。这说明在工宣队进驻后局势并未马上好转，甚至还要恶化一些。

6. “初稿”认为，“‘造反派’一些人有反对周总理的言论”。这与事实有出入。事实是，“造反派”一些人曾私下议论（议论一词是“批清”时驻我所军代表王铁军在全所大会上说的，可认为是一种定性）过周总理，对周总理在院“文化大革命”某一阶段的某些作法表示不满。这与“反对周总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种议论从未在公开场合下讲过。至于写大字报“影射”一事，系指《梅花欢喜漫天雪》这张大字报中曾对我院“文化大革命”形势表示不满。如果对“文化大革命”形势表示不满就是“影射”攻击周总理，这种逻辑是荒唐的，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所惯用的。

7. 中世纪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过：“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国王是反叛”。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议论国家领导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领导人是人民的公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如果不许议论，如何监督？既然议论，自然有好话，有坏话，有对话，有错话。如果只许说

好，不许说坏，只许说对，不许说错，甚至私下议论，也要追究，那与封建国家有何区别？现在看来，我所的“造反派”中一些人对总理的私下议论中，有些是错误的，但也不都是那样，例如对“查三代”的看法。

8. 对于这一问题的审查、批判，主要是在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进行的，而且是这与运动的主要内容。所实行的方法，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其他内容并无区别，都是揭发一些人在私下讲的一两句话，无限上纲，说是影射。但“初稿”却把这一问题放到以后的一打三反中来叙述，与事实不符。

而“初稿”中对一打三反中的批清的叙述似也有补充的必要。在这一运动中，有一百多人被打为“516反革命分子”。从牵涉到的人来说或从持续的时间来说，都是比清理阶级队伍还大的冤案，而且是物理所建所以来的最大冤案。正如严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所指出的，抓“516”运动是对人民群众的又一次迫害。它同样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应否定。

四十一

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几十年了，但对其作结论尚早，因为有关档案尚未解密，也因为有待于时间的积淀。但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应当澄清。

首先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样的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论说是一场动乱。这是不错的。也有人说，是一场浩劫。这也不错。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第一场浩劫，而是第二场。第一场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场浩劫谁更厉害？不好说。现在都说，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也不错。但是在59至61年，只能说，国民经济已经崩溃。否则也不会饿死三千多万人。黑格尔在什么地方说，历史上的事，都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用以形容这两次浩劫很贴切。之所以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浩劫，而往往还往第一场浩劫脸上贴金，原因是第一场浩劫的受害者是知识分子和农民，没有当权者替他们呐喊。而第二场浩劫的受害者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当然也有农民。干部本身是当权者，自然首先否定文化大革命了。

其次，是谁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很清楚的，上了历史决议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它。这有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为证。虽然没有确切报道，但我估计是出席这一全会的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开展这一史无前例

的群众运动的。这当然也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之前，这两位还具体领导了一段运动。而且，我揣测，这两位，特别是刘，如果他本人未被打倒，他很可能还会继续支持领导文化大革命。当然，对文革的对象，他可能与毛泽东的意见有所不同，但从他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阶段看来，他对文化界人士和他所说的在学生中“引蛇出洞”的“蛇”是不手软的。有些领导干部，如乌兰夫，就是在这一段被揪出和打倒的，也是不手软的。现在对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一个空白，应当写一部“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

既然是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那么对于出现的问题所有会议参加者就难以辞其咎，应一起对这一历史事件负责，而不能推给群众。两年后的十二中全会，虽然参加的真正中央委员更少，但除一人（陈少敏）以外，也是全体在开除刘少奇的决议时举手赞成的。在文革初期，他们之中一些人在公开场合讲的话，很难和江青这些人的话相区别。

所以，总体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群众运动。然而，在某些文件和文章中，文化大革命成了造反派在林彪四人帮煽动下的造反史。这是很不符合逻辑的。特别是四人帮，在文革初期并未形成。而且，林彪四人帮的绝大部分作为，是代表伟大领袖的。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从来是承认这一定性的。但在其他很多场合有不同的很不科学的说法。

但这是就整体而言。如前所说，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目的可能而且肯定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彼此冲突的。因此当我们检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得失时，必须分开来看。

运动初期是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可称为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它是反对知识、反对知识分子、反对彭德怀的。所以它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极左的路线。刘少奇被打倒后，这一文化大革命路线基本被继承和发扬了。但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倒台，各个领域的管制全面放松，以至于改革开放，极左路线完全被摒弃，社会生活不仅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不仅恢复到50年代，而且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但是事情不可一概而论。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坎坷。改革开放后的若干年在经济上不得翻身（脑体倒挂），而且，在政治上和专业上从来得不到基本信任。

毛泽东回到北京，打倒了刘少奇。毛刘是权利之争，本质并无不同。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刘的有所不同。毛泽东虽然深深厌恶知识分子，但似乎对无知识或知识少的下层群众有更多的同情心，想发动群众与其政敌斗争。当然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维护干部阶层的利益的，如走后门问题。但毛的文化大革命路线有更多的可被造反派及人民群众利用之处。此外，毛对以前教育路线的批评是深刻的，虽然开出的药方完全不可行，原因是他的认识本身就有反知识的一面。教育制度的痼疾至今困扰我国的社会发展而得不到很好解决。这问题可一直追溯到毛泽东。

周恩来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周是个城府很深的人，我们不知道他的整个政治纲领。他所说的打小报告问题在文革后期大行其事，群众性专政发展到极端。有人说要把研究所办成派出所。小报告问题现在解决了，群众性克格勃已不需要。这个问题已和国际接轨，实行专业化。当然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远远没有到来。那是过于理想化的提法。

造反派利用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其政治路线是反对政治迫害。虽然说造反派被打倒，但应该说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反对党支部不再是反党就是标志。从党支部的绝对权威到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再到人民币的绝对权威，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虽然造反派被打倒，在有些地方曾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最后的结局还算宽松，和右派分子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一些民间文献开了社会改革的先声，李一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则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做了天才的预言。然而人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贡献。夏瑜为拯救人民贡献了自己的头颅，而人们却将他的鲜血蘸了馒头；丹柯高举着自己燃烧的心照亮了走出森林的道路，而走出困境的人民却踩熄了他的心。

造反派被一巴掌打了下去，但造反派的政治目的（例如反对党支部反对工作组不算反党）得以实现。这种看似荒谬的逻辑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法国历史学家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说：“他（按指罗伯斯庇尔）追求绝对权威，但在获得这种绝对权威之后他也必须采取温和手段，恐怖政策以他的失败而告终，但在他胜利以后也会结束的。”

1980年我在美国一个实验室里混事，常和另一中国访问学者聊天，有时也

谈到文化大革命。我说，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四人帮不倒台，现在什么样子？我想，可能和现在差不多。政治斗争的具体结果从宏观上似乎不影响社会的发展。他听了后，补充说，四人帮在上海发奖金。

四人帮还真有点不好说。但林彪确实是主张物质刺激的。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也批判过林彪集团的唯生产力论。陈伯达为九大起草的报告也被批为唯生产力论的。联系他在首钢的行为，这不是偶然的。至于林彪，除上述少数言论外，其政治理想和实际行动严重脱离，以至于可以说不存在林彪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批判他，只能说他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

当然，造反派的深层目的，即如何限制掌权者的权力，避免社会主义本来意义上的异化，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还远远没有达到。也许这本身就是乌托邦。我在文革开始时所思考的社会矛盾实际上是后来若干年政治斗争的主线。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看来荒谬以极。从来是党在阶级以内，是阶级利益的代表，而不是相反。但最近康晓光的一篇文章说得好，执政集团就是利益集团。他们只代表自身利益。虽然这未必是毛本人的意思，但我们不得不说毛道出了真理。所以从文化大革命来看，毛确有过人之处。

这个集团的利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损害。像北海幼儿园、八一学校这样的贵族学校被关闭，作为党员的特权（如出国）几乎消失殆尽。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像潮水一样进一步淹没了这些特权。现在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无须“特供”。作为补偿，他们从文革中走后门到改革开放以后利用职权攫取国有财产，开始了不可逆转的（除非另一次文化大革命）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并在他们中间诞生了若干新的富豪和新的四大家族。我所一位叫作陈伟力的高干子女，她的父亲素以廉洁著称。她本来是和我们一样的研究人员，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成为北京一家最大的商场赛特的老板。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过程就是从文革中走后门开始的。所以我说毛泽东关于走后门的谈话是文革中最重要的事件。

当然这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经受了锻炼，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民共过甘苦。其中的有识之士得以超越本阶级的私见，思索怎样才是一条符合所有阶级长远利益的救国救民之路。这样的人我相信是存在的。他们也许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后我走出国门，看到了德热拉斯（港台译为吉拉斯）的《新阶级》

和《不完美的世界》两书。前一本书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耳闻了，当然绝无机会看到。这两本书的名字就反映了一个从共产主义体系走出的人的思想的发展轨迹。作者在《不完美的世界》的引言中说，他在《新阶级》一书中，满怀悲愤地批判了这个体系，但仍然是使用阶级斗争的理论。直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才脱离了原来的世界观的束缚。这样一条从一元化的阶级理论到一种多元化的世界观的轨迹，是必然的规律。

从这样的多元论出发，我们平心静气地对待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把它看作人类历史上必然而不是反常的一页。■（全文完）

【文选】

“豫东事件”探秘

李素立

1966年以后，河南省兰考县及其“三害”（内涝、风沙、盐碱）因已逝县委书记焦裕禄事迹的传播而广为人们熟知。如今，人们已不再讳言：“1957年以前，兰考的经济状况很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到处是葱葱郁郁的泡桐林，很少有盐碱地，也没有什么内涝……就是因为有了1958年的‘五风’，把这一派繁荣刮走了。”“1950年33万亩沙荒，到1957年造林19万亩，只剩下14万亩沙荒了；而到1962年又增加到33万2千亩；牲畜1955年54000头，1963年减少到20800头……”

⁴ “（1962年）全年的粮食产量只有6千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⁵

兰考只是当时所在的豫东⁶灾情（史称“豫东事件”）的一个缩影。作为大饥荒时期河南的一个地区性饥荒事件，尽管其死亡人数在河南是否处在最前列尚有可议之处⁷，“豫东事件”在知名度上却仅次于“信阳事件”。这可能是因为它最

⁴ 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130页。

⁵ 陈健：《张钦礼一案的前前后后》，《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⁶ 1958年12月，商丘和开封合并为新的开封地区（1961年12月又分立），大致包括今开封、商丘两市所属各县和周口市东部的太康、鹿邑等6县，以及郑州市的中牟、后划归山东省的东明，共19县。

⁷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杨继绳先生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

早发生在1958年冬1959年春（与山东“济宁事件”同时发生），比后者整整早一年，一度引起周恩来以及省领导的重视——如果处理得当，“信阳事件”，以及全国范围的大饥荒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作为后人，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在中央和省、地工作组已做出适当应对和规定的情况下，饥荒又如何在地，乃至全省以更大规模、更高烈度重演了一次？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何？上自中央和省，下至区、县的各级领导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

如果全国和省域范围内的大饥荒研究是宏观研究，村子及家族、个人的研究是微观研究，那么地、县区域的“事件”研究则是不可缺少的中观研究。关于“豫东事件”，目前仅见的是河南省委党校范朝敬教授的《“豫东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学者余习广辑录的部分有关档案¹。但作为体制内的研究成果，范文仅述及1958年冬至1959年春豫东的饥荒（即下文的“杜集之殇”部分），对次年“更为惨痛的后果”，以及如何导致这一后果的，则予以回避。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²。

本文以相关历史档案以及笔者采访的口述资料为依据，以当时比较典型的虞城和永城两县为重点，叙述了1958年冬到1960年春“豫东事件”的全过程，及其造成的后续影响。

祸起于浮夸风与高征购

豫东是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家乡杞县所在地，也是其长期担任领导的豫皖苏边区故地。也许由此原因，这里，尤其是商丘的领导追随吴的左倾路线极为卖力。在反右派中，商丘、开封分别划右派12314和6263人³，占官方公布的河南所划右派7.2万人的14。

豫东是河南水利大跃进中“平原河网化”的典型⁴。1958年9月，商丘地委

二是南阳，三是许昌。见《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但据其父曾担任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的王先生说，“豫东事件”的饿死人数仅次于“信阳事件”，2020年3或4月某日笔记采访王先生笔记。另据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7页，庐山会议后至1961年夏，豫东惨案中，据不完全统计，因饥饿死人约在270万人，患病人数约在1130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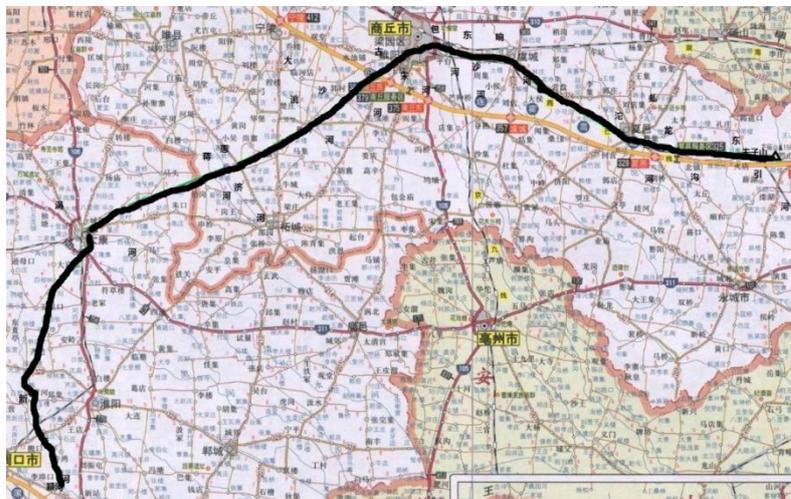
¹ 范朝敬：《“豫东事件”的来龙去脉》，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香港）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² 2014年11月中旬的一天，笔者曾问范为何未写1960年“豫东事件”，范说，省委曾发过文件，不要扩大负面材料，不让深入研究；《河南“大跃进”运动》一书出版后，就不让出类似的书了。

³ 分别引自中共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开封历史大事记（1919—2010）》，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中共商丘市委办公室等单位编著：《中共商丘党史大事记（1921—2001）》，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

⁴ 曾庆科、刘照渊：《河南的水利建设“大跃进”》，文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盲目决策兴建潘口等“十大水库”和周（口）商（丘）永（城）运河。潘口水库占地5万余亩，先后调动11万民工，完成2474万土方，迁移村庄64个，拆房1.2万间，耗费群众和国家投资2029余万元；周商永运河征用22万劳力，开挖长度225公里，完成3300万土方。均为完工后即成灾，很快报废，劳民伤财¹。这年秋，虞城县调动全县6万劳力，加上后方运输近10万人开挖“三大水库”，干了100多天，水库未成，家具和牲畜却损失很多，还影响了三秋生产。与此同时，还调动万余劳力，开挖四级河道，修筑贯通全县的百余里公路，结果河未挖成，公路又过宽，浪费了土地和劳力²。从1957年冬到1959年冬，永城县每年动用一二十万人兴修水利，新挖了周商永（永城段）、郭太、永葛、永鄆等运河以及莲花塘、跃进沟、蓄水库等，其中侯岭莲花塘占地800亩³。民工（在一些地方甚至包括女民工）在风雪中被迫脱光脊梁以示“冲天干劲”，饥肠辘辘地开展“劳动竞赛”，动作稍慢一点就会被“辩论”。由于饥饿、劳累和“辩论”，许多人死亡⁴。



（图一：周商永运河形势图）

¹ 陈剑江：《周商永运河的开挖及其教训》，文见《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207页；《中共商丘党史大事记（1921—2001）》，第255-258页。

² 《中共于（虞）城县委关于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1961年元月31日。

³ 中共永城市委党史办公室：《光辉历史——中共永城历史90年（1921—2011）》，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254页。

⁴ 综合自笔者对虞城、永城众多当事人的访谈，2015年8月下旬；2016年元月15—31日。



（图二：永城市窦石桥村村民 83 岁老人吕法田现场讲述挖郭太运河旧事，2016 年元月 28 日上午）

1958 年 9 月 15 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商丘县王楼公社的两颗玉米卫星，分别亩产 17696.6 和 14632.15 公斤。淮阳县共放卫星 8336 个，其中亩产 500 公斤以上的 68 个，城关镇蔡庄红薯甚至亩产 24 万公斤。11 月 8 日，《沈邱报》“号外”新闻称，全县全年粮食总产 59 亿斤（实际是 2.96 亿斤），平均单产 5484 斤（实际是 246.7 斤）¹。15 日，商丘地委称，1958 年全区亩产 1437.5 公斤，比 1957 年增长 13.3 倍，总产 236.5 亿公斤，每人合粮食 3000 公斤，人民吃粮标准由 180 提高到 250 公斤，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²。而事实是，该年全区总产 46 亿斤，浮夸 11 倍以上³。淮阳县上报总产 29.27 亿公斤，单产 4384 公斤，人均粮食 4300 公斤，是 1956 年美国人均粮食的 4.7 倍，英国人均粮食的 21 倍⁴。

与浮夸相伴随的是征购透底。虞城县 1958 年粮食产量本为 3.69 亿斤，县委却虚报为 11.69 亿斤，据此征购 8560 万斤，比 1957 年增长 2 倍强⁵（征购比例为 23.2%，但实际征购和外调比例要远远大于这个数。如杨集公社第二管理区，夏秋两季收粮 250 万斤，仅夏季即征购 74.4 万斤，比例已近 30%⁶；杜集公社前后王楼村征购比例 38.7%，外调比例 18.1%，合计高达 56.8%⁷）。为了完成过高

¹ 中共周口地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周口地区历史大事记·专题文集（合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24-525 页。

² 《中共商丘党史大事记（1921—2001）》，第 256, 258 页。

³ 《中共开封地委关于传达贯彻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和对地直复议平反情况的报告》，1961 年 8 月 2 日，文见：阎执荣、王道安主编：《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91-1496 页。

⁴ 邵士杰等主编：《淮阳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6 页。

⁵ 《中共于（虞）城县委关于疾病、死亡问题的检讨》，1959 年 4 月 10 日。

⁶ 国务院、省、地、县联合调查组：《关于对虞城县杨集乡（公社）第二管理区群众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1959 年 3 月 23 日。

⁷ 《于（虞）县杜集人民公社前后王楼村几个问题的调查》，1959 年 4 月 1 日。

的征购任务，县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大搞反瞒产。直到灾情败露前几天的1959年2月24日，县委还在发布指示，声称“粮食不是实际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目前应突出的做好粮食工作”¹。

1958年夏收以后，永城等9县农村即有4971人外流。到7月底，这几个县外流的人数达6500余人，其中以虞城最多，达2008人。杞县外流睢县的也有6000多人。地委把人口外流和瞒产私分看成是地富反坏右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挑动的结果，认为存在着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²。

杜集之殇

1959年豫东饥荒的焦点是虞城县杜集公社³。从1958年农历8月到次年3月初三，该公社共死亡1907人，占人口的3.6%，占全县死亡人口（6654人）的28.7%。其中最严重的是陈岗叉楼、杜集、前后王楼等村，死亡人口分别为73、134和93人，占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0.9%、6.6%和6.4%，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比例分别为93.15%、91.79%和83.87%。如陈岗叉楼的死者中，浮肿病死51人，小孩无奶吃饿死11人，上吊投水死6人，其他病死亡5人。

甚至出现“人相食”。杜集村党员蔺九先吃过一个死孩子；大吴楼吴敏发家先后吃过至少3个死孩子。群众反映，埋的死孩子往往第二天就不见了。黄塚公社陈庄大队也有两人吃死小孩，该大队500多人，死亡六七十人，死亡率也达10%以上⁴。

几乎每一份原始材料都提到有村民咽气前要馍吃或粥喝。后王楼村的王敏文，听到担任生产队长的孙女说上级派下来的粮食“还没有时候哩！”当夜绝望地上吊。在杜集公社，有15人由于饥饿或被干部所逼而自杀。

¹ 《中共于（虞）城县委关于坚决做好粮食工作，进一步安排群众生活组织生产高潮的几点工作意见》，1959年2月24日。

² 《中共商丘地委召开县委书记紧急会议 任秀铎书记在会上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全民性的宣传教育运动，本着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保证秋季大丰收的报告》（会议记录稿），1958年7月31日；《中共商丘地委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1958年8月15日，文见：《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429-445页。文中外流人口数字原为2966人，与8月13日（见《中共商丘党史大事记（1921—2001）》第254页）和8月17日分别向省委报告的4971人和4800多人相差较大，疑为4966人之误。

³ 以下关于杜集公社及其下属村庄的信息见于：《关于我县社、队干部作风的初步检查报告》，1959年4月18日；《关于虞城县杜集人民公社杜集村群众生活和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1959年4月8日；《中共杜集人民公社党委关于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讨报告》，1959年4月4日；《虞城县杜集人民公社前后王楼村几个问题的调查》，1959年4月1日；《关于虞城县杜集乡岗叉楼村群众病饿死亡和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调查》，1959年4月1日；《关于对虞城县杨集乡（公社）第二管理区群众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1959年3月23日；《关于虞城县杜集乡在群众生活方面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1959年4月12日。

⁴ 省委工作组：《关于虞城县委整风运动情况和问题的报告（草稿）》，1961年2月11日。

有人在反瞒产中被逼自杀。前王楼王荣光老婆，因营长王世德说她家有粮食，当众辩论斗争，过筛、揪头发……，头破血流还不罢手，后来就跳坑死了。王世德在群众会上说：“她死的不亏，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就该这样死。”王荣光愤怒成病，加上挨饿，随后也死了，撇一个小孩无人抚养。后王楼妇女排长王明田，因被连长杨万长怀疑家中有粮食，被批斗，过筛、拿架、揪头发，因第二天还要斗，当夜自杀。陈官氏因挖麦种时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吊打、辩论，后上吊自杀。王本登因被怀疑家里有粮食，先后被斗4次，除了拿架、过筛、拳打脚踢外，还被烧红的铁丝刺手指，昏过几次，不得不举家外逃湖北。

后王楼67岁的高德龙，因偷吃了个羊羔，被发现后连斗三次，活活斗死。陈岗叉楼张二姐，因给小孩摘一个南瓜吃，被队干部刘明然、陈世连批斗后，当夜投坑而死。陈敬善因在家里偷着烤火，在群众大会上批斗，又被画上黑眼镜、黑胡子，戴上绿纸帽子游街，气愤而死。陈西同（为破产度荒）卖掉自己四间屋脊瓦，被“辩论”一场，因浮肿不能干活，排长硬逼他去铡草，他害怕被斗，上吊自杀。

这个冬春，除了反瞒产，还进行了“搞投资”。公社党委规定，金银财宝、烟土、30尺以上的布、现金、猪羊、老年人不戴的银器、首饰充作投资。干部据此挨家逐户搜查，只要搜出的东西就全部拿走。将外面寄给社员的信撕毁，寄的钱扣下。还将社员集中起来，以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为名逼着报投资，不报不散会。崔油坊队长李万平、崔远安等一次斗争21个妇女，让跪在砖头上，逐人搜查。又把任菜园的范秀荣拉到屋内坐老虎凳，逼出人民币19元、银洋4元，还是嫌少，威胁还要狠斗，逼得她当夜抱着3岁的儿子投坑自杀。吴楼连长吴敏位，在吴刘氏家翻出一点烟土，当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推、打、摔，直至其口吐鲜血而死。

陈岗叉楼支书王世德公开声称：“100人有99人骂才算是好干部，你们都死完，剩我一个人也得搞社会主义，你们三天不吃饭也得喊大跃进！……”不许白天埋死人，说死十个人才值得埋，死一两个算啥！为了表示冲天干劲，刘明然等还强迫妇女上身赤裸劳动，并与参观人员握手。任菜园排长梁道立，亲手假活埋过3个群众。界沟乡王桥大队李庄、吕楼两村80%的群众挨过副队长代明扬的打，他最多一次“辩论”过17人。

据统计，全县有违法乱纪的干部 625 人，占干部总数的 6.43%，其中捆绑吊打群众的 163 人，逼死人命的 11 人。摧残群众的形式有：罚饭、罚跪、捆绑吊打、挂琉璃（吐到脸上不许擦）、老虎挂金铃（脖子上吊土坯）、鬼吹灯（头朝下倒吊）、过筛（在其他地方叫炒盐豆子）、拿架（两腿撑开，两上肢抬起，翘起脚尖）、画花脸、假活埋、揪头发，踢打乳房、裆部等几十种刑罚。

干部违法乱纪与上级的纵容不无关系。上级故意把干部调到外村去工作，因为这样能与群众撕破脸。杜集乡 349 个连级干部中，有 66 个不是本连的；680 个排级干部中，有 46 个不是本村的。

还有所谓“大搬家”“大清洁”。全乡全部或部分搬出的村子有 114 个，占总村数的 50.22%，3526 户 1 万余口人被迫搬离家园。有 416 户数户同居一室，352 户数代居一室。有 6 个村子和 1452 间房被扒掉，另有 2432 间房闲着不让人居住。为了“清洁”，每家只允许留床、桌和柜子“三大件”，其余全部拉走，作为投资或者干脆丢掉。有的群众几个月内竟然搬家 9 次（豫东有的群众搬家达 18 次¹）！

全县外流 4571 人。由于“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表现”，“敌破分子破坏煽动



外流”²的定性，官方以专政手段对付群众外流。有些地方提出口号：“同志们，加油干，到处捉流窜”。杨集乡组织大批民兵扣押和驱赶外流人员。三连连部每晚都扣留一二十，甚至几十“流窜犯”。有人在正（图三：

笔者赴杜集镇实地调查，摄于 2015 年 8 月下旬）月初一看到，有 40 多人被绑着送到乡里去了³。还以“回乡企图不良，影响群众外流”的罪名扣留了戴文荣等 4 名回乡探亲的湖北工人，开群众大会批判，并送“立功场”劳动教养⁴。

¹ 范朝敬：《“豫东事件”的来龙去脉》。

² 中共虞城县委、县人委会：《关于外流人口情况的报告》，1959 年 2 月 23 日。

³ 《关于对虞城县杨集乡（公社）第二管理区群众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

⁴ 《杨集乡委员会关于非法扣押湖北工人的检讨》，1959 年 3 月 24 日；联合工作组：《虞城县杨集扣押工人戴文荣等四人的检查报告》，1959 年 3 月 27 日。

再堕地狱之路

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全开封地区共有各种病人334202人，其中浮肿病者136114人，并因此死亡7232人，占死亡人数的43.46%。全区外流人口累计达71384人¹。

这些数字显然被大大缩小了，因为仅永城一县同期因浮肿病、白喉以及老年人就死亡14000人²，而虞城县也死亡6654人。另据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者路宪文回忆，1959年春，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饿死十几万人，河南省委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³。时任开封地委第二书记的张申在接受独立制片人胡杰采访时说，关于1958年底1959年春的死亡人数，商丘原报饿死8万人，他下去调查，发现饿死了12万人，然而最后河南省委只向中央汇报饿死5000人⁴。与此对比，济宁专区从1958年冬至1959年春共外出逃荒14万余人，因营养不良造成水肿病人62万余人，非正常死亡2756人，牲畜死亡率在50%左右⁵。可见，“豫东事件”并不比“济宁事件”为轻。

大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无力自救，只有少数有正义感的人士甘冒风险为他们“鼓咙胡”。虞城县委1959年3月20日报告，自元月份以来，由中央转来人民来信5封，省委转来7封，加上县委收到的共20封，其中揭发农村生活和干部作风的16封，控告性质的2封⁶。0220部队以该部全体官兵的名义向农业部长写信，反映虞城、夏邑、永城等地群众“生活非常的苦”、干部“打骂和辩论”⁷；0222部队战士苗海旺，返乡探亲后，向“中央人民委员会负责同志”写信，反映家乡王楼乡苗楼村群众生活和干部管理方式方面的问题⁸。

1958年，商丘行署分给永城县的粮食征购任务是5000万斤，实际征购1.3亿斤（总产量近3亿斤），造成征购严重透底，缺粮8000万斤。12月，在县委

¹ 范朝敬：《“豫东事件”的来龙去脉》；《中国共产党开封历史大事记（1919—2010）》，第139页。

² 《中共永城县委关于原定朱嘉美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论的甄别复议报告》，见于中共永城市委老干部局、党史办公室编印：《朱嘉美回忆录》，第102页。

³ 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ajd/jwxd/article_20140219100888.html。

⁴ 胡杰先生谈话，2016年6月13日于郑州。

⁵ 李伟、王毅：《“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

⁶ 中共虞城县委：《关于人民来信检查报告》，1959年3月20日。

⁷ 范朝敬：《“豫东事件”的来龙去脉》。

⁸ 联合工作组：《关于苗海旺反映虞城县王集乡（社）苗楼村有关群众生活等问题的查证情况》（后附苗信），1959年3月27日。

书记韩文明等人去省里开会的情况下，县长朱嘉美、县委副书记陈家恩、丁慎礼等人决定向地委如实汇报。朱嘉美亲赴开封找地委要粮，受到专员任秀铎的严厉批评，但还是要来4000万斤粮食，极大地缓解了永城的灾情。1959年2月20日，永城县委在鄆城公社王集召开反瞒产会议，对朱、陈、丁等进行批判斗争，并私自撤销其职务¹。

2月25、27日，一封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群众”的来信终于获得副总理李富春和总理周恩来的批示。3月初，国务院人员会同河南省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由常务副省长赵文甫、开封地委第一书记陈冰之亲自带队，奔赴虞城等县调查。虞城等县大量饿死人的盖子终于揭开了。3月30日，在赵的指导下，开封地委制定了《关于解决当前群众生活与干部作风的十项紧急措施》（以下简称《十项措施》），主要包括做好粮食供应，加强食堂领导与管理，保证群众吃饱；限期扑灭浮肿病；改进干部作风等²。经过一个多月的的工作，基本制止了饥饿、疾病以及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就在苗海旺、朱嘉美们为危境中的乡亲们大声疾呼时，毛泽东率中央和各省市大员正云集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从2月26至3月7日，毛与吴芝圃等河南省委，以及新乡等地市领导至少五次座谈（开封地委领导出席一次）³，但毛并未过问新乡、商丘发生的饥荒。原因可能是毛没有注意到苗海旺们的信件。

当然更可能与毛的心态有关。1957年6月，中央曾因广西平乐、荔浦等地饿死550人撤销了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一大批省、地、县干部，但1958年夏秋，谢富治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云南省几个月死了将近4万人，毛泽东不仅没有处分谢，还表扬其检查写得好。这一方面固然由于灾荒、饿死人，在近代，包括中共建政之后司空见惯，如1954年和1958年春天，都曾发生全国大面积的灾荒，出现逃荒、饿死的情况。日复一日，决策层势必因这种缺粮、饿死人的司空见惯而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从毛泽东到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习惯

¹ 笔者采访朱嘉美的笔记，2016年元月20日下午；《朱嘉美回忆录》，第43—44页。以下关于永城材料，除特别注明外，均参阅该笔记和回忆录，另参见《风雨岁月——阎廷瑞同志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曹仲田：《骇人听闻的历史大悲剧——永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追记》，见于曹仲田著：《秋之韵》，中国诗词出版社2009年版。

² 《中共开封地委关于解决当前群众生活与干部作风的十项紧急措施》，1959年3月30日，文见：《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1229-1236页。

³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625页。

于以战争思维来思考建设问题。毛就曾多次讲，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死些人是必然的，这总比打仗死人少。1959年全国15个省发生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与往年相比，持续时间更长，灾情更严重。其中尤以山东济宁地区为最（李注：未必重于“豫东事件”）。毛泽东采取的对策却是：“硬着头皮顶住”¹。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批评了“共产风”，要求“以队为基础”，“尊重价值法则”，但他却根据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得出“全国（除少数灾区外），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的判断（虽然他说瞒产是由于“共产风”，即“我们要得太多”引起，并说“瞒产私分极其正确”）²。更关键的是，毛始终坚持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允许人们对“三面红旗”质疑。他对“大跃进”的干将吴芝圃虽有些“批评”，但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其左倾蛮干，直到“信阳事件”败露前他对吴一直是信任重用的。领袖如此心态，这是豫东、河南，乃至中国走向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

赵文甫返郑后，在省委常委会上反映豫东饿死人的问题，并建议在全省普遍检查一次群众生活。吴芝圃批评他大惊小怪，不看大方向。在压力下，赵做了检讨。庐山会议后又因此受到“右倾”的指责³。虞城县杜集镇后王楼村民王万训说，赵文甫走过一个月左右，省里来了几拨人来调查赵在杜集如何开的会，都说了啥⁴。

这年夏的庐山会议使几个月的“纠左”过程逆转。河南继上年反“潘杨王”后，再次掀起反右倾巨澜，在全省重点批判了32115人，定为严重右倾错误的党员16235人，县以上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189人⁵。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因反映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说大办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化太快了，被省委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省委常务书记杨蔚屏说：“庐山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⁶。省委将开封地区作为全省反右倾的典型，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组织部长张健民亲到开封地委坐镇，又批判副

¹ 杨奎松：《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http://history.sohu.com/20131119/n390331320.shtml>。

²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603、606—607、614、623页。

³ 林宇、薛中原：《赵文甫传》；王宏范、傅振武：《深切怀念赵文甫同志》，两文均见于傅振武主编：《纪念赵文甫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5页；《刘峰谈文革前河南省委内部的斗争》，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229。

⁴ 王万训，1940年生，2015年8月22日中午采访于虞城县杜集镇王楼村。

⁵ 《李立同志在省委五级干部会议上关于全省整风运动的总结发言》，河南省委1960年3月3日转发。

⁶ 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专员续凯、杨体泽、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向明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¹。就连地委第一书记陈冰之也被定为严重右倾错误²。

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与对1959年“豫东事件”的认识、处理，以及地委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无关系。开封地委1961年8月的一份文件称：

陈冰之、张申等同志对我区1959年春季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任秀铎、马振藻同志³，为掩盖错误和问题的实质，对地委关于形势的分析和十项紧急措施……心怀不满……。反右倾运动以来任秀铎同志就乘机反陈冰之、张申同志及其他同志的所谓右倾，把地委对1959年春季形势的分析和十项紧急措施……当成右倾的主要内容和对象，大肆进行批判斗争。……任秀铎、马振藻、张立水同志把在地委和地委各部的原在开封地区工作的干部，圈成了“反党集团”。……据初步统计，地直机关被批判斗争和处分的155人，其中原开封地区的党员干部128人，占82.6%；科局长以上党员干部被批判斗争和处分的49人，其中原开封地区的42人，占85.7%⁴。

在永城县，县委书记韩文明将县长朱嘉美和副书记丁慎礼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家恩已调往外地）。先后批斗朱42场，每次一进场就是毒打。朱回忆说：“不承认，非打死我不可。”据统计，全县被打的县级干部2人，正副科级干部61人（内有公社书记7人），大队干部174人，小队干部1079人，群众10813人，当场打死92人，自杀48人⁵。

大跃进的战车再一次启动。11月17日，省委转发信阳潢川县委的反瞒产经验，在全省进一步推动以“两条道路斗争”解决粮食征购问题。

12月中旬，地委在郸城县召开了核实产量的现场会议，对全区的反瞒产起了示范作用。随后在永城、夏邑等县先后发生了反瞒产，以致逼死人命的问题，不仅产量、口粮都未落实，群众还吃了空头粮……⁶

¹ 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9页。

² 张林南：《河南的“反右倾”运动和继续“大跃进”》，文见《河南“大跃进”运动》，第405—420页。

³ 任为合并前的商丘地委第一书记，马为商丘地委组织部长，对合并前的商丘浮夸和饥荒负有主要责任。

⁴ 《中共开封地委关于传达贯彻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和对地直复议平反情况的报告》，1961年8月2日，文见：阎执荣、王道安主编：《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1491—1496页。

⁵ 笔者采访朱嘉美的笔记，2016年元月20日下午；《朱嘉美回忆录》，第43—44页。

⁶ 《中共开封地委关于去冬今春粮食和安排生活中，发生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疾病死亡的检查报告（草稿）》，1960年10月21日，文见：《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1373—1381页。

仍是一年前的“剧本”：浮夸—高征购—反瞒产—饿死人，死神再一次在豫东大地肆虐。

1960年更惨烈

豫东这次饥荒远较上一年严重。仍以虞城县为例¹，1960全年死亡14909人，死亡率2.64%（前两年则为1.58%和1.48%）。该年也是1949年以来虞城唯一的人口负增长年份，净减7493人，净减率为1.328%²。

1959年虞城粮食总产2.2亿斤，县委却定为2.8亿斤，接着就是征购透底。1959年县委先后召开五次反瞒产现场会议。稍岗公社书记甄万臣，召开了200多人的社员大会，连续开了三天三夜，不报粮食不散会，报了就验收，验收没有就大会斗，斗争的手段有推、拉、打、过筛、蛤蟆拱泥、看飞机等。

虽然上一年地委《十项措施》（第九条）中提出，改进干部作风，坚决反对违法乱纪，但由于没有制度保证，成了一纸空文。大侯公社李各大队支书李公典，从6月15到8月11日，亲自捆绑吊打群众48人。60多岁的社员李关久，因开会晚到一时，被打得左腿掉■（字不清），一只手稀烂，爱人和儿子被逼逃跑在外，下落不明。张绪清一次买了瓜吃，被污为偷别人钱，被打昏过去，还抹了一嘴屎。魏振海因吃一把青麦，被逼上吊自杀。稍岗公社杨庄大队杨庄生产队长杨文斗“辩论”过全队50%的劳力。社员杨文中因偷吃队里一个南瓜，斗争后又拿走小锅，逼得杨当天上午上吊自杀。潘井公社张关庙大队潘井生产队长杨双龙，以动员投资为名，到处搜刮民财，硬说社员袁素贞家有70块银圆，把袁吊在梁头上，袁嚎天哭地，他坐在一旁喝酒谈笑，直到袁昏过去才罢休。刘凤亭家1958年因无钱投资，60多岁的父亲被逼死，爱人被打昏过去两次，9岁的孩子头被打破，耳朵被打肿。刘本人被迫外逃，不到一个月病死在安徽南宿县。1959年9月，60多岁的社员孙志中，因拔草未往队里交，杨即组织大会斗争，把孙的小锅摔了，不让吃饭，将孙逼死，第二天又将孙的棉袄扒去，将其兜里的钱装进自己腰包里。

¹ 本部分除非注明，均引自：省委工作组：《关于虞城县委整风运动情况和问题的报告（草稿）》，1961年2月11日；《中共虞城县委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和生活安排中发生食堂停伙、疾病死亡、人口外流的初步检查报告》，1960年12月1日；《中共虞城县委第一书记袁乃训同志在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动员报告提纲》，具体时间不详；《中共虞城县委关于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1961年元月31日；

² 《虞城县志》，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0页。

干部对粮食的截留、挪用、贪吃多占进一步把社员推进死亡的深渊。谷熟公社第一、第二书记丁世魁、米长春、社长梁保华等，不顾群众死活扣住粮款不发，挪用 1.8 万元救济款修建会议室、住室等建筑，购买发电机等设备。有的生产队食堂停伙，造成疾病流行和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他们却隐瞒事实。梁还私立政策，叫群众兑钱吃饭和以工分发馍票，兑上钱就吃饭，兑不上不发饭；能劳动者吃到应得的标准，劳动不够的少吃，不劳动不让吃。群众为了吃饭，不得不卖房子、卖破烂。年老体弱者，甚至垂危的病人，为了吃饭也要劳动。该公社阎屯大队社员阎家祥，被大队长打得快死了，仍被逼去拾粪，拾了 4 天就死了。董新庙大队长魏振金，在 1960 年春天公社检查病情时，为了掩盖灾情，把 3 个重病号锁在屋里，一天不让吃饭，结果两天之内 3 人全死了。姚庄大队耿庄生产队魏学友，未经批准去探亲，回来后被队长姜公义罚出粪 30 车，完不成不叫吃饭，魏饿着肚子干了两天两夜，劳累加上饥饿，得病而死。姜为了斩草除根，又借口代销未交上利息，逼魏的弟弟魏学志投井自杀。李庙大队业大庄小队长李修君，以搞资本主义为名，半年逼死 5 条人命；73 岁的马陈氏全家 3 口人，被逼死 2 口；社员宋玉兰被连斗 5 次后，送到水利工地罚劳役，三天不让回家，致其不到一岁的孩子被饿死。宋庙大队裴窑生产队长裴久才，把群众 12 两的口粮扣去一半，病人一顿只让喝两碗稀汤，自己全家 7 口人，吃饭不定量，其妻生孩子，一个月补助了 180 斤。全队 5000 斤红薯种，被其家吃掉 1500 斤；850 斤花生种，被其贪污 400 余斤。结果该队死亡 33 人，外流 36 人，牲口死亡 10 头。社员金位三家 3 口死绝，裴久田家 7 口死亡 3 口。

官方继续打击“盲流”，甚至比上一年更为严厉。公安机关设岗立卡，把“流窜犯”拘留，强行劳动改造。1960 年全县共拘留 500 多人（其中县委批准 44 人），扣押 1000 多元。界沟公社第二书记张聚明组织 50 多人截路，共劫取 500 多元。一个老太婆走亲戚拿的 11 个熟鸡蛋，也被当场吃掉。谷熟公社谷熟集大队治安主任鄢希贤，带领民兵截路 50 余次，劫取 164 元，粮票 62 斤，各类财物若干。

不过，虞城的灾情在开封地区远不是最重的——在 1961 年元月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永城、夏邑等 9 个“烂掉或基本烂掉的三类县”中，并没有虞城县的名字¹。而在 1960 年 11 月 3 日地委关于灾情的排队中，虞城等 8 县仅为

¹ 《中共开封地委关于召开地委全会彻底揭盖子纠正错误的请示报告》，1961 年 1 月 27 日，文见：阎执荣、王道安主编：《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 1424—1426 页。

轻灾县，此外民权等6县为重灾县，永城、夏邑等5县被定为特重灾县¹。

以整个豫东地区灾情最重的永城为例，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间，因饿死、外逃、外迁等原因减少人口11万人，其中青壮年死亡12869人；另据一份材料，“五风”期间，永城死亡74142人，浮肿病人64606人，牲口死亡33957头；县志载：1957年该县人口74.3万，1960年66.7万，净减人口约7.6万²。侯岭公社白庄原有155人，仅1960年上半年就死亡52人，占33.5%；马桥公社何庄原有65户287人，1960年春死亡125人，约占43.6%，死绝12户，死得仅剩一个孤儿的11户。

据朱嘉美、胡子芳（时任县监委副书记）等老人介绍，1959年冬1960年冬的饥荒，永城县南的马桥、裴桥、双桥、新桥等公社最为严重，尤其是马桥，全公社5万人，竟减少1万人。在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紧急时刻，这些公社的书记和县委书记韩文明竟然拒绝上级拨付的统销粮！1960年10月的一份地委文件也称，永城、夏邑等县的领导曾向地委反复表示不要款、不要粮³。

韩还对上级派来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的工作组封锁消息，要把他们安排到县委小灶吃饭（未遂）。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书记整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工作组亲眼看到城北一个小庙里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韩却瞪着眼说：“那是（安徽人）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工作组成员周化民当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但他还是回去报告了实情，却被地委行政科长叫去斥责，收去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下放巩县钢铁厂劳动⁴。更令人发指的是，鄆阳公社的何全德夫妇，被发现吃人肉后，竟在公社书记的授意下由公社社长、政法部长和武装部长等将二人请到公社，以关心生活的名义用砒霜将其毒死以灭口！

¹ 《中共开封地委关于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专题报告》，1960年11月3日，文见：《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1382-1387页。

² 《永城县志》，第540页。

³ 《中共开封地委关于去冬今春粮食和安排生活中，发生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疾病死亡的检查报告（草稿）》。

⁴ 任彦芳：《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第31页。



(图四：朱嘉美夫妇与笔者合影，2016年元月20日下午于永城)

1961年1月的一份地委文件称，1959年10月1日到1960年9月底，全区共发生疾病1329224人次，其中浮肿病237004人次，死亡254526人，占总人口的2.39%；外流人口93435人；死亡牲口104031头，占总数的11%；荒芜土地656796亩。

三年来，共平调土地605332亩、牲口49623头、大件农具1303757件、房子998526间，毁村庄2713个，扒房子909425间，共造成损失2.567亿元。

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地直机关开了330个辩论会，其中就有254个打人，占84.6%。全区三年分别发生违法乱纪177980、196736和231068起，违法乱纪干部分别为70353、67862和82225人，打死、逼死、扣粮饿死47514人（约占死亡人口的18.7%，对比信阳事件，非正常死亡107万，其中被打死、逼死8万¹或6.7万²人，可见豫东干部违法乱纪的严重性要高于信阳）。

不少县、社书记玩弄女演员、女招待员。有些负责同志以看病为名，带着干部、医生、女护士、通讯员前往沪宁苏杭等地游玩。地委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该文件最后承认，这些问题与1959年春的“豫东事件”没有认真检查处理有直接关系³。

¹ 余习广：《信阳事件：商城惨案中干部对民众毒刑汇集》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23016.html>。

²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

³ 《中共开封地委关于召开地委全会彻底揭盖子纠正错误的请示报告》。

无独有偶，1993年，路宪文临终前也认为，河南省委对1959年春饿死人的新乡、商丘等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做了批评，而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这是1960年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¹。

灾难影响到几年后

由于处于河南偏远地区，地瘠民贫，不像处于亚热带的信阳那样物产富饶，更由于导致浮夸和征购透底的制度未有根本改变，在大饥荒三四年后，豫东还未从饥荒中恢复过来。

虞城县自1960年9月到次年5月总发病10.4万人，其中浮肿病3.44万，均大大超过两次饥荒的病人及浮肿病数（1959年这两个数字为1.3万和5914人；1960年为2.3万和3148人）；10到2月分别死亡958、730、711、879、723人，也接近或达到1959年饥荒的死亡水平（月均951人）²。

而据刚分立的商丘地委1962年1月27日报告，全区现有各种病人299602人，其中浮肿148051人。最严重的商丘县，有各种病人60015人，占总人数的11%，其中浮肿病39346人，占病人数的65.5%。夏邑、鹿邑、宁陵、柘城病人均在2万人以上。全区有10%左右人口的地区疾病很严重，一般达到小队总人数的30%左右，个别的达到50%。如鹿邑县太清公社五门大队康庄村有各种病人130人，占总人数的48.2%，高集公社侯关大队姜庄一小队有浮肿病人63人，占总人数的44%。全区11月到元月20日，分别死亡2892、3101和2982人³。

2月底，浮肿病增到16.4万。到4月中旬，这个数字更剧增到30万人左右。据永城、夏邑等6个县的8个生产队统计，现有浮肿病1014人，平均占总人口的55%。永城龙岗公社华陀大队检查了630人，其中浮肿病即有374人，占59.4%；虞城县大侯公社小徐庄生产队33户，户户有病人。全队在家89人，面有饥色“黄

¹ 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² 《中共虞城县委关于疾病死亡情况的报告》，1959年3月31日；《中共虞城县委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和生活安排中发生食堂停伙、疾病死亡、人口外流的初步检查报告》，1960年12月1日；虞城县委救灾办公室：《关于去冬今春生产救灾、生活安排总结》，1961年6月11日。1960年冬1961年春的浮肿病数，是根据治愈的浮肿病人30283占总数的88%计算得出。1959年月均死亡951人是由1958年9月到1959年3月底死亡人数6654除以月数7，平均而得。考虑到冬春死亡率与夏秋相差较大，而1960年的死亡数据为全年数据，故相应数据无法计算。

³ 《中共商丘地委关于当前疾病和人口死亡情况的第二次报告》，1962年1月27日，《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601—603页。

肿烂胖”的即有78人，占87.6%，其中12户38人全家浮肿……全区元至3月底共死亡13227人，比年前3个月死亡人数9240人增加了43.1%。据睢县等7个县统计，现有外流未归人口94410人，个别小队外流人口达50%以上。因为生活困难，睢县群众3月份卖家具的15289户，卖家具52342件，卖衣服的48140户，卖掉衣服127521件。河集公社尚庄大队变卖衣服、家具等破产度荒的户占总户数的70%。社员王学成全家6口人，已将被子、衣服卖完，现在夜晚只盖一条麻袋。黄岗公社92户扒卖房子141间。睢县发生卖小孩、送小孩27起，送童养媳的14起。宁陵县刘楼公社符老楼大队李玉朋家4口人，3个小孩已送给人家2个。郑庙小队张世振要以300元卖掉妻子，因妻子不同意未遂。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据睢、宁等4县统计，已有23起¹。

1963年，河南省不同程度存在春荒的人口近千万人，其中严重的有350万人，主要分布在豫东陇海路两侧和豫北京广路以东各县。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的兰考和东明、开封、永城、宁陵等豫东各县春荒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权等4县占1/3以上。全省外流人口已增加到11万多人，其中开封、商丘两专区就有9.8万余人。宁陵县有五种病人1.06万人，比春节前增加41%，外出要饭的有3.2万余人，破产度荒的有5.3万余户，卖衣服3.4万余件，卖家具4.2万余件，拆卖房屋8600余间。卖送子女、有夫改嫁、幼女早婚、因生活困难自杀等均有发生²。

6月中旬以后，即麦收刚刚结束，豫东人口外流再次急剧上升，少数灾县比春荒时还严重。据兰考等9县汇报，外流人口有10.7万人。兰考、民权等7县有30%的生产队发生人口外流，其中外流人口达20%以上的生产队884个。兰考县外流人口6月下旬每天200人左右，7月猛增至每天两三千人，到10日，外流已达1.54万余人，占总人口的4.3%。民权县外流人口约2万人左右，占全部人口的5%。郑州铁路局乘车灾民由6月下旬的每天3万人，7月初上升到4万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豫东灾区的³。

这年5和8月，商丘全区暴雨泛滥，夏邑老城进水，商丘、永城等6县县

¹ 《中共商丘地委关于灾区生活安排中几个严重问题的报告》，1962年4月14日，《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621—626页。

² 《河南省春季生产救灾工作会议纪要》，1963年2月26日。

³ 河南省人委生产救灾办公室：《关于目前豫东部分灾区人口大量外流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3年7月12日；何伟：《关于豫东十个灾县人口外流情况的报告》，1963年7月15日。

城被洪水包围。到8月15日，全区积水面积1453万亩，占秋季实播面积1577万亩的90%，被水包围的村庄20019个，占总数28000的71%，其中进水村庄11034个；麦后以来共泡塌房屋112万间，占全区总房数270万间的40%；因塌房砸死209人，伤2533人。灾情如此重，雨大雨猛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是“1958年搞水利乱控乱蓄，打乱了水系……”¹“豫东乱挖水利，破坏了原有的排水系统，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年年遭灾……”“平原地区盲目引水，导致豫东沼泽化盐碱化严重，涝灾面积由55年的500万亩发到60年的900万亩。到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20万亩，破坏了农业生态。”²因此，豫东是在为前几年“平原河网化”的“伟大成就”“还债”。

1964年春季，商丘一些社队仍有逃荒要饭、破产度荒、卖儿卖女、有夫改嫁、浮肿变色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现象，截至1月中旬，全区浮肿、变色达50万人³。1965年8月初，商丘铁路沿线人口外流急剧上升，各车站共进灾民46432人，其中本区灾民占72.3%⁴。

至于原因，以上报告均不讳言，这些灾区过去几年“五风”严重，连续遭灾，群众家底薄，抗灾能力低下；另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发生征购透底，再加上口粮标准偏低，红芋（薯）比例大。而在各地浮肿病人中，属于旧病复发的占80%左右⁵。

结 语

“豫东事件”是较早发生的地方性饥荒“事件”之一。由于大办水利、大炼钢铁、浮夸风、高征购以及“一平二调风”等，豫东地区在1958年冬1959年春已经陷入了饥荒。由于中央和省地工作组的介入，地委制订了《十项措施》，再加上“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的宽松政策，饥荒得到缓解。但随着1959年夏的

¹ 《中共商丘地委向中央、中南局、省委慰问团的汇报材料》，《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821—823页。

² 《刘建勋在全省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暨高产单位会议上的讲话》；徐海亮：《建国初期治水方针刍议——兼以河南为例》。分别转引自刘小冬等：《刘建勋陈舜英画传》，（香港）中国展望出版社，2013年版，第63—64页。

³ 《中共商丘地委财经会议总结》，1964年1月17日；《中共商丘地委关于目前灾情与措施的报告》，1964年1月27日；《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887-900页。

⁴ 《中共商丘地委关于夏季人口外流情况的报告》，1965年8月3日，《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文献（1956.9—1966.5）》，第1102-1103页。

⁵ 《关于目前豫东灾区部分人口大量外流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共商丘地委关于当前疾病和人口死亡情况的第二次报告》；《中共（虞城）谷熟区委员会关于六二年元月份人口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

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倾，大跃进的战车再次开动，浮夸风、高征购再到饥荒的“剧情”再次重演，终于豫东导致了更大范围、更大烈度的饥荒。

从众多关于地方性饥荒“事件”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1955年的“广西事件”开始，接着是云南“陆良事件”，再到“豫东事件”“济宁事件”，这些都是1959年冬1960年春全国性大饥荒的前兆，或者说是警示。如果处于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治理体系下，全国性大饥荒，甚至之前的许多这些“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关于干部的违法乱纪问题，早在1952年12月，毛泽东就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于次年元月5日作为中央文件发出¹，并据此发起了一场为时半年的“新三反”运动。但由于体制原因，以后几年，干部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在全国一直相当普遍，到大饥荒时，更是成了除饥饿外农民死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豫东，1959年3月，《十项措施》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保证人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坚决反对违法乱纪”，然而在1960年的饥荒中豫东干部的违法乱纪比1959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全区打死、逼死、扣粮饿死农民47514人（约占死亡人口的18.7%），比著名的“信阳事件”的同一比率还要高。

由此可见，1960年豫东饥荒的重演，表面上与毛泽东、吴芝圃等中央及省级决策者的个人因素有关，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缺陷——“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²，“缺少民主是相当关键的一条”³。正是基于此原因，大饥荒三四年后，豫东人民仍备受饥饿之苦。■

此文首发在香港《中国密报》总第84期（2019年9月号），但该报删除了此文的所有注释。本刊重发此文，意在保留并展示此文的原初面貌。

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3-5页。

² 杨继绳：《永久的墓碑》，《墓碑》“代前言”。

³ （印度）阿马蒂亚·森，让·德雷兹著，黄飞君译：《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第89-90页。

【资料】

关于革命领导干部吕应中同志材料汇编

（内部参考，请勿外传）

清华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

《正确对待干部》战斗组

1967.11

最高指示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目 录

- 1, 我们对吕应中同志的基本估计
- 2, 吕应中的简历、家庭及社会关系
- 3, 1957年6月4日在物理教研组的发言

- 4, 吕应中与旧北京市委的关系
- 5, 吕应中与蒋南翔为首的前党委的关系
- 6, 北大社教与清华假社教
- 7, 关于吕应中参加黑帮核心组会的初步调查
- 8, 吕应中对待毛泽东思想言论

团派《1042》战斗组整理

一、 我们对吕应中同志的基本估计

吕应中同志现年 41 岁，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家庭。1948 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系地下党）。50 年于清华毕业后，曾任教务处教研科长，科学处科研科科长，到文化大革命前任工程物理系×××专业教研组主任、副系主任、清华试验化工厂党总支书记、副厂长、总工程师等职，59 年起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家庭及社会关系见附件二）

了解吕应中同志工作情况的人普遍反映：十几年来，他一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有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充足的革命干劲。对党交给的任务，能够做到知难而进。在院系调整后的教改、建立新专业、建造试验化工厂、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在困难条件下，表现出强烈的革命精神。

吕应中同志本人生活也比较简朴，不特殊化。他翻译（翻译工作是业余时间做的，对解决新专业教材起了一定作用）所得的稿费，除他爱人生活用去几百元外，其余的 6000 余元全部交了党费或交工会作为职工的困难补助费之用。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吕应中同志的表现都比较好。

解放初期，在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夺学校领导权、反对教授治校的斗争中，吕应中同志的立场是坚定的，当时在教务处、科学处均与右派分子钱伟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领导各系党员系秘书（当时没有系党总支）开展工作，在与各系资产阶级教授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吕应中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号召，在学校中坚决反对钱伟长之流教授治校的主张，积极促进教学改革的工作。但是，他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对解放区教育毫不了解，由于没有能识破刘少奇、蒋南翔等一小撮，借学习苏联为名，行扼杀抗大式学校之实，搞全盘苏化的阴谋。在工作中盲目跟

着蒋南翔，不加批判地全盘学苏联，把修正主义的一套搬进了清华，犯了路线性质的错误。

在肃反运动中，吕应中同志立场鲜明，在他负责的外语教研组（当时在学校是一个政治情况复杂的单位），放手发动群众，揪出了5个反革命分子。

五七年整风反右初期，吕应中同志在校外实习，5月27日回校，当时校党组织瘫痪，他没有得到党委任何指示。6月4日参加了基础课物理教研组的一次鸣放会，由于对形势认识不清，对工作做了一些检讨，做了有右倾错误的发言。

（见附件三）这个发言被右派利用来向党进攻。但他对右派的言论是反对的，后来很快认识到右派在向党进攻，6月8日作站起来坚决斗争，在和清华园的大右派钱伟长的斗争中他是坚定的。

58年，在全国大跃进的鼓舞下，也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激励下，吕应中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伟大号召，领着一批几乎毫无专业知识的年轻教师、学生和工人，提出了要做“阶级斗争战士”“建设祖国×××事业的春天”的口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做马粪纸模型开始，着手筹建××××××。从上马开始，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吕应中同志注意紧跟毛主席的指示，按毛主席著作办事，比较注意政治挂帅和发动群众，注意科学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经常引导群众把具体的科研生产任务和国际上反帝反修斗争联系起来，从而激发起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怕艰苦地完成任务，在任务紧张的时候，首先注意抓政治鼓动，同学们曾经编边了“艾森豪威尔访日本”等反美国活报剧，来鼓舞斗志。经常教育群众做普通的劳动者，通过群众辩论，批判了“集体放卫星，个人当来伊卡”的个人主义思想，提出了“要做彻底的革命派，树革命的事业心”，经常号召群众要用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工作。群众根据主席教导，分析了×××，发现它也是纸老虎，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许多技术问题迎刃而解。他反对专家路线，反对少数人冷冷清清搞科研，主张大搞群众运动，他反对迷信洋人，反对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一再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后又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赶”“超”的口号。吕应中同志能够身体力行，大部分时间在现场和工人教师学生住在一起，参加设计与现场施工的部署，并参加一些劳动。

59年国内及校内都刮起了一股右倾风，右倾机会主义者要否定党的三面红

旗。但吕应中同志坚持了党的路线与党的教育方针，顶住了这股歪风，进一步发扬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精神，在有些人走回头路的时候，在二机部的一些国内外“专家”们的反对声中，他提出了要建造“零功率某某某”等新任务，在有些人要力图恢复旧教学秩序的时候，他提倡“教师教学生，学生教教师”以及“结合任务学课程”的“新型”教学方式。八届八中全会前后，他在右倾机会主义进攻面前政治上坚定的，但是由于当时对待蒋南翔等一小撮的右倾机会主义本质没有认识，所以也执行了旧市委和旧党委在反右倾斗争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即在学校中大抓所谓“新富农”），吕应中同志也批判了某些具有错误观点的基层干部的群众，矛头向下，压制了不同意见，从而帮助了蒋南翔加强了对党员的控制，压制他们的造反精神。

在苏修反华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吕应中同志始终坚信三面红旗，坚信党的领导，正确理解八字方针，尽管当时有许多困难，本人身体一度患病，但他精神基本上是振奋的，工作积极向上，这与有些人动摇、消极、颓废形成了极明显的对照。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国防科研方面，大搞取消主义，大刮下马风，而吕应中同志却坚持认为×××××是国家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并没有被这股歪风吹倒。这样吕应中同志和群众在一起，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下来，继续为国家建设×××基地而努力，并通过建×××成长了一支专业队伍，准备了以后跃进的条件。

61年刘邓黑司令部批发了《高教60条》，蒋南翔欺骗干部说这个文件是毛主席同意的。吕应中同志路线觉悟也不高，没有能认识其修正主义实质，以为方针路线没问题，但是对《60条》中削弱党的领导，恢复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位；取消学生劳动；否定前两年教育革命中取得的成果，恢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纯课堂教学；提倡“填平补齐”助长业务第一、理论第一和个人主义，……等等是有不同意见的。

蒋南翔、何东昌（前党委副书记）主张教学要以“理论为轴心”，提出在学校中应该是“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吕应中同志自58年来对此一直持有不同意见。他提出了“在战斗中成长”，“见人见×”的口号，并坚持了58年后教育革命的一些成果，为此引起何东昌的不满，后来，1964年何东昌抵制毛主席春节指示，在教务处订了一套不许革命的“条例”，吕应中又背着何东昌

反对这些“条例”，搞了一些教学改革，这些改革虽然没有触及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要害，现在看来仅是一种改良，但是它反映了当时吕应中同志对待春节指示的态度与何东昌之流是相反的，对现有教育制度是不满和力求改革的，并实际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在他听到65年底毛主席与哲学工作者谈话的传达之后，就努力体会主席指示的精神，着手总结几年来教改的经验，可是这份总结后来却被蒋南翔用来装潢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吕应中对现有教育制度的某些不满还反映在他反对现有留苏的研究生培养的道路是“本本第一，个人奋斗第一，论文、学衔第一，脑力劳动唯一”的道路。在蒋南翔、何东昌亲自狠抓因材施教时，规定每个专业要选拔几个“尖子”多学数理化，吕应中同志却要求这些同学去工地多参加一些劳动，在劳动中锻炼成长，抵制天才教育。

64年中央号召学习大庆时，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并未贯彻执行，但吕应中同志在200号却较积极地贯彻执行了，特别是领导广大群众按毛主席指示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号召“摘掉×××事业落后的帽子”，因而工作出现了新的跃进，在当年国庆节前，零功率×××及屏蔽实验室×××先后建成投入运行。在×××建成之后，吕应中同志没有故步自封，立即组织主要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一方面总结了六年的经验。一方面提出要寻难而进，争取挑重担子，主动为国家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所以从65年先后研究了××、××、××的设计和实验。吕应中同志在选择这些任务时，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是本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原则，体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具体工作中能从国际上尖锐的阶级斗争出发，立足于“打”，能比较自觉的与其他人在国防科研工作中所推行的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些任务上的反映做了斗争。

66年5月-6月吕应中同志作为中国高教部科学技术代表团的一员，去英国考察×××事业，在出国考察回国总结的过程中，吕应中同志政治上是坚定的，业务上也做了一定贡献。

但是由于吕应中同志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了家门就进校门，没有深入过工农群众，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因而在蒋南翔统治清华时期犯了许多错误。他的主要错误是：

(1) 吕应中同志几年来存在许多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尤其是对要大抓学习“老三篇”、突出政治，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认识不足。虽然他主观上努力在科研工作中运用、学习毛主席思想，并提出过反对“资产阶级科学拜物教”等正确的口号，但是过多地、片面地强调在业务领域中的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及学习方法论、认识论去掌握客观规律，犯有“政治落实到业务”的错误。例如，65年学习王杰运动时，吕应中同志提出“一为三不做”的口号，即“为人民，不做洋人的奴隶，不做自然的奴隶，不做旧习惯势力的奴隶”，这个口号抽去了学习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核心即破私立公加强“人的思想革命化”的问题。在刘邓陆蒋等一小撮走资派挥舞“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棒，压制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候，吕应中同志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不支持群众挂语录和学语录，不支持“天天读”。甚至有一次在讲党课时还传达了旧市委散布的，借一个团支书淹死的事，污蔑群众学毛著“死学死用，学死用死”的一段话，和他听到的其他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话。这样，吕应中同志有时不自觉地成了刘、邓、蒋之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传声筒，在群众中起了很坏的影响。

(2) 中了刘氏《黑修养》的毒，忽视了阶级斗争，忘记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没有弄清在教育战线上，特别在清华大学党内还存在一小撮走资派，更没有认识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反右以前，吕应中同志还比较注意党和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夺学校领导权的斗争，反右以后，蒋南翔宣扬：“现在党的领导权的问题解决了，今后主要要在业务上超过钱伟长他们。”吕应中同志接受了这套理论，于是把几乎所有的精力转移到攻尖端上来，走了一条重业务、轻政治的道路。64年之后蒋南翔惊恐万状，千方百计歪曲主席指示和中央文件精神，硬说“清华工作方针、路线是正确的”，“清华成绩是主要的”，“清华是高教战线的大庆”，“清华和大寨一样是一二类的，不存在夺权问题”等等，吕应中同志相信了这套鬼话，他把蒋南翔看作是党的化身，处处紧跟“南翔精神”，对蒋南翔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毫无认识，从而犯了许多政治上的错误。吕应中同志和广大群众一起苦干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如×××的建成），经验总结（如《六年的奋斗，四个方面的丰收》和《×××专业八年教学小结》等）都被蒋南翔用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资本，维护其对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吕应中同志对此阴谋未能察觉识破，因而工作起来十分积极，结果是越“积极”

起的坏作用越大，例如吕应中同志为66年高教科研展览会上展出×××××出了不少力，自以为是为了“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和自力更生的科研道路”，但客观上却是为蒋南翔、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涂脂抹粉。

(3) 由于吕应中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所以他对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没有认识的，对高教《六十条》的修正主义实质也是没有认识的，尽管在局部问题他曾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但就总体来说，旧的一套和他的世界观是比较吻合的，他所贯彻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是蒋南翔的一套，他所贯彻的阶级路线基本上是所谓“重在表现”的彭式阶级路线，并且积极地宣扬清华成绩，维护全日制多科性工业大学。他对工农同学不够关心（突出表现在对物407班的态度上），不重视和工农相结合，不积极支持同学去农村参加社教运动，反而提出“在实验室中也可改造世界观”，“实验室中也能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的错误口号。吕应中同志本人以及他引导同学所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工农、脱离劳动的“三脱离”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6X年底全国理工院校教学会议上，许多同志严肃地批判了高教《六十条》，吓得陆定一、林枫、蒋南翔等亲自出马压制批评，会后又组织了会议参加者参观试验化工厂，想借建成试验化工厂的成绩掩饰他们在教育战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蒋南翔通过何东昌向吕应中布置，在参观介绍时要强调一下从积极的方面理解《六十条》。吕应中同志认为陆定一代表中央已经肯定了《六十条》，所以在介绍时，执行了蒋、何的指示，客观上吹捧了修正主义纲领，帮了陆定一、蒋南翔一伙的忙，起了很恶劣的影响。

(4) 由于吕应中同志对蒋南翔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没有认识，所以在几次政治运动中不自觉地不同程度上执行了旧市委和旧党委一小撮所制定的反动路线，客观上迎合了蒋南翔之流“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阴谋。例如在59年反右倾中，蒋南翔提出打击“新富农”，吕应中打击了一个党员教师赵某某；63年五反时执行蒋南翔之流的指示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导到去解决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65年初在党委一小撮的指使下，全校搞党员清理思想，形“左”实右，去整一般的党员，实际上是执行蒋南翔之流抵制社教运动的计划；吕应中也忠实地在200号工地执行了这个计划……等等。

(5) 吕应中同志由于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怪，所以他不能根本改变轻

视工农、轻视群众的恶习。虽然在200号工地上，教员、实验员和工人之间在政治、工作、生活方面的差别比学校其他单位要小一些，但仍然有较大的差别。吕应中同志只重视少数他认为有“才能”的人的意见，对于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工人师傅是不够尊重的，较冷淡的。工人同志反映吕的官架子很大，生活上对有些群众的合理要求照顾不够，工作中很少注意发挥工人师傅在科研中的积极性。即使在教师和干部中也不是平等待人，而常把自己看作是党委的代表，常常独断专横，排斥压制不同意见。例如在对待陈××同志及李××同志的问题上都存在错误，由于他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有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资产阶级观点没有很好改造，所以使他在工作中主观上愿意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走群众路线，大搞辩论运动，而在具体执行中常常犯有许多错误，对群众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常常有所暴露。

(6) 吕应中同志虽然在反对三建某些领导产值挂帅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反对×部某些人墨守成规、爬行主义的过程中表现了应有的原则性，但在工作中也常常暴露出他严重的本位主义和风头主义，尤其是六四年×××建成之后更为严重，自高自大，尾巴翘得很高。他看不起有些兄弟单位，有时还在群众面前错误地贬低兄弟单位和夸大取得的成绩，借以抬高自己，有时则把彼此间不同意见不恰当地上纲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兄弟单位交给的协作任务不太积极，而对别人为自己服务时要求却很高。例如66年×部×所委托我们完成屏蔽实验的任务，由于吕应中同志认为该实验的意义不大，自己的方案比别人先进，所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方案，仅安排了少数人搞协作任务，只要求按时完成任务就行了。这些说明了他在工作中夹杂有使清华和本人一鸣惊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动机。

吕应中同志缺乏工农感情，不注意爱护国家的财产，又听不进群众意见，自以为是，瞎出主意，加以缺乏经验，所以在施工和设计中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浪费和积压了部分物资。群众和上级对此提出批评后，吕应中还不能虚心接受，常常说：“要算政治账”，“我们是战略上节约，战术上浪费”，以此抵制批评，不愿好好触及灵魂，认真地检查。尤其严重的是，66年初三查运动中，吕应中同志害怕领导发现他工作中浪费严重的现象，向工地干部和群众做了层层布置，掩盖真相，隐瞒错误，欺骗领导，抵制三查。这是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次暴露。

吕应中同志对国家的必要的规章制度（如卫生防护制度等等）不够重视，有

时为了怕上级部门“干扰”或贪图方便，采取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包括弄虚作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曾经用一个实验室的名义去订购另一个任务所需要的设备；又如61到63年曾派出许多同志到全国各地跑材料（当时全国有这股风），盲目抢购，违反了国家计划……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在工作中吕应中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产生了不少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

文化革命开始之间，吕应中同志正好出国，当他回到清华时，刘邓派的工作组已进校十多天了。工作组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对干部进行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吕应中同志一回到200号工地就被带上了高帽子，游街斗争。在工作组的指使下，许多事实被歪曲夸大，再加上不少没有根据的怀疑和“无限上纲”，就把吕应中同志打成了“土皇帝”，“大黑帮”，从那时起，到今年七月中（红旗评论员文章发表三个月后）一直被实行“专政”，进行“劳改”。还在很长时期内不许看大字报，使吕应中同志长期与群众隔离，不能和群众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段时间内，他醒悟较慢，对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很不理解，对群众运动很不理解和对蒋南翔等一小撮迟迟不能彻底划清界限。

例如66年12月份，他受到了刘冰等人的影响，在工地菜窖“劳改”时向同时劳改的干部说过一些保蒋性质的错误言论。在言论中也流露出感到委屈和不服气的情绪。

直到67年《红旗》第三期社论发表之后，一开始还只承认清华的某些工作是修正主义的，后来在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教育下，才开始逐步认识到蒋南翔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但是即使到目前，他的认识也还很不深刻，三划一站做得不够好，对待200号工地有些群众对他采取的过火行动感情上还有些抵触。

然而，即使在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吕应中同志始终没有动摇他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

66年6月回国后，他在知道自己被打成黑帮的情况下，仍能以极认真的负责的精神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写好出国考察总结，后来在66年10月到67年初之间吕应中同志还被“专政”“劳改”时，出于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热爱，出于对国防任务的焦急心情，曾先后六次写报告和信件给当时200号工地厂文革的负

责人，汇报了自己对国防科研任务的看法，对某几项具体工作的建议，并表示愿意参加一些具体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还很深，结果吕应中同志的这一革命行动反被某些人说成是向革命派“夺权”，从而罪上加罪，完全剥夺自由，使他再也不能发表意见。

67年7月以后，在井冈山414的革命小将帮助下，吕应中认识到自己不能再闭门思过，坐等“定性”，决心杀向第一线，大造刘、邓、蒋的反，他检查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拿起笔写了许多批判刘、邓、蒋的文章和大字报，并且积极准备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的大会。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大地鼓舞了他，激励了他的革命斗志，他主动地到群众中去做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他学习了王少庸、姚力等同志敢于革自己“私”字的命的精神，决心到对自己意见最大的群众中去，尤其是到要打倒自己的群众中去，他多次到要打倒他的群众中去，虽然被坐了喷气式，晒了太阳，背上被贴了条子，赶出房门等，他仍然坚持去。目前200号的群众已经多次组织了对他的批判帮助，吕应中觉得收获极大。现在吕应中说，“斗批走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不想走，我在200号犯了错误，跌了交，我总结犯错误的经验，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批判，能使我们以后更好的工作，我一定要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一辈子。”

吕应中同志在蒋南翔统治的十几年中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都犯有许多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我们从各方面调查了与吕应中同志的全部历史及全部工作，我们认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是努力去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和蒋南翔、旧市委等一小撮除了工作关系外，没有任何黑关系，他是犯有路线错误的干部，但他不是反动路线的制定者，而是执行者和受害者。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而又不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结果。他犯错误还由于中了《黑修养》的毒，忽视了阶级斗争，忘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接受了刘少奇的奴隶主义的结果，同时也是受了旧市委与蒋南翔等一小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蒙蔽的结果。吕应中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对他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要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热情地帮助他做

好三划一站，要给予机会让他在文化大革命及抓革命促生产的过程中建新功，立新劳。

总之，我们认为吕应中同志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我们就是要应该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

以上就是我们对吕应中同志的基本估计。■

【附件一】

二、 吕应中简历及社会关系

（一）简历：

1926年6月24日 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1938年到1944年 在四川江津中学读书

1946年10月到1950年8月 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读书

1948年10月 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加入中共地下党，介绍人赵葆元（吕同班党员，现在北京）

1949年12月 转正，转正后补期延长两个月

经调查，吕应中同志入党问题是清楚的，手续是完备的。当时清华地下党组织分南、北两个系统互不联系。南系为46年从昆明西南联大迁来部分，归中央青委领导（在北京的负责人是刘晓，在清华的负责人有荣高棠）。北系为原留北京部分归北方局、北京城工部领导（系彭真、刘仁系统）。吕应中是由同班党员赵葆元介绍加入南系党组织。转正时后补期的延长据本人说及调查当时的负责人反映原因是思想作风上有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大。无其他政治原因。

1949年 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青年团团委委员。

1950年9月到1952年8月 任清华大学机械系助教，教师党支部委员，后任支书。

1952年8月到1955年 任清华大学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后期任清华党委委员。

1955年到1958年 任科学处科研科科长，兼任科学处党支部。

1959年起至文化大革命 任清华党委常委委员。

1958年到1963年任工程物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后任副系主任，61年后提升为副教授。

1963年到1966年任清华大学试验化工厂副厂长，总工程师，试化厂党总支书记。

(二) 吕应中的家庭及社会关系：

1. 家庭：

父 吕 ■（字不清） 江苏丹阳人，现年71岁，无党派，无宗教信仰，全国政协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早年教书1922年到1952年一直在一个私立的佛学研究机构中研究佛学，1956年到1961年左右，在南京参加编写佛教百科全书。

母 吕 怡 无党派，无宗教信仰，原为小学教师，结婚后无工作，1942年去世。

弟 吕应三 现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党员。

弟 吕应运 现清华大学试化厂。

爱人 陈槐庆 清华大学外语教研组教师。（注二）

2. 社会关系：

大伯父 吕凤子 无党派，解放前一直教书和办学校，解放后在江苏师范学院任教，1960年去世。

堂兄 吕去疾 一直教书，现任江苏丹阳师范学校校长。

吕去病 解放前在国民党兵工署工作，解放后在东北沈阳某工厂任总工程师级的职务。

吕去痴 一直教书，现在江苏金坛中学任教。

吕去癖 江苏医学院教师。

堂姐 吕无■（字不清） 一直教书，现江苏师范附属女中任教，她丈夫参加过国民党，59年被揭发，是历史反革命，被管制，前几年已病死。

吕无咎 原为教师，解放前夕同其丈夫逃往台湾，她丈夫孙世笃解放前在国民党兵工署做事，吕应中只是来清华上学前见过一次后一直无联系。

- 二伯父 吕中林 无党派，已去世。
- 四叔父 吕 濂 无党派，医生，已去世。
- 五叔父 吕 沅 无党派，医生，已去世。
- 大姑母 吕允农 家庭妇女，丈夫景亮钧是律师。
- 二姑母 吕菊子 家庭妇女，丈夫温晋城：国民党员，曾任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师辉的秘书长，解放前全家逃亡台湾。吕应中与他仅在 47 年见过一次后，无任何联系。温晋城逃往台湾后，吕应中的家庭与温没有联系过。

(注一)：吕应中的家庭及社会关系、海外关系，在其档案中一直是填写清楚的，不是直系亲属，且无任何联系。66 年出国审查时符合出国条件。

(注二)：吕应中的爱人的妹妹据吕本人说在外做地下工作，无法调查。另外吕应中爱人的嫂子的哥哥是肖前，吕应中听说过，从来无有来往。

【附件二】

三、1957 年 6 月 4 日吕应中在物理教研组的发言

此发言大字报是右派分子董曾南利用吕应中的发言向党进攻时将会议的记录抄成的，57 年 5 月底吕应中刚从外地实习回来。是在对学校情况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讲的。这个讲话是右倾的，被右派分子利用。6 月 8 日，他就认识错误，做了检查，投入反右运动，在和大右派钱伟长的斗争中表现坚决。

党委委员周寿昌、吕应中的发言

(按 1957 年整风时照片抄录，有不清处空白)

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在 6 月四日晚上召开教研组□□□□□□□□同志继续揭发清华党工作的“三害”，并进行很多的分析□□□□□□□□。许多同志就目前整风运动的进展情况提出了意见和问题，有的同志说整风运动开展以来，感到有些上下内外不□□□□□，下面群众贴了许多大字报，上面党委对我们看法

如何，估计如何，外面的报纸也不登载报道，对我们的做法究竟怎样看法，党委虽对学生做了报告，但这些报告并没有解决群众的这些□□□□的疑问。有的同志说，到现在提出这么多意见，党委□□认为是基本上正确的，是可以考虑研究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有无作用？有的同志说：现在有（缺十几字）……党委吕应中同志说，我说不上代表党委会表示态度，但是可以表示我自己的态度。这次整风中，物理教研组提了很多很尖锐的批评，我认为不仅对工作有帮助，而且对帮助党委认识这些问题也有很大帮助。总的说来，这次党委领导整风，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不能不感到一些被动，因为一方面要领导这个运动，另外一方面还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展开自我思想斗争，我想党委在这次运动中是一个受教育和改造的过程，接受多方面的意见，也不是都轻而易举地，而有时是需要一些思想斗争和一定的认识过程的。比如说上次蒋校长在物理教研组最后的发言中有一部分受到大家欢迎，但也有一部分（约缺15字）……不满。他说，他来清华后，主观上一直是尊重老教师的。当场就有同志问，既然校长上哲学时说动机与效果有一致性，为什么有尊重的动机却是老教师有感到不受尊重的效果呢？我自己对这句话也是不同意的。我认为检查一下过去对“尊重”究竟具体如何认识才能找出改进清华党群关系所在。然而对蒋校长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这就说明任何批评意见要被深刻的认识和真正接受，是需要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的。最近常委会开会气氛与以前大不相同，会上争论很多，有时各说各的，甚至同时都说，鸣成一片。常常在具体意见上不容易很快得出结论，这说明党委在整风中内部也是一个矛盾和斗争的过程，这是必然的现象，当然在大鸣大放这一点上，党委内部是一致的。我所说的只是对待具体问题的观点，这是必然会有矛盾的，（缺数字）……，在……物理教研组的会上，有些同志引用了听见和传闻的个别同志对某些具体批评不表支持的发言就产生顾虑，就认为党委是否有决心放，我认为不仅是批评可以允许不接受，而且更重要的是个别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具体意见，思想真正搞通，有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发动群众请大家来大鸣以帮助整风，正是因为不□□则领导人可能感到压力不大，或思想不（约缺20字）……也是正常现象。我们绝不因此而不放不鸣，相反都应该大鸣大放才能促其清醒。大家所提的意见，与我过去工作有关部分，我感到绝大多数非常中肯和深刻，例如对教务处工作中搞三年总结，提规划等形式主义

的批评，我自己从调到教务处，开始认识得比较（缺数字），……现在大家提的很尖锐，（缺数字）……也进一步检查，的确教师力量究竟如何看才恰当？这过去领导上安排是有缺点的。比如科学处的同志一直认为科学研究上过去开展还不够。另外如何成钧同志刚刚讲了一句话：清华领导上提拔了干部也不教育，就偏听偏信，对□□□□□我也有同感。的确回顾几年来自己担任一些工作中领导极少做检查，更少批评教育，在领导机构如党委会中批评自我批评（约缺十几个字）……错误缺点不发展起来！因此我觉得同志们提了极大多数意见都是很有启发性、很深刻的，当然有极少数意见还可以讨论□□□，成绩和缺点的认识与估计问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

（周寿昌发言略）

四、吕应中与旧北京市委的关系

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把旧市委搞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扎不进的独立王国，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刘仁是这个集团的第二个大头目。

吕应中和旧市委是否有特殊的关系，是给吕应中定性的重要症结之一。

我们根据群众以前揭发的材料，经过初步调查核实后，公布以下的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说明吕应中和旧市委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我们也到刘仁档案组进行调查过，未发现有什么特殊关系。

下面将这些材料公布如下，提供同志们讨论时参考。

厂址选择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为了搞独立王国，提出要建在学校附近（根据公安规范离开生活区 1km 的要求）。厂址开始选在后八家村，报北京市规划局，经二部苏联专家总顾问同意后，于 1958 年底开始基建。59 年初，何东昌说刘仁传话，某厂出了安全问题，为了北京市的安全要求，把厂址迁到别处，根据市规划局的意见，在昌平（不是目前的厂址）及××两处选方案，但都不合条件。后刘仁建议选在目前的地方，并说这地方与北京市的规划没有矛盾，此地风景又好，电影《智取华山》就是在这里取景的。选择了目前厂址后，规划局还有意见，一时不能定案。蒋南翔找了前市委，由郑天祥出面，专门召开了一次前市委常委会，

会上是规划局与清华申述自己理由，经郑天祥拍案定案，当时何东昌、吕应中列席了这次会议。

刘仁与清华

一方面旧市委为了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竭力想利用清华，利用200号来捞取政治资本，在××方面压过上海。刘仁支持的并不仅是清华，还有其他学校，也想利用他们为旧市委服务。在清华并不止200号，其他程控、9003、无线电××等等，刘仁想利用清华的技术力量为旧市委服务，如沙河半导体所是旧市委郑天祥所主管的，清华无线电系就和这个所挂钩。

又如9003建成后，刘仁希望清华帮助北京抓精密机械。旧市委还利用其他高校为旧市委的高、大、精、尖服务。

另一方面，因没有和前市委合作，不为北京市委服务，就很有意见的。如清华搞汽热汽车，旧市委就批评清华，说清华有成为“武光第二”的可能（武光为前北航党委第一书记）。又如65年以后清华水利系根据备战原因到×线去搞水坝工程，而没有搞北京的水利工程，旧市委也对清华有意见，赵凡尅了张光斗。

60年，市委给了200号的支持，主要是设备加工和供应了一些材料，并没有投资，而对9003旧市委是直接投资的。又例，60年夏，由于200号与三建有矛盾，旧市委派出一副长，调节结果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

刘仁与参观

62年到65年间，刘仁每年到工地一次，三次吕应中在场，同时还有其他人

在。62年，刘仁走到学校，对高沂、刘冰、何东昌等人说：“人家热时你们要冷一点，人家冷时你们要热一点。”又说：阎锡山说共产党“机会主义”真厉害。（意即指抓住机会，开展白区工作），我看这种机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并说：现在基建力量比较空。后来何东昌陪同刘仁到200号参观，吕应中因病未在厂，这些话何东昌转告给吕应中。

63年，夏季校党委开三堡会议时，党委打电话来工地，说刘仁来厂参观。刘仙洲和吕应中在三堡开会，赶来工地接待。刘仁从昌平来工地，其中一人是刘

仁的护士，刘仁这次穿着背心、拖鞋，参观过后，刘仁说：“你们搞得太慢。”问吕应中台湾伪国立清华大学建成了吗？吕答：已投入运转，刘说：你还不如台湾。吕辩解说：他们设备是美国成套供给的，我们每个设备都是要自己设计、加工。刘仁十分不满，没参观完就说：那个黑洞洞不看了。接着就走了。

64年，刘仁等人先到何东昌家里一起来参观。到厂后问建成没有？吕说：还未建成。刘说：不看了。

坐在办公室里和何东昌闲谈，在座的还有梅××等人，谈话内容主要是农村建设方面，还谈到朝鲜的工业建设等。随同来的其他到厂参观的先后一起离厂。来厂途中，刘仁曾问何东昌说：200号前的道路太直，厂房太暴露。何东昌后来转告吕应中，吕应中和搞土建的同志商量了两个方案，后来决定搞了目前的方案。

65年，200号建成后，由何东昌陪同，又来厂参观。并说200号建成了，别人就无话可说了。参观后何东昌、吕应中与刘仁同车回北京，先到昌平县委吃饭，刘仁要县委在路北多种一些树，使200号和北大隐蔽一些，并顺路到手表厂和半导体研究所参观。

经费关系

200号工程上马，是×部按委托任务拨给投资的。60年由于缩短战线，某部将投资减少，表示不愿再给200号投资。因此200号工程60年以后由高教部投资。这件事蒋南翔约在62年告诉何东昌事情经过。当时张劲夫曾主张200号下马。刘杰也曾对刘仁讲过。刘仁向蒋南翔转达了刘杰的意见，蒋南翔表示：如主要困难是经费问题，高教部自己解决，主张不下马。刘仁表示支持蒋南翔的意见。以后刘杰亦没有表示过反对的意见。蒋南翔找杨秀峰、段洛夫谈了此事，他们表示可以解决经费问题。

上述情况直到1965年在写200号总结时，才知道刘仁支持蒋南翔200号不下马的意见。

地下×××

64年底，我厂初步建成后，吕应中向×部要求任务，×部提出四个题，要吕应中选择，吕选了其中一个任务。

65年2月左右，吕向何汇报，何向吕出谋，何说北京当时要搞地下铁路（据何东昌交代，他自己从59~60年起，他一直有想搞地下×××的念头）。我们可以搞得小一点，又同在地下，又可用在选择的任务上，这样就能有可能得到旧市委的投资和物资支持。何去找刘仁，刘仁同意先研究起来，刘通过何，叫吕应中去找旧市委科委张光斗和国家科委张××汇报，后×部表示没有××，最后没有搞这项任务。以后的1965年上马的××××任务和××××任务与旧市委刘仁无关。

几次接触

第一次 是在57年6月内，何东昌通知吕应中和凌瑞骥与其他十几个总支一级干部，参加过刘仁主持的一次布置反右动员工作的会议。

第二次 在58年8月刘仁在北戴河开中央工作会议，先后找了何东昌、吕应中、凌瑞骥去，刘仁问：“××部对200号投资是否落实，吕汇报了806工程情况。刘仁并询问吕应中有什么新技术，吕写了一份××方案的技术报告。

第三次 吕在60年因病参加工会组织的到北戴河休息十天，清华同去了十几个人，住在北京市教育工会休养所，当时刘仁也在北戴河养病。一天傍晚，通知吕应中去（同去的有刘仁老婆的朋友，一个女医生），询问了广州会议后学校内统战工作的情况，吕应中把党委会上听到的情况做了汇报，约一小时左右，吕应中说：梁××教授等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第四次 65年夏季刘仁拿到76个技术文件，其中一个有关技术物理的绝密文件，刘仁看不懂，叫何东昌带几个懂技术的党支部书记到刘仁住所处，看阅科学院的基础科学规划，主要每个人就所熟悉的项目发表看法，吕对其中一项发表了意见。

第五次 62到65年间，刘仁通过何东昌找到了党总支书记到党委办公室去汇报工作，其中吕去两次。

第六次 62年4月刘在友谊宾馆开市委扩大会，找了吕应中和凌瑞骥谈了有关200号建设问题。

其他

(1) 刘仁和总结：

65年3月吕应中在校内介绍科研经验，刘仁秘书张天太曾来了解过，刘仁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通过张天太向何东昌表示，200号经验写好后由市委报中央，后来由于蒋南翔亲自抓，刘仁没有捞到。

200号的总结初稿写成后，刘仁通过党委办公室要了两份。

66年三月旧市委抵制文化大革命，假惺惺地组织了一次毛著积极分子交流会，清华在会上提出合成氨的发言，刘仁并要200号派人出席，报告200号的科研结果，来为其捞取政治资本。

(2) 黑帮参观

旧市委、旧中宣部的黑帮分子来200号参观都是由前校党委书记请来的，并需要经过书记通过才可以的，吕应中还够不上格单独去请的。

如：黑帮分子李琪是由艾鬼请来并陪到200号参观。

五、吕应中与蒋南翔为首的前党委的关系

吕应中是前清华党委的常委，被人看作是蒋南翔的“大红人”，经过几个月的大量调查，我们认为吕应中同志不是蒋南翔的死党，不是前党委的决策人物，在本质上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之流根本不同。他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也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不同程度上执行了刘、邓、蒋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有时站错了队。

(一) 吕应中不是蒋南翔的死党，不是旧清华党委中的决策人物：

1. 吕应中很少参加蒋南翔决策清华大事的“书记工作会议”。63年8月到64年8月，共召开书记工作会议36次，吕应中只参加了1次（时间64年1月12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张维等16人，会上吕汇报了试化厂的工作）。64年9月到65年8月，共召开书记工作会议27次，吕应中参加2次（第一次64年11月15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总支书记7人，讨论清理苏联教育思想的问题；第二次65年8月15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高景德等8人，会上吕应中汇报了××任务的进展）。65年9月到66年4月，共召开书记工作会15次，吕应中只参

加了2次。(第一次66年2月13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张维等7人,第二次66年4月15日,参加者除书记外还有李传信等人)以上情况均可查会议记录。

2.除“书记工作会”外,蒋南翔有时还召开小型核心会(无正式记录)。根据调查,吕应中只参加了一次这种会,会上吕应中汇报了工作。(66年2月7日,参加者蒋南翔、李传信、邢家鲤、吕应中)。

另外66年5月9日,蒋南翔接见原子能出国考察团时,吕作为团员也被接见,会后蒋与吕谈了一下校内情况,曾谈到让吕回国后抓一下教改工作。

3.64年北大开始社教之后,蒋南翔之流惊恐万状,曾召开秘密书记会约13次。

(李寿慈参加这些会议,滕藤、张慕津也参加一两次),吕应中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未发现吕应中参加其他什么策划。

4.在吕参加的常委扩大会上,包括三堡会议上,没有发现他有任何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北大社教的言论。(这与蒋南翔、何东昌、艾知生之流形成鲜明对比)。

5.66年5月11日,吕应中出国考察,没有参与蒋、艾之流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勾当。

6.目前尚未发现吕应中和蒋南翔有其他进一步不正常的联系,蒋南翔自己供认他用人各有各的用处。他用吕应中主要是为他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向党进攻。

(二) 吕应中受蒋南翔蒙蔽,被蒋南翔利用站错了队的几件主要事情:

1.64年底,高教部召开了理工科院校党委记和院长会议,会上有人批判了高教60条,蒋南翔慌了手脚,除了把陆定一、林枫拉来压阵之外,还组织会议参加者参观清华200号。事前蒋南翔通过何东昌向吕应中布置,让吕在讲解中提试化工厂是从“积极方面贯彻60条”的。吕后来在参观讲解时,除了讲200号是大跃进、党的教育方针的产物外,也谈了从“积极方面贯彻60条”,美化了这个修正主义纲领。

2.65年底,蒋南翔为了抵制主席批评,稳住高教战线的阵脚,举办了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高沂等人为了突出清华,决定展出清华200号,吕应中同志接到通知后积极筹备展览,客观上帮了蒋南翔的忙。

3.吕应中根据200号建厂经过,写了建厂的六年总结,后来又在蒋南翔的授意下作了修改,塞进了蒋的私货,为蒋南翔的修正主义路线贴金。

4. 66年吕应中在听到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些指示后，根据240专业的教学情况写了教学小结，提出了一些与原来蒋、何推行的一套不同的办法（今天看仅仅是一些改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蒋南翔用来美化自己，借此标榜清华也是革命的等等。

（三）吕应中对前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做了一些抵制：

吕应中主观上是努力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所以对前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做了一些抵制。当然由于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蒋南翔的修正主义面目。

1. 反对蒋、何历来主张的“以理论为轴心”的教学方法，主张结合生产实际，在“战斗中成长”，曾几次背着何东昌、教务处做了一些教学改革的实验。
- 2、反对蒋、何的“天才教育”，反对清华实行的研究生制度。
- 3、64年在毛主席号召学大庆之后，吕应中在200号积极领导群众学大庆，发扬“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这一年取得两座反应堆一次成功地投入运行的巨大成绩，这与蒋南翔之流在校内的阉割大庆的革命精神，只搞什么“评功摆好”的修正主义的一套成为明显的对照。
- 4、吕应中同志反对蒋、何之流主张的“填平补齐”，取消劳动等一些否定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否定教育革命的一些措施。
- 5、蒋、何之流在科研中反对搞群众运动和提两条道路的斗争，相反吕应中在200号主张大搞群众运动，主张大抓两条道路斗争，并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

※ ※ ※ ※ ※

虽然吕应中同志不是蒋南翔的死党，但是因为他有“才能”、有干劲、出成果多，加上受到刘邓蒋的毒害，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容易被蒋所蒙蔽、控制和利用，能够比较忠实地执行蒋南翔的一套，所以蒋南翔对吕应中还是重用的，并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扬了他。但是我们考察了吕应中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考察了他在前党委中的作用，和蒋的关系，将他和其他干部做一些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吕应中同志是比较好的领导干部。我们相信他在群众的批判帮助下，能够与刘邓蒋划清界限，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认为应该让吕应中同志参加到三结合的领导核心中来。

六、北大社教与清华假社教

北大社教工作队于1964年秋进校。北大社教开始。我校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凭借其敏锐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彻底灭亡的命运，十分恐慌。在黑帮头子彭真与旧市委的授意下，密切注视北大社教动态，采取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措施，实行假社教，企图蒙混过关。65年2、3月，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搞翻案，镇压北大社教，蒋南翔积极参与了这一罪恶活动。校内一小撮走资派感到松了一口气，明目张胆地污蔑、漫骂北大的社教。并继续玩弄假社教的阴谋，企图逃脱失败的命运。但是一小撮走资派终于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逃不脱革命人民的法网，在文化革命中宣告了一小撮走资派的灭亡。

下面介绍一下吕应在北大社教与清华假社教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

一、秘密书记会

- 1. 刘冰交代材料：**蒋南翔在清华的一次书记工作会上将这个简报（注：指北大社教动态简报）读了一下，……说清华应吸取北大的经验教训，把干部的情况摸一下，把党组织整顿一下。……以后的每次书记会上蒋南翔都有选择给几个副书记宣读北大社教简报，然后讲述他的看法。在当时几个问题上，对北大的估计，对陆平和北大干部队伍的估计，对高等学校搞社教的方针、做法等等，不断阐述他的观点。
- 2. 何东昌交代材料：**1964年10月至1965年4月，约有十来次书记会，主要是议论北大社教，只有书记参加，没有其他任何人参加。书记高沂去师大参加得少，吕应中未参加过这类会议。
- 3. 提审何东昌记录：**蒋南翔参加中宣部听张盘石的汇报会，他有北大社教简报，关于北大社教情况，主要来源都是从蒋来的。这十来次书记会大多数是议论北大社教的。当时对北大社教问题，蒋限得很死，不让外传，开始一两次书记会艾知生也没参加，这倒不是因为蒋不信任艾，而是因为艾的嘴不严，他容易传到团委会那里，团委会又往下传。
- 4. 提审艾知生记录：**北大社教是64年秋天开始的，最初对北大在党委会上没讲。

我参加的会，9、10月份讲得不多。在9、10月份蒋只讲黑话，参加会的，刘、胡、何、高、我、李寿慈。会上没专门讲北大四清的问题。

5. 余兴坤谈：刘冰，67年8月23日大字报交代黑书记会的问题，我不知道，相信吕应中也不会知道。当然也不能打保票，蒋对这问题很警惕，常委不会去。滕藤可能去几次，因为滕的爱人在北大。

6. 凌瑞骥谈：开过几次书记秘密会的事，我不知道，是最近才听说。

根据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64年底到65年初，开过近十来次的书记会，根据他们掌握的北大社教情况，积极进行策划。吕应中没有参加这一活动。

二、党委会：

1. 刘冰交代材料：就在这次会议上（指一次秘密书记会）蒋南翔确定要同胡健抓干部审查，从此清华的假社教就开始了。在以后的书记会上，蒋南翔还提出要加强党内外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决定在同学中、教师、党员干部中开展九评学习，清理思想，他并提出要加强薄弱环节的工作，提出抓土建系、数力系的工作进行整风，这样，清华的假社教就全面开始了。蒋南翔讲的这些精神，我党委会上也讲过几次，当然吕应中在场（是否每次都在场可以查对一下，因为他不是每次党委会都来参加）我没听他讲过什么。

2. 刘冰交代材料：他（指蒋）决定要我分别找总支书记，党委的其他主要负责干部，将他对北大社教的看法，以及他在社教问题上的主张好好谈谈，要这些干部跟上形势，随后我分别找总支书记讲了这些看法，要总支书记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薄弱环节，抓干部审查。我记得我主要找了在校的一部分总支书记谈了，在校内的也没有找完，没有找吕应中，我记得是否准确可以问吕应中。

3. 凌瑞骥谈：这一段时间，清华党委表面上有意回避北大的社教问题，我知道北大社教问题，最早就是陆定一64年10月讲话传达后才知道的，这是64年11月的事。陆定一说北大烂了，起码一半烂了，之后还问了，“你们清华怎样？”

另外，64年10月刘冰还个别找人谈，我、滕藤、×镇关在一起，他说：北大去了工作队，问题很大。……刘冰说：工作队完全是带着框框去的。他问：你们对系里的干部心里有没有数？对北大社教没有讲情况，在总支级干部中，牵进去的只有滕藤，因为他爱人在北大，何东昌要滕藤叫他爱人不要当积极分子。吕

应中涉及多少我不知道，65年三堡会，吕应中很少发言。

在常委会没有讲过北大社教的具体情况。

1. 三堡会：（1965年）

（1）**凌瑞骥谈：**三堡会议没有讨论前十条，也没有讨论23条，而是讨论彭真的讲话，谷牧的设计革命总结，高教部党组关于高教社教的意见和大寨社教经验。吕应中在会上强调了200号的经验，强调实验室是三大革命阵地。能解决世界观问题，其他印象不突出。

三堡会议晚上不开，都是刘冰等找几个人谈谈如何将会开好，当时吕应中参加，当时我也参加，在这些小会上，蒋南翔还提出过生产自给，要学大寨等。

（2）**余兴坤谈：**三堡会议领导核心是书记，吕应中估计不会参加核心。分小组是随便分的，是办公室分的，吕应中有时与我同一个小组。65年三堡会议期间，吕与我住在同一房间，晚上核心碰头会吕不参加。

（3）**凌瑞骥谈：**北大社教问题上吕参与不多，因为在第五次三堡会上（主要是反对高校社教）他发言不多，如果参与多的话，至少在65年三堡会上要发言（这个会上滕藤发言多），因为在这次会上攻击北大社教是“合法”的。在三堡会上，他讲的主要是吹200号，讲“实验室也是阶级斗争阵地”，扯北大的不多。

（4）**何东昌交代材料：**1965年6月前党委三堡工作会议上，讨论顶风及布置65—66年工作，刘冰两次讲再搞一年校内“四清”时，主要是抓支部一级工作，职工工作和薄弱环节。

这次三堡会，吕发言我记得是强调各项工作要有利于学生世界观改造，举了理论课的例子，不可使学生越学越神秘。其他无印象。

（5）**周家恣谈：**对北大社教，党委常委会讨论过这件事，滕藤的情绪最大，吕的态度不清楚。

（6）**提审何东昌记录：**正式讨论北大社教的会，是1965年6月下旬，彭真向全市高校负责人做了一个反革命的报告，主要是北大的问题。假借最高指示为陆平“平反”，以后在三堡会上传达了，进行了讨论。当时一般干部主要的认识是北大四清搞错了，对学校工作影响大，伤了元气，党内分裂了，等等。当时在总支书记之间曾谈起过北大四清的一些情况，吕应中当时谈了什么意见，我没有印象。

（7）**吕应中交代材料：**“蒋黑帮在65年三堡黑会上搞抗拒事情阴谋计划”。共分

三部分：第一部分，大？反革命形势；第二部分，假造四清计划；第三部分，布置工作，实现假四清计划。由于篇幅太长，在此不复述，需看者请查审原件。

三、与其他人接触：

1. 1964年10月前后，前党委决定审干，书记会曾商量过调整几个家庭出身问题比较大的干部。此后，我曾向吕应中谈过要调动××的工作，从党的工作调行政工作，因为她在与××关系上表现不好。我不记得向他透露过北大四清的情况。但可能讲了外面对成分问题比较注意，同时建议×××可否做副书记。以后吕说×××社会关系上也有问题，就搁下了。他好像对此不是很着急的。

1964年暑假前，？人，我认为200号政治干部弱，曾向他谈过留一些政治工作干部，成分好一些，他怎么执行的我记不清了。

1964年11月，蒋说北大技术物理系放射性事故，工作队上纲为阶级报复。……我曾布置过检查（按：指安全工作），我不记得向吕应中布置了没有？

（以上均为何东昌交代）

2. 1965年2、3月份中央书记处邓小平讲：“北大工作队一进校就要把陆平打成坏人，是违背党的方针的。”这以前，书记会，蒋关照过不得向下透露。以后认为北大形势“明朗”了，就比较随便。（何东昌交代）

65年4至5月一次党委常委会之前，何东昌与身旁的总支书记谈话，说北大总支书记上台说自己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看他们怎么下台，又说阮明找过他，跟着跑，又犯了错误。（吕应中谈）。

3. 65年，6月26日到刘仁家去看过技术资料，当时在三堡开会，由何东昌、吕应中、余兴坤、滕藤和我五人去，去时科技大党委书记刘达也在。我们当时一人分了一批材料看。刘仁就与何东昌、刘达谈通县会战情况和攻击北大四清，刘仁说：“陆平当时给斗得受不了了，就找我，我在电话里告诉他，陆平吓得受不了，说：‘现在千万可别来。’我就同意他来市委找我。他对我说他要全承认了，我说，你想通了就承认，想不通的不要瞎承认，现在胡说，将来我们想帮你也帮不上。”等等。我们一面看资料，一面听到这些，后来刘仁就问我们对这批技术资料的意见，我们各自谈完了自己的意见就回来了。（凌瑞骥谈）

1965年6月，刘仁通过党办通知我带滕藤、凌瑞骥、吕应中、余兴坤，陆

大金等几个新系的党总支书记去看科研资料——国家科委的远期规划。科技大书记刘达也在场。刘仁讲过，他在北大四清开始时要去北大找陆平，陆平不敢，要求到市委。陆平去了，刘仁给他打招呼，意思是不能瞎承认。刘仁还问过我，阮明的成分，并说查1954年前大学毕业生的成分是没有常识，“还有好的！？”意思是北大四清搞“唯成分论”等等。我记得总支书记都没有插话。（何东昌）

4. 65年下半年，许立群到工地参观，同车回校，艾知生来陪同，艾知生问许立群：“北大情况怎么样？”许答：“北大是擦屁股没个完。”（按：许当时是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吕应中）

四、吕应中贯彻假社教的情节

1. 为了帮助大家分析这个问题，我们把刘冰交代的清华假社教的主要言行整理如下：

（1）了解了北大工作队抓党内不纯问题，要清华党委整顿党组织，审干，由刘冰，胡健来抓。

（2）认为北大不是资产阶级大学，贯彻的不是资产阶级路线，陆平不是资产阶级及代理人。（3）大反“唯成分论”。

（4）反对控诉会形式，主张和风细雨搞整风。

（5）反对高等学校派工作组，主张自己搞社教，“自觉革命”，主张社教落实于教改。

（6）学生、教师、党员干部清理思想。

（7）抓薄弱环节，加强这个环节。

3. 吕应中在200号贯彻情况（五、六略）。

七、关于吕应中参加黑帮核心组会的初步调查

有关吕应中是否加入党委书记小核心组，参加决策问题，我们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核实，由于党委书记一级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因此我们所搞到的材料只是初步的，可供以后进一步深入调查时作为参考。

（一）据吕应中自己交代，吕参加小核心组会的次数和内容：

第一次：66年初，是一个晚上，在蒋家中，参加人李传信、艾知生、邢家

鲤，会议主要内容，蒋说的：（1）批评教务处不团结，要大家支持教务处的工作；（2）蒋大讲过去清华党内斗争史，提到何东昌在袁永熙向党进攻时，何也不清楚。

第二次：66年4月初一个上午，在蒋家中，参加人：刘冰、艾知生、李传信。会议主要内容：看江青报告，传阅着看，蒋说的主要内容：1、工科也要关心学术批判，济南会议对此未重视，不对。2、目前要批判吴晗，但也要准备点本单位的東西，如钱伟长可拿出来批判。3、说到刘仙洲与他的意见不合，是清华目前前进的障碍，刘仙洲要出版校史，其中还有吹捧吴晗，说以后少让刘参加常委会。

第三次：66年4月15日，上午，蒋家，参加人：刘冰、胡健、李传信、周家恂恂、艾知生（后进去）会议主要内容：1、蒋说：要批判三家村，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最近要见报。2、蒋说：前市委为此已开了一个多月的会，邓拓正在检查，邓还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助，我当然不能说什么，邓的事何时见报，就看彭舍不得下手了，这是彭周围的人。3、三破三立。破吴晗、钱伟长、胡华。立200号、712、合成氨。4、给吕任务修改总结送红旗发表。

（二）有关吕应中参加小核心组会（包括书记工作会）的调查与核实：

我们所掌握的一部分材料（书记工作会议纪要）是63年8月以后的，因此在这以前的情况就不太清楚，而掌握的这一部分材料也不完全，有很多小书记会是不让记录，参加人数更少，因此有待于进一步调查。

现将63年8月以来吕应中所参加的书记工作会议和小核心组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的内容整理如下：

1. 1964年1月12日，晚，甲所会议厅

出席：蒋、刘、高、何、胡、艾、张维、赵访熊、李恩元、何介人、吕应中、汪家鼎、钟士模、凌瑞骥、房家国、王和祥、李庆和、朱成功、徐一新、裴全。

议题：（1）试验化工厂工作汇报；（2）911项目工作情况汇报。

2. 1964年11月15日，晚，十公寓

出席：蒋、刘、高、胡（早退）、李寿慈、何东昌、艾知生、李恩元、吕应中（早退）、滕藤、何介人、邢家鲤、蒋企英、陈圣信。

议题：教师清理苏联教育影响问题。

会议讨论了关于试验化工厂建设工作，向中央的报告草稿，再做些修改后定稿。

3. 1965年8月15日，晚，十公寓

出席：蒋、刘、何、胡、李恩元、高景德、吕应中（早退）、滕藤（早退）、张永良（早退）、张光斗（早退）、邢家鲤、郝根祥。

议题：1. 水利、工化、09项目。2. 校医院李岩、水利系学生反党集团处分问题，吕应中汇报了××项目进展情况。

4. 1966年2月7日，下午，蒋家

出席：蒋、李传信、邢家鲤、吕应中。

会议内容调查如下：

A 李传信交代：（1）吕应中汇报×××，蒋说：“可以浪漫主义的设想一下，要使这个项目影响到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蒋要吕在200号搞小型展览，以接待中央负责同志，最好在5月左右。（2）蒋批评邢家鲤，要他支持艾知生的工作。（3）蒋大讲了清华党内生活斗争的历史，要求加强党委内的团结。

B 邢家鲤回忆：（1）吕应中汇报×××任务，蒋要吕快些，能对将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有所影响。（2）邢不记得蒋说过清华的党内斗争史。

C 根据吕允文、曹焕林（？）、施家佩的工作笔记本上记载：吕应中在2月7日晚总支扩大会议上讲，那天下午去蒋家汇报×××的工作，蒋要求加快些，争取五一搞个展览。

5. 1966年2月13日，晚，强斋二楼会议室

出席：蒋、胡、艾、张维、李传信、吕应中、高景德、邢家鲤、郝根祥、饶慰慈。

议题：（1）各总支讨论毕业设计情况汇报。

（2）×××的研究室计划（注：200号的研究项目）。

6. 1966年4月15日，上午，蒋家

出席：蒋、刘、胡、艾、李传信、吕应中。

议题：学术批判问题。

会议的内容调查如下：

A 艾知生交代：

- (1) 传阅看文件，有关批判邓拓、吴晗，还有一个彭真、范瑾的讲话。
- (2) 艾传达李琦在大学部的讲话。
- (3) 蒋提出要跟上形势参加战斗，有些动作要快，另外提出批判钱伟长，即所谓三破三立，破吴晗、钱伟长、胡华。立200号、712、合成氨。
- (4) 蒋提出撤销党史编委会，党史上有吹捧吴晗。

B 胡健交代：

- (1) 蒋拿了江青报告念了一些。
- (2) 周家忭开完大学部会后，传达了会议的情况。

C 李传信交代：

- (1) 传阅看江青报告和有关邓拓的检查。
- (2) 蒋要李传信抓批判钱伟长的问题

D 周家忭回忆：

主要是三破三立。

E 周家忭整理的书记工作会议纪要原文：

会议明确：（实际上记的都是蒋一人的发言）

(1) 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正进行反右斗争，比之1957年政治上的反右斗争，更深入了一步。党内对于当前这一形式要充分认识，有些干部往往容易强调业务，犯职业病。我们虽然主要时间是搞业务，但是一定要政治第一，眼光看得远一些，关心整个教育、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要注意师生的思想动向，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战斗，校刊学报都要配合，既要破旧，又要立新。

①破旧就是要批判。今后政治课教研组要组织几个战斗小组，专门经常阅读、研究、发表有关的文章，一个月左右向党委汇报一次。当前首先参加批判吴晗的问题。由艾知生负责，可以结合校史研究进行，校史一定不要出版。要清理检查一下过去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问题，应该进行自我批判。

其次是对钱伟长的批判。过去写的文章，在业务上着眼多一些，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再整理研究一下，深入一步，准备提供一个理工科方面的典型，要主动抓好。请李传信同志负责，暑假前搞出来。

第三是参加帮助批判胡华为陈独秀翻案问题。

②立新就是要总结实际斗争经验，比较站得住。不要写抽象的哲学论文。今后每年都要写出两三篇有分量的总结文章。经验总结不能只写工作过程，要提高思想性。

×××的经验总结是个萌芽，可以再改一下，登红旗杂志，五月写妥。

712项目要动手总结一下，由滕腾、李传信、吕应中、汪家鼎等同志负责，上半年定稿。

合成氨、塔报道的文章还要进一步加工提高。

(2)校史编委会改为校史工作小组，归入党史教研组，学报编委会要改组，事先在党内外酝酿一下，由高景德同志提出改组意见。

(3)科学研究、毕业设计工作，既要有群众性的高产、校产、?产，又要明确一号高地是×的利用研究，意义比较重大。要集中全校力量，密切配合，争取三年过关，打歼灭战，200号可以考虑成立研究所××××员编制。

按：这是200号团派同志整理的材料，材料来源于工作组时期的揭发材料及吕应中的交代材料。现翻印出来，供大家在讨论吕应中问题时做参考。

八、吕应中对待毛泽东思想言论

编者按：为了在200号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200号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因此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必须进行彻底批判。以下是我们整理关于吕应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这些材料来源是依据去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厂革命群众和干部揭发，以及吕应中本人的交代材料。希望全厂革命同志核对、更正、补充之。最后说明：材料仅供大家参考。

《1042》战斗组

(一)

1.“高等学校和农村不一样，不适宜搞四清，因为高等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没有夺权问题。校长有问题可以撤换，另派一个来。若党委书记有问题就更好办，召开党员大会大伙不选他就是了。所以中央决定高等学校不搞四清。学校知识分子思想问题比较复杂，去参加农、工厂的四清受教育，提高觉悟。”——张静揭发。

2. “学校的条件很好，没有复杂的阶级斗争，校党委领导正确，没有夺权斗争问题。”——1965年12月12日，吕应中答101、102一些同学。

“学校中不存在夺权问题。”——曹焕林揭发。

3. “四清不是万能的，你们不要迷信，马克思没有搞过四清，不也是革命家。”（当时留下一批教师、同学没有去参加四清）后还说：“我们还是太积极了，应该全不去！”——王大中揭发。

4. 为了阻挠教师、学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吕应中提出：“实验室工作也是搞阶级斗争”，“搞科研就是参加阶级斗争，不一定非到农村或工厂去。”“实验室里能够培养三大革命运动战士。”——张静、林家桂揭发。

5. 65年2月16日，全厂干部会上动员全年工作时只提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看待事物，只讲战略、战术、三结合等，不讲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不讲人的革命化。——吕允文66.9.22揭发。

6. “毛主席的思想说来说去就是一条：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干，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彻底的群众路线。”——梅启智揭发。

7. 66年初，在主厂305一次碰头会上，吕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看表面，搞形式主义。有的单位工作时光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实际上也不做。”“我们这里工作，从来不是先看毛选，而是先去工作，做出成绩来再总结提高，去看符合毛主席著作里哪一条。——潘雷鹏揭发。

“200号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特点不是先学了哪一条指示去用，而是干完了一总结，便发现其中符合主席著作的某几条。”——梅启智揭发。

（二）

8. 65年9月，吕在给××任务上马做动员报告时说：“完成任务的关键：创造性地完成生产任务就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马列主义，否则，则不是。”

9. “会会用，哪有每个会要研究的问题主席都说到了的！最多像三查开始学一学勤俭建国，不要那样形式主义！”——吕允文揭发。

10. 66年初，在一次总支委员会上，吕说：“毛主席著作学习不要形式主义，115每个礼拜要学几次，这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并布置×××去纠正。——潘雷鹏揭发。

11. 64年4月底吕在审查团总支64年全年工作重点和四好团支部标准中，当谈到草稿中提出要团员天天学主席著作并记笔记时，吕说：“不要搞这些形式主义”，让把这一条去掉。后把“天天学”改为“周周学”。就是这样，他仍不满意，一再强调团总支宣布去掉这一条。——梅启智揭发。

12. 66年初，吕在总支扩大会议上说：“对于教师来说，当前的矛盾不是学，大家对主席著作差不多都看过了，关键在于抓住一句两句用，用好了干出成绩来了，也就是主席思想学好了。”——梅启智揭发。

13. 吕认为学习老三篇低级，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学“本本”，主要是掌握本单位的客观规律。——林家桂揭发。

14. 工程建成后，吕在起草蒋南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厂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指导建厂工作。实际上吕没有组织干部学习与讨论过《矛盾论》和《实践论》，也没有看到他自己学过毛选，总是看见他抱了一本洋书。——林家桂揭发。

15. 吕应中认为“对毛主席著作不在于学多少，重要在用，只要出了成果，就有主席思想。”吕应中一贯是先出成果，再套用主席思想。他在《教改总结》中写道：“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又写道：“我们在实践中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以下论点：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纯粹是撒谎。——王大忠 66. 7. 25 揭发。

16. “大庆的五个一条线，床头放毛选是形式主义，不用学。”

17. 宣传组要在主厂前树毛主席语录牌，吕不让树。×××与吕商量后传话说“不要搞形式主义！”可是暖通设计室、主厂213、234室却挂着吕应中的“四个十分”。——王志宣揭发。

18. “政治工作落实到过硬功夫上。”——乌致祥、王明宗揭发。

64年10月26日吕应中讲：“政治要挂帅到业务上去，突出政治过后，就要在业务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65年12月在总结报告中说：“如果不抓政治就搞不出什么东西，所以就必须抓政治。打政治仗本身，又不能脱离当前的具体任务。——物 607 丘仁森等7人。

19. 64年11月，吕在讲到思想改造问题时说：“有人总相信教条本本（显然吕这里是指毛主席著作）……其实思想改造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实践……”——

王大中揭发。

20. “知识分子学完四卷有什么了不得的，很容易做到的事。”——吕允文揭发。

21. “《如何打乒乓球》一文，全篇是马列主义。但没有引用主席一句话，水平高……。我们写的总结水平不高，还引用了主席的话。”——王大中揭发。

(三)

22. 1965年8至9月间，团总支准备召开一次学习老三篇交流会，在向吕应中汇报时，他不耐烦地打断汇报，不让继续再谈，并说：“难道200号学毛选的水平就是这么低级吗？”于是让团总支去收集几个谈如何掌握本单位工作规律性的材料，已准备好的一次学习老三篇交流会就这样被他制止了。——梅启智揭发。

23. 在干部会和全厂大会上多次说：“老三篇学习适合工农兵，知识分子要摸规律，提高些，深刻些。”——潘雷鹏揭发。

24. 吕在干部会上说：“张百发队学习《纪念白求恩》学了两个月，搞得很紧张，有的工人就发牢骚说：”老白呀！老白！你干嘛那么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叫我们天天学，你害得我们好苦哇！——张静、梅启智、吕允文揭发。

25. 一次吕在给全厂职工讲党课时说：“一个中学有两个团干部，外出为学生找游泳场地，结果找到一个大水坑，不知道水坑有多深。两个人都不会游泳，其中一个团委书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去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于是这个团委书记就脱了衣服往坑里跳，结果淹死了。这是死学死用，学死用死。”——张静、胡大？揭发。

26. 多次贩卖邓拓的黑话：“知识分子学毛选有三个特点：一学就会，一放就忘，一用就错。”——梅启智等揭发。

27. 吕宣扬打乒乓球用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说“打胜了，是用毛泽东思想，打败了又怎么说呢？”——胡大？揭发。

28. “××所学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方案上要伸手到100多度的蒸汽中取××，这是不动脑子。”——潘雷鹏揭发。

29. 去×××所参观，吕看到这些单位墙上挂着毛主席语录。他说：“这些实验室挂毛主席语录是形式主义，是做给人看的。”——潘雷鹏揭发。

30. 64年9月吕在给物607、707同学做九评学习动员报告时说：“蒋介石和毛主席主观上都想改造客观世界，然而由于蒋介石违背客观。终于失败了。”——物707黄衍禧等6人揭发。

31. “我觉得主席思想不完全，在科研中很多主席没讲，要从实践出发，要发展。”（吕应中66年7月16日交代）“我厂一切革命工作都是毛主席思想的具体化，也便是发展着毛主席思想。”“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不想承认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早在63、64年已暴露出来了。”——吕应中交代材料。

32. 64年12月给物607同学做“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报告时说：“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那么我的错误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也是整天实践。”——物607王仁森。

33. 吕多次散布彭真的黑话：“活学活用主席思想，彭真说就是在各自的领域内寻找工作的规律性。”——潘雷鹏揭发。

34. 64年6月。吕传达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时说：“这儿没有业务上的要求”，65年说：“现在看来，在培养班人的问题上，我们摸索了一些门路，这就是战斗中成长。”——王大中揭发。

35. 64年底，吕提出“科学拜物教”，他说：“马克思提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我想了半天，科学上也有宗教。”——王大中揭发。

36. 66年底在劳改时说：“别光看大标语写的多不多，会上念念语录，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少了，生产又回到苏联那一套保守方案上去了，我说毛泽东思想少了。”——梅启智揭发。

吕作报告不是大力宣传最高指示，而是大量散布他的“四个十分”，“一为三不怕”，“一为三不做”，“一为三彻底”。给200号同志做学习焦裕禄的报告也是大讲他的“一为三彻底”。——林家桂揭发。

65年9月13日在讲备战问题的大会上也是大讲“寻难而进”，“四个十分”。——物607王仁森等7人。

（四）

37. “部队工作比较简单，任务单纯，对象也简单，所以政治工作好做，而

学校任务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思想也复杂，解放军的一套办法在学校不一定行得通，不能生搬硬套。”——张静揭发。

38. 66年初在一次党总支委员及支部书记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希望总支讨论我厂怎么开展向解放军学习问题。觉得我厂在这方面搞得冷冷清清。吕应中说：“你们还不懂得200号的特点，不要跟别人学样子，搞表面轰轰烈烈。”——梅启智揭发。

39. “解放军性质单纯，搞语录可以解决问题，知识分子复杂，搞语录是形式主义。”——吕应中交代。

“知识分子和解放军不一样，解放军战士文化低，水平差，总是讲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这样太简单，我们要提高，着重在工作中寻找规律性。”——115战斗队。

40. “校外学雷封（注），有形式主义。”“有小学生上学，带着扫帚扫街，把上学都耽误了。”——吕交代材料。

注：“向雷锋同志学习”是毛主席的亲笔题字，全国人人皆知，家喻户晓，而吕在66年7、8月份的检查中，却把雷锋都写成了雷封！

—— 完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jiyi.bjb@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